

教学参考

全国党校系统中共党史学术讨论会

专题报告和发言汇编

(内部材料 不得翻印)

下 辑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编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金春明（ 1 ）

“五·一六”通知剖析……………谭宗级（ 16 ）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谭宗级（ 38 ）

“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作乱最久的一个反革命集团
……………金春明（ 58 ）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王洪模（ 74 ）

※ ※ ※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周文琪（ 89 ）

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白区的工作……盖 军（ 129 ）

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个问题……………常东人（ 157 ）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

金 春 明

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刮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在中国大地上横扫十年之后，随着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历史性胜利而逐渐平息了。如何评价和研究这一段历史，成为摆在全党，特别是党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也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党中央已经起草了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相当的篇幅着重论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对“文化大革命”和其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作出了恰当的评价，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指导和依据。廖盖隆同志的报告，根据决议精神，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基本评价和重要事件的看法，谈了很明确的意见。下面准备就个人的体会补充谈几点意见，介绍一点情况，供同志们参考，有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一、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有一个发展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前就不用说了，不管人们心里和私下是怎么想和议论的，但在公开场合只能有一种语言，就是那段语录：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开始讲心里话，逐渐讲出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看法。但是，破除长期现代迷信的桎梏需要时间，特别是还存在着“两个凡是”的严重阻挠，一时还冲不破对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框子。一九七七年召开的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大革命”还是给予基本肯定的评价。

一九七八年五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突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和各项政策的落实，人们通过各种表面现象逐渐认清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本质。正象马克思所形容过的那样：“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

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马恩选集》一卷605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实践证明，所谓“文化大革命”不仅未能反修防修，反而败坏了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反而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不仅没有发扬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反而造成现代迷信的狂热弥漫全国，封建专制恶习横行神州；不仅没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反而造成文化专制，百花凋零；不仅没有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平，反而败坏社会风气，破坏了良好的道德风尚；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人民贫困，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和它所大肆宣扬的一套极其革命的词藻相反，不仅未能加速中国的前进，反而造成了停滞和倒退。真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严酷的现实使人们不能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搞错了，这样的“大革命”不仅不能进行多次，搞一次就到了亡党亡国的边缘，永远不能再搞了。

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文化革命。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多次谈到文化革命的问题。他提出要发展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扫除文盲，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等等，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四卷357页）列宁把实现文化革命，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说：“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论合作制》《列宁选集》四卷687页）我党在一九五八年以后，也多次提出了文化革命的问题，当时的角度和内容同列宁是一致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一篇社论《文化革命开始了》（1958年6月9日）指出：“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人们在实践中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要生产力进一步充分地得到发展，就要有文化，有技术。现在妨碍着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我国生产技术的落后和文化的落后”。搞“文化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很显然，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与此相对照，我们搞了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除了首先是从文化界开刀这一点同文化有一点联系外，哪里有一点文化革命的影子呢？！搞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是教育倒退，文化凋零，科技落伍，道德败坏，文盲大量增加。所以，它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文化大破坏。

名与实的出入如此之大，连毛泽东同志本人也感觉到了，所以，他在一九六八年就作了一条解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么？也不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选集》四卷111页）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夺取政权等等，都是在这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吗？没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变质，并不需要把它革掉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也没有被资产阶级篡夺，并不需要重新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因而，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就成了唐

吉珂德同风车作战式的主观虚构的十分荒唐的斗争。

从上可见，所谓“文化大革命”既不是文化革命，也不是政治革命，而且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不能称之为革命，从本质上说，只能说是一场大动乱，一场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我们党犯这个错误，是什么性质的呢？现在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比较一致了，认识到我们党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什么叫路线错误？这些年搞得很混乱，至今还没有一种众所公认的科学的概括。从总结党的历史的角度看，是否可以说路线错误需要具备这样几点：

第一，不是在一般问题和个别方面犯错误，而是在影响革命全面的根本问题上，如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对象、领导等问题上发生了错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八年曾说过：“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上，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以改正，我们就会失败。”（《关于土地改革》《毛泽东选集》四卷1284页）这五个政策，我认为都是关系到革命的根本问题。在革命根本问题上犯了原则错误，又没有及时改正，这应该是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不是实际工作的偏差，而是具有系统性的纲领性的意见和主张。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讲过的形成纲领、形成制度、形成政策。

第三，不是一般党员干部，而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系统的错误主张，或被党中央所接受，或虽未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但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恶果的。

我感到这三条是起码应该有的。如果大家同意的话，用此来衡量“文化大革命”，那么就可以说这几方面问题都是存在的。

“文化大革命”是有党中央正式通过的纲领的，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也是有理论的，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个纲领和理论却把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搞错了。

革命的任务搞错了。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不是要把经济建设提到首位，而是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政治革命，甚至是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政机关夺权。“文化大革命”以前，虽然也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是政治运动不断，但经济建设工作一直在进行，而且是放到重要地位。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就变成了压倒一切的东西了。按张春桥的话说：“只要革命搞好了，颗粒无收也可以”，这不只是量的问题，而且是全党的工作方向问题，这点文革十年和前十年是有质的不同的。

革命的对象搞错了。荒谬地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有个党内资产阶级，主观虚构了一个敌人。结果，把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当成了革命对象，要革那些“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打击迫害了党政的各级领导干部。

革命的动力搞错了。不是依靠工人阶级、不是依靠集体农民、也不是依靠党员和干部，而是依靠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造反派”。

革命的方法搞错了。不是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发扬民主，说服教育，和

风细雨，依遵法制，而是采取敌对的方法，粗暴的野蛮地污辱人格的错误手段，搞什么“踢开党委闹革命”，“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游街示众，戴高帽子，喷气式，监禁酷刑等等，人为地激化矛盾，自相残杀。

这样的错误，而且统治党长达十年之久，如果再不是路线错误，就没有路线错误了。所以，这次错误是一次全局性的长期地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有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左”倾路线和极左路线有何区别？我认为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左”倾路线就是比革命的左还要左的路线，也就是极左。所以两者没有本质上区别，那么，目前为什么还运用两个提法，我认为：一是政治的需要，两个提法有利于为全党和广大群众接受，有利于统一思想。二是表示出二者程度上客观存在的区别。例如，对刘少奇的打倒与打死，保护一批老干部与打倒一切；但这些差别都不是对待“文化大革命”根本态度的差别。

谁应该对这次路线错误负责？这是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负责任的，是亲自动手和领导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同志，他要负最主要的责任。其次，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谢富治一伙也要负责任。他们利用党犯了路线错误，推向极端，制造混乱，祸国殃民，篡党窃国，罪恶滔天。他们的罪责是无法逃避的。这里要说明一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罪行，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应该注意加以区别。最后，我们党也有责任。党的责任绝不应只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个人的，而应包括党中央的整体，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党中央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没有及时地纠正，没有作坚决的斗争，以至最后造成个人崇拜，破坏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党无力纠正自己领袖的错误，这个责任也是无可推诿的。

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阶段划分

十年动乱的历史，划为几个阶段合适，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历史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划分阶段的原则是应该同整个党史划分阶段的原则一致的，就是要从中国社会上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为标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以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此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成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况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了。”

文革十年，从始至终也有一个主要矛盾，这就是错误地主观虚构了一个敌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以打倒“走资派”，从他们手里夺权作为主要目的。敌人虽是虚构的，假想的，但假敌真打，一本正经地、认真地打了十年，构成了虽然荒唐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也只能以此为出发点去考察和划分阶段。同所谓“走资派”的矛盾，是十年一贯制的。但谁是“走资派”，要打倒的主要危险敌人是谁？各个阶段又

是不一样的。因此，矛盾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变化，也就反映出了阶段性。当然，这些阶段性并不是由什么人事先就规定好了的，按照一个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进行的。而是客观存在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所造成的结果。

根据这样的观点去分析文革十年，我们认为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炮打司令部，全国大动乱（1966.5—1969.4）

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决定成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开始了全国大动乱。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客观地构成了一个阶段。这三年是最混乱的三年，各种大小事件接连不断，夺权反夺权争斗不休。表面上看很乱，不好理解，但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各种事件和斗争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要打倒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

《五·一六通知》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旁，正在受到我们信用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六月一日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所谓“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使大家都明白了要打倒的是谁，支持红卫兵，号召大串联，是为了发动群众，掀起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支持“一月风暴”，号召全面夺权，是为了把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而当党内一批老同志起来维护党的正确政策，批评“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则出现了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如此等等。这一系列的斗争，无一不是围绕着“左”倾错误路线要打倒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样一个矛盾而发生的。

经过二年多的激烈复杂的斗争，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十月又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炮制的诬陷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决议，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同志的手续，又经过半年的筹备，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大多数地方党委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党员尚未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本身就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这次大会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高度，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肯定了打倒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丰功伟绩”，使左倾错误路线利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权威而更完备化和合法化了。

当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同刘少奇的矛盾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指导下产生的一个主观虚构的敌人。革命对象搞错了，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击了，那么随之而采取的一切行动和措施，当然全都错了。

二、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1969.5—1971.9）

林彪从一九五九年取代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就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掩盖下，大肆鼓吹个人迷信，深受毛泽东同志的赏识和信

任，被依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支臂膀。林彪野心膨胀，大搞阴谋，拉帮结派，组织大小舰队，逐渐组成了自己的反党集团。林彪集团同江青一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共同打倒刘少奇。但在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九大”可以说是林彪集团发展的全盛时期。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章。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叶群都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的一大批干部如：王秉璋、刘丰、周赤萍、程世清、王新、王维国等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真是权势赫赫，不可一世。随着权势的增大，野心也急骤膨胀，林彪集团就急于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建立父传子袭的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这时共同“治乱”的伙伴江青一伙，就被看成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对手和障碍。

林彪集团的抢班夺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企图通过合法的手段，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先让林彪成为国家主席，然后再当党的主席。一九七〇年八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基本上走的是这一条路子。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发动突然袭击，但被挫败了，证明此路不通。第二阶段，九届二中全会后，转而采取非法的暴力手段，全党批陈整风，逐步深入，自然就牵连到黄、吴、叶、李、邱等人，这些人也都被迫作了检讨。当时虽然还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但党中央采取的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一系列措施，无一不是针对林彪的。林彪一伙大起恐慌，认为接班人的位置岌岌可危。合法的手段行不通，就转而企图用非法的手段，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强行接班。一九七一年春，林彪指使林立果等人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暴乱计划《“571”工程纪要》。九月八日林彪下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手令，但又没能得逞。阴谋败露后，林贼携带妻、子及几个死党仓惶外逃，妄图投修叛国，结果折戟沉沙，遗臭万年。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这场斗争并不是原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预定要有的，而是在全国大动乱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最后矛盾转化了，逼使人们不能不进行了这样一场斗争。

三、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1971.9—1974.12）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同志受委托主持党政工作，他在必须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排除干扰，力抗危局，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和任用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使工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全国形势有所好转。

在这一期间，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正确决策和艰苦工作，外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了，中美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中日之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文化大革命”已搞了五年多，实践效果很坏，加上林彪叛逃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破产的标志，这时本来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最好时机，可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坚持和“四人帮”的煽惑，错过了这一时机，使动乱继续下去。

林彪集团复灭后，“四人帮”打扮成反林英雄的模样，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利用批林整风，保护和收容了一批林贼党羽，使自己的权势进一步发展。一九七二年九月，王洪文由上海调中央工作后，成为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从此，江青、张春桥、姚

文元、王洪文正式结成了“四人帮”。一九七三年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是“四人帮”发展的全盛时期。十大在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两面派行为，提高全党的识别能力方面是有重要意义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只能在肯定九大路线的前提下分析形势和提出任务，因此，不能从根本上纠正错误路线。大会选举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为党中央副主席，但由于采取了个人指定接班人的错误作法，使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副主席。加上康生成为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为政治局常委。他们采取圈定名单，指定代表等手段，将他们的一批亲信塞入党中央委员会，这样就使“四人帮”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并且几乎控制了报刊、广播、文艺等全部舆论大权。

随着权势的膨胀，“四人帮”的政治野心倍增，他们妄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他们组阁，从而逐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一九七四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给了“四人帮”以可乘之机。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批宰相，批大儒。后来又经过密谋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告状，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吹捧江青、张春桥，妄图由他取而代之，上台执政。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四人帮”的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同志也看到江青“积怨甚多”，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明确表示仍由周恩来同志当总理。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未能得逞。但是“四人帮”这样一股势力仍然存在，只是在一次大较量中受到了挫折，所以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标题中是用了“挫败”二字。

四、全面整顿，四人帮猖狂反扑，十月的历史性胜利（1975.1—1976.10）

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了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同志带病作报告，重申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会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以非凡的革命毅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克服巨大的阻力。同“四人帮”坚决斗争，批判派性，进行全面整顿，实际上在努力恢复八大的正确路线。时间虽不长，但收效显著，工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左倾空想错误却有进一步的发展，集中表现就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说成“同旧社会差不多”，期望用带有小生产平均主义色彩的办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就给了“四人帮”猖狂反扑以可乘之机。他们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名，宣扬“全面专政论”，鼓吹以“反经验主义为纲”，把矛头指向重新工作的一大批老干部。毛泽东同志看出“四人帮”搞帮派，有野心，曾支持对他们在政治局内进行批评；但看到邓小平同志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正确政策时，又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搞翻案，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批刘冰等人的上告信为由头，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乘机煽风点火，疯狂反扑，党和国家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同志逝世。周总理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掏尽红心为人民。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不得不说不说些违心之言，参与一些错误的决定，但党和人民深深地谅解他尊敬他，因为他只有这样才能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但是，广大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沉痛悼念却受到“四人帮”的无理压制。“四人帮”的党羽公开在上海贴出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又企图登台组阁。“四人帮”的种

种倒行逆施激起了无比的义愤，人民的愤怒已经无法抑制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老一辈革命家，优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英雄人物一直在进行抵制、反抗和斗争，如抵制批海瑞罢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二月逆流”，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上海的两次炮打张春桥等等。如果说，这些还主要是采取部分群众或个别斗争形式的话，那么到一九七六年春，反抗斗争就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出现了。

从南京事件开始，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丙辰清明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抗议错误路线、挽救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革命运动，并从此开始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就为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年老病重的情况下，听信了错误的汇报，错误地判定了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提议撤销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犯了一生中最后一次错误。但他提出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正确建议，没有把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这为以后粉碎“四人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晚年虽然犯了令人痛心的严重错误，但主观上还是为了维护革命，并且一直警惕地保卫着中国的安全。他的逝世使全国人民陷入深重的悲痛之中。

可是，“四人帮”却趁毛主席逝世之机，加紧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党和人民取得了划时代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六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很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相继逝世，“四人帮”猖狂作乱，政治上逆风滚滚；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百年不遇的严重自然灾害，真是星殒山崩、党国危难，是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之年，然而结局是好的。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从此又开辟了新的篇章。

这就是十年的大体轮廓。

三、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阶段。犯路线错误时间这么长，是党史上的第一次；涉及面大，损失严重，影响很深，是党史上空前的；特别是，这次错误路线的提出者和推行者，正是过去领导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深受党和人民爱戴、有极高威望的领袖，这也是历史上没有前例的。今天，我们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又要实事求是地批判和纠正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这就带来很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也是空前的。

这段历史刚刚过去。从昨天的事情就是历史的角度看，确实已经是历史。但正

因为它是刚刚走过去的历史就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同今天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大多数仍然活着，有些人还身居领导岗位；对其中一些事件的评价，直接涉及到现实的政治问题。因之较其他阶级的历史具有更大的政治敏感性。有时候你还没有感觉到，但已经触痛了某些人，甚至是相当的领导同志。这大概也是一种风险吧。第二，也是因为事情刚刚过去，很多事情往往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真相才会完全弄清；而人们的感情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平复，才能够更冷静而客观。列宁说过：“在一次深刻的政治变革之后，人民总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了解这种变革。”（《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三十三卷54页）这些都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困难。

既然有如此多的困难，是否可以把这段历史先放下，不研究，留给下一代去研究呢？不行。国内和现实的现实需要，使我们决不应消极等待，而必须马上动手研究这段历史。党中央、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同志一再作这样号召，党中央当前面临的任任务，非常繁多，但却把对建国三十年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花大力来抓，这都说明了事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起码有以下四点：

第一，研究这一段历史，有助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

我们说解放思想当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从错误的理论和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回归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从来如此的，似乎不应该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多年来由于不适当地夸大个人作用，搞个人崇拜，甚至煽动现代迷信的狂热，把个人的随便一句话或任何一个判断都称为“最高指示”，鼓吹什么“句句是真理”，而事实上根本不可能有永远正确，不说一句错话，每句话都代表真理的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结果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同对毛泽东思想缺乏统一的科学的理解，是有重大关系的。

造成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一致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三条：

1.毛泽东同志本人在晚年由于种种原因而发生了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脱离集体的缺点，本人坚持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加上身边有一些坏人包围，因而就产生重大失误，在一些问题上严重地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他晚年的一些著作和言论同毛泽东思想发生了矛盾，以致使一些人对毛泽东思想本身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混乱。

2.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煽动个人崇拜的狂热。他们以学习和解释毛著作权威的姿态，任意断章摘取毛泽东同志的个别词句，甚至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某些指示，加以夸大，推向极端，祸国殃民。这种名为推崇毛泽东思想，而实则背离毛泽东思想的阴险手法，也是造成思想大混乱的一个祸根。

3.用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造成混乱的原因之一。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还在一段时间内被大肆宣扬过的“两个凡是”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恶劣

的典型。这种错误的态度，加重了人民的精神枷锁，制造了新的思想束缚和禁区，使人们拘泥于个别词句，而不能领会精神实质。

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表现的集中而突出。所以，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去分析和研究这一段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和敌我界限，总结经验，作为今日之借鉴，就必然会有助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而有助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完整准确的理解。

对一个党来说，指导思想问题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没有对毛泽东思想的统一的理解，我们党就不能统一思想，统一步伐，高举红旗，奋勇前进。所以，这是当前一件十分迫切需要搞好的大事。

第二，研究这一段历史，才能总结历史经验，作为今天我们要建设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切近的参考。

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整个世界上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很多，它们各有特点、长处，也各有其缺欠，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可以效法的典型。认真地研究吸取这方面的经验作为借鉴，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过去我们对这方面注意研究总结不够，今后需要加强。但是从根本上说，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强国，首要的是从本国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找出自己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特点的道路，这一点外国有识之士也是看到的，比如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十月二十一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时就说：“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不可能沿袭任何外国的经验。你们需要确定自己的道路，采用自己的方式。”（《人民日报》1980年10月22日）。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这条道路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走了十年的大弯路，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就更值得认真总结。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完整地认识客观规律，仅仅有成功的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失败的经验，只有具备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才能从比较鉴别中更好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恩选集》四卷458页）列宁也指出：“历史上的伟大战争和革命的伟大任务都是这样来解决的：先进阶级不止一次两次的进行冲击，取得失败的经验以后才能得到胜利。”（《走向轨道》，《列宁全集》十五卷324页）我们要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革命任务，我们已经具备了成功和失败两方面的经验，从这一点说，我们的事业成功是大有希望的。

但是要使“文化大革命”这次大曲折、大失败真正变成经验，变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态度不对头，“文化大革命”也可能只是一个可怕的伤痕和痛苦的回忆，那样，高昂的学费我们白花了。我感觉有两种态度是不好的，一种是闭眼不看现实，不能勇敢地承认“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了，不敢正视自己所犯的错误，甚至还要坚持已经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的那一套错误的东西，另一种是消极悲观，丧失信心，甚至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北京有一个青年工人在回答幸福是什么的时候，竟写道，他的最大幸福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呆一分钟。当然，象这样的人只是极

少数。但如不克服这两种错误态度，“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是总结不好的。什么是正确态度呢？刘少奇同志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过一段话，我认为讲得好的。他说：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篋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无从总结，坏事就不能变成好事。看来，只有勇敢地正视错误，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才能总结出有益的教训，以利于革命事业。

第三，研究这一段历史，才能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党和我们自己。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大动乱。正如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所形象地描写的那样：“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了一个身，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了。”（《沉滓的泛起》）新中国的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当然不是一个“停滞多年的池塘”，但历次运动都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搅动得厉害，真是“史无前例”，“天翻地复”，于是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来显示自己的存在，各种各样千奇百怪五花八门的事情都出现，这样一来就给了一个认识中国社会的极好机会。

“文化大革命”曾有一个说法流传较广，就是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最彻底，反封建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总是强调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而很少有人讲要反对封建主义复辟。可是，十年这么一折腾，大家的看法就改变了，原来反封建的任务虽然政治和经济任务方面完成了，但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又是要搞父传子的林家王朝，又是要当“女皇”，什么血统论、株连九族、行帮思想、封建特权、老爷衙内，种种野蛮的惨无人道的肉刑等等，这些东西来一个大出笼，就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认识到了反对封建余毒仍是今日中国的一项迫切任务。大家群起而攻之，封建余毒就扫清有日了。

又如，五十年代流传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党人数最多，经验最丰富，理论水平最高，领导核心最坚强，似乎一切完美无缺，整天“光荣、伟大、正确”不离口。“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党内不仅有“走资派”，有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有个“党内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线专了多年政，于是一无是处，非彻底砸烂了再“重建”不行。这么一大反复，对我们党的认识就更全面了。党确实伟大，有光荣的历史，有很多正确的决策，但也有错误，光明面是主要的，但也有阴暗面，需要一分为二。这样认识就更实际了。党中央最近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正确方针，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经验的一个总结。这方面的事例，大家只要认真想一想，一定会举出很多的。

至于认识我们自己，每个同志都可以谈出很多体会，这里只点一个题目就够了。

第四，研究这一段历史，有利于帮助世界革命人民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宝贵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发生于中国，但它的影响却遍于全世界，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十分关切的问题。事实上，现在全世界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议论纷纷，譬如前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朗教授是一位多年研究苏联

经济计划问题的著名经济学教授。文革期间曾两次来华访问，并写了《中国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一书，1974年版，观点是极左的。1977年5月11日他发表公开信，辞去法中友协主席的职务。他认为张春桥、姚文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基础的分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我们粉碎“四人帮”反倒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贝特兰的辞职信发表后，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加拿大专家尼尔·伯顿写了一篇文章叫《为新政权辩护》，反驳了贝的一些观点。1978年3月贝特兰又写了一篇文章《大跃退》，对我进行了全面攻击。在加拿大约克大学任历史教授的陈志让（华人），写了一篇《“大跃进”剖析》对贝特兰的观点进行了驳斥。这些情况说明，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早就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公开的辩论了。贝特兰的观点，说明极左思潮不是一国一地的现象，值得注意。当然也有另一种，比如有一个日本记者叫柴田穗，曾经是东京朝日新闻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1967年9月被我驱逐回国。这个人从1977年1月开始，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他的专著《毛泽东的悲剧》一直到1979年5月，共六百四十回，现在已经汇集成厚厚的五大卷，而且还以“事实准确，观点有见地”而获得了日本的菊池宽奖。其实其中很多胡说八道的东西，完全用资产阶级权力斗争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问题。香港、台湾的报刊杂志上各种评论就更多了，有些明显地在那里造谣、歪曲、攻击。他们这些东西向全世界发行，流传很广。

“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亲身参加者，最有发言权的应当是我们，可是我们都长期默不作声，至今在全国报刊上还没有什么论述“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作。我们不说话，就等于听任他们那些荒谬的东西继续影响全世界人民。当然报刊上什么时候公开讲，这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能自由行动。但是研究这段历史，实在不应该再迟迟不上马了。我想我们这一代党史工作者应该有信心和勇气，把研究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承担起来。

四、研究“文化大革命”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学习和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的原则同整个历史科学是一样的，就是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具体到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想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客观地历史地考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失败的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大悲剧，这是已经引起普遍思考的大问题。在思考当中特别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防止突出个人的唯心史观。因为过去一直宣传“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把功劳完全归之于一个人。现在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搞错了，就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过错归之于一个人。办法很简便，但是不科学。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三中全会以前，在宣传工作上也有

另外一种毛病，就是把一切罪过都加在林彪、“四人帮”的头上，这种作法实践证明也是失败的。中国人不信，外国也不信。有一位对华友好的外国作家就说，在中国谁犯了错误，谁就是脏纸篓，一切脏东西都往里扔。这样的宣传是失败的。前面提到那位不同意贝特兰观点的尼尔·伯顿先生，在他的《为新政权辩护》一文中也指出：“官方的《人民日报》使用不多几个月前他们遣责邓小平时曾经使用过的同样语言来描绘那四个人……是以用了多年的陈词滥调写成的……说这些东西很难减少我们思想混乱。”

（《国外思潮》第二册15页）

恩格斯在一封给斐·拉萨尔的信中曾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的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恩选集》第四卷343页）就是说，毛泽东同志也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也不应该从他的“个人欲望中”去寻找，而应该研究他所代表的一定的历史潮流。是一种什么样的潮流呢？就是一种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基本特点的带有浓厚的小农社会主义色彩的左倾思潮。“文化大革命”正是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我们党内滋长起来的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产物。无庸讳言，很多关于阶级斗争的错误提法和判断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但是，他每一次提出来的观点都为我们党所接受了。这样就使这左的思潮逐渐发展而难以纠正。这个左倾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当然有它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有国内条件也有国际条件。廖盖隆同志谈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五个方面的原因，很有启发。而这些正是我们要着重去分析和研究的。在讨论中有的同志对左倾空想怎么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感到不好理解，我想对这个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毛泽东同志的左倾空想问题，从现在接触的材料中有三次比较突出：一次是五八年，以北戴河讲话和印发张鲁传为代表；一次是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一次是七四年底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从这些讲话和指示中可以看出，它的内容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号召下，消灭商品、货币、恢复供给制，实行平均主义的农民共产主义，而实行的办法，主要是搞阶级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

这样的一种理想和作法是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的，必然要遭到党内外各种形式的抵制和反对，也得不到中央领导的赞成。而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他这一套才是马克思主义，谁要稍有不同意见，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摇摆，就是“搞修正主义”，要“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就必然要人为地加剧党内矛盾。一九五八年批判了周恩来、陈云同志，五九年批判了彭德怀、张闻天同志，也波及朱德同志，六二年以后又对刘少奇同志不满，只有一个林彪被认为是忠于他的。这种情况不能不是促使他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潮的产物，根本违反了广大群众的基本利益，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它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在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时，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但要分析个人的错误。

任何历史事件总是由一定的人去参加、领导和进行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同时，从来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

作用，而是认为指导运动的人物的个人特性、品质、思想等因素，对历史发展是起一定作用的。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时候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一卷26页）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现代迷信盛行，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破坏，党政军一切大权都集中于一个人，在这样情况下，个人的因素影响就比平时为大。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想法，说的一句话，都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思想和活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于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胡乔木同志曾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毛泽东同志有一种左的空想（或革命空想）的共产主义的模式，并提出“五·七指示”和“理论的指示”为例，这样一种有启发性的观点，就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我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就应该在分析整个错误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对于个人的功过作出比较恰当的评价。

在我们中国有一种古老的传统，叫作“为尊者讳”。按照历史学家陈垣教授的考据：“避讳为中国特有的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史讳举例》序）对于我们所尊敬的人，总是讳其过，明明错了，硬是不承认，甚至还千方百计地打圆场。这样做动机也可能是好的，是为了爱护领袖，但是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十年动乱的痛苦教训告诉我们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决不应该把领导人的过错隐藏起来，相反地倒是应该让群众都知道。这样，才能把领导人置于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之下。这一点毛泽东同志也是赞成的，他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说：“似乎我们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为尊者讳”也是一种封建主义的陋习，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分析问题的一大障碍，应该彻底扫除。

第三，要排除利害和感情的干扰，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力戒形而上学的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

具体地分析具体事物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这是普遍适用的原则，而对于学习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尤为需要。“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社会大动乱，领导的错误，坏人的煽动破坏，投机者的拍马钻营，人民的反抗斗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地搅合在一起，使事物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更冷静更客观更慎重地对待每一件事物，深入调查研究，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要做到这一点，当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利害和感情的干扰。“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千万人受冲击、受株连的人，据有的领导同志估计达一亿人。这一场政治运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但也不能说没有极少数人是受益者，身居领导职位，他们必然要千方百计阻碍正确评价文革。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都有个不同经历和感受，因此在分析和研究问题时，特别是同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常常不容易保持冷静和客观。同一件事，受害者和受益者的感情是不可能一样的。另外由于在事件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看法也会不同。领导其事者和处于一般地位的人看法也可能是

一致的。比如对于支左问题，我们在一个稿子上曾这样写：“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当时的全国大局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指导‘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在总体上错了，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破坏，三支两军工作发生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这在当时的复杂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这个稿子拿到党校学员中去讨论，就有种种不同意见。大体上是地方的同志认为评价太高了，而部队里的同志则认为对功绩估价不足。两者截然相反。

列宁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选集》二卷1页）可见利益关系对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妨碍极大。必须排除利害和成绩的干扰，才能做到冷静的科学的分析态度，作出实事求是的研究结论。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应该努力做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真理。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论联合政府》）这同样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言论和行动的最高标准。

第四，充分认识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总结经验，增强信心。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是我们党犯错误的历史，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受挫折、人民遭磨难的历史，是我们党遭受极大破坏的历史。讲胜利的历史，很容易使人欢欣鼓舞，兴高彩烈；而讲受挫折的历史，失败的历史，又常常容易使人消极埋怨，甚至垂头丧气。这种情况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党史工作者是应该力求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历史通常是依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列宁选集》一卷715页）毛泽东同志也教导我们，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至今仍是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仍在通过实践而不断完善过程之中，在从事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不经历艰难曲折，不冒各种风险，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设想的。当然，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长期的路线错误是应该力求避免的。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曾谈到这样的意思：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给我们确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但是路究竟怎么走，那要靠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去解决。在这种创造新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每一个单独的具体的实践，都可能是不完整的，有错误的，甚至走了弯路。但如果没有这每一个单独的有缺点实践，就不能实现完满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只有通过这样一些错误，“才能给自己打通一条通过千重障碍而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列宁全集》二十八卷54页）

马克思主义比世界上任何主义都高明的地方，就在于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们能够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而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潮流，永远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我们学习和研究“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的历史，同样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五·一六通知》剖析（初稿）

——《五·一六通知》是集中代表“左”倾路线的文件

谭宗级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是，毋庸讳言，他在晚年也有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从纲领路线来看，集中表现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上。

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完全错误的，是“左”倾路线的错误。这场“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带来的只是混乱和灾难。它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内乱，一种自杀行为，自己毁灭自己。指导这场“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集中代表“左”倾路线的文件。它是从1957年以来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继续和恶性发展，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产物。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个文件，把它推向极端，持续危害十年之久，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对《五·一六通知》的剖析，我分做三个问题来谈：一、《五·一六通知》发表时的历史概况；二、《五·一六通知》是“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三、《五·一六通知》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

（一）《五·一六通知》发表时的历史概况

《五·一六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展开，正如毛泽东同志1970年12月18日会见斯诺时说的：“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这里说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就是指通过《五·一六通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打倒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此，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

（1）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

批判剧本《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序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一文的写作和发表，是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准备，由毛泽东同志批准的。事关“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准备这样严重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竟完全不了解。

吴晗同志（1909——1969年10月11日）是平白无辜的受害者。他原是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我国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发表的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剧本，是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而写的。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谈到生产指标过高，有的同志不敢实事求是地提出意见，毛泽东同志对这种不敢讲真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现在缺少海瑞。一次毛泽东同志在看湘戏《生死牌》又名《三女抢板》，戏的结尾出现了海瑞，把《明史·海瑞传》找出来看，接着讲了一段海瑞的故事。说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家皆净也”，还把这话写进给皇帝的奏疏里。以后被关进监狱。有一天，忽然拿酒给他吃，他很奇怪，问看监的老头，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一场，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讲了以后，还把《明史》给了彭德怀同志看。毛泽东同志又讲，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事后，胡乔木同志把这个意思转给吴晗同志，建议他写些海瑞的文章。吴晗欣然应命，很快写出《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人民日报》上。9月，又写了《海瑞罢官》。时值庐山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联系，也素无私人交往。由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对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恐惧心理，特别在《论海瑞》一文的末尾捎上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示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与彭德怀同志“假冒”海瑞划清界限。显然这些题外的话用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是不公正的。但在特定条件下，吴晗是想为一篇又一篇的海瑞文章避嫌，为自己挖了一条防空壕。继《论海瑞》之后，吴晗还写了《海瑞的故事》等几篇，很受读者好评。京剧《海瑞罢官》是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同志的约请而写的，最初剧名定为《海瑞》，后经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同志建议，为了同其他海瑞戏相区别，第四稿才改题为《海瑞罢官》。1961年京剧本发表并演出，受到群众欢迎。以上情况说明，吴晗写《海瑞罢官》完全是凑巧的机会促成的，它和庐山会议、为彭德怀同志翻案等问题毫不相干。

江青批判吴晗，则是有组织、有计划选择的一个反党乱国的突破口。早在1962年，江青找到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但是江青并不甘心，1964年下半年，又找人民日报社李希凡同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加以谢绝。1965年初，江青窜到上海，与张春桥拍板成交，非法搞了一个同中央并行的、背着中央的秘密集团，“借用上海攻打北京”。同年八月底，定下以批“退田”联系“翻案风”、“单干风”的主题。为掩人耳目，写出的批判稿都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直送北京江青处，鬼鬼祟祟，约定向周恩来同志和中央常委中分管文艺的同志封锁消息。文章写成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不在《人民日报》发表，而于1965年11月

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然后观察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是否转载。很明显，文章不是作为文化问题、限于一个剧本来进行讨论，而是针对北京市委、针对党中央，作为全局性问题提了出来。姚文出笼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认为姚文元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央并没有通知各地转载，《北京日报》可以不转载。北京市委调查了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证明吴晗历史清白，为保护吴晗作了政治准备。由于北京市报刊十几天不予转载，发难者要出版小册子，以扩大、加强攻势。当时北京新华书店接到上海新华书店一个征求预订的电话，根本没有向北京市委打招呼，北京市委理所当然地置之不理。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并加了按语，这是经周恩来同志修改过的。其中大段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贯彻“双百”方针，讨论问题应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周恩来同志曾对吴晗说：“吴老哈，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发展，这种保护没有得以实现。在江青组织策划下，又接连发表了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载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关锋和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载《红旗》1966年第五期，4月5日出版），把吴晗同志在庐山会议前后写的作品，都同彭德怀同志罢官一事生拉活扯地联系起来。《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突变为“罢官”，吴晗的问题立即具有“反党”性质。这样，对曾经保护过吴晗的北京市委进行全力打击，就有了突破口。紧接着，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显著地刊载江青化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同天，《光明日报》也在显著地位刊登署名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仅隔两天，姚文元在上海又抛出《评“三家村”》，此文是江青、张春桥直接掌握写成的，从上海发稿，要全国各报刊登，传出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要《人民日报》刊登时不许错一个字，如有差错，以总编辑是问。同天，戚本禹抛出《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这几篇文章交织成一张猛烈的火力网，矛头直指北京市委。这样，把邓拓、吴晗同志迫害致死，也把彭真同志打倒了，并使北京市委陷于瘫痪。1967年5月18日《红旗》、《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指出：“《五·一六通知》揭露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使这个集团破产了。这是一个突破口”。一语破的。因此，江青组织姚文元写文章时，“斗争”目标早已预定，而吴晗不过是一系列突破口中的第一个突破口而已。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则是康生最先提出来的。1966年2月初，彭真、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同志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同年4月25日和5月5日在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自己也说：“64年的时候，我向主席讲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6月3日，康生同越南胡志明同志谈话时，再一次阐明他的观点：“我曾向毛主席讲过，《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有联系，因为他提出退田分给贫民的口号，彭德怀也提出要单干”。江青抓住《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大做文章，完全是由“斗争”目标需要而选定的。江青曾经洋洋得意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九大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

——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十分明显，为了打倒刘少奇必须先打倒彭真，为了打倒彭真就要从吴晗开刀，这是江青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斗争策略。只要达到这个既定目标，就可以不择任何手段。这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做的一切，也是他们把这个问题写进《五·一六通知》的用意所在。

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江青和林彪相互勾结，由江青出面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林、陈亚丁等进行座谈）。根据这次座谈会整理而成的《纪要》，抛出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种谬论全盘否定我国三十年代文艺的重大成就，全面否定建国十七年来我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丑化社会主义现实，把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黑线统治，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关于林彪与江青如何勾结兴妖作怪，另有专题叙述，这里从略）。

（2）打倒彭、罗、陆、杨为开展“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扫除障碍。

林彪经过精心密谋策划，由叶群向毛泽东同志诬告罗瑞卿同志“逼林彪让位”、“有篡军反党的野心”。然后中央于1966年4、5月间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进行毫无根据的批判。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下，彭、罗、陆、杨四同志被打成“反党集团”。经过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并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宣部长的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不正常关系”。这样彭、罗、陆、杨就被作为“反党集团”打倒了，扫除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这方面的情况，另有专题叙述，这里从略。

（3）《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和发表。

《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此，剖析《五·一六通知》，必须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谈起。

1964年5、6月间（确切时间待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了一天会，对批判吴晗同志的情况及继续批判问题进行讨论，与会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住院开刀，未参加），以及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十一人。会议由彭真同志主持。早在这次会议以前，康生就已授意关锋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文章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的。当时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说法。彭真同志也说了查不到吴晗同志与彭德怀同志有什么联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讨论中要坚持真理

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康生当时并未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说不管怎样，关锋的文章修改后可以发表。许立群、姚溱同志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于2月7日写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共分六点：第一点讲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任务；第二点讲方针；第三点讲队伍；第四点讲左派要互相帮助；第五点讲准备工作；第六点讲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二月提纲》阐述了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根本问题。其中关于当前学术批判的性质和目的，《提纲》指出，从批判《海瑞罢官》、“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等为内容的大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方针，《提纲》指出，要“坚持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也就是说各种不同意见（包括反马列主义的东西）都充分地放出来，在针锋相对的矛盾的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真正地驳倒和摧毁他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关于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它规定要“慎重”。关于队伍问题，《提纲》说：“要依靠坚定的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同时，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左派要整风的指示，提出了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道路”的警告。如上所述，《二月提纲》除了把学术讨论的性质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显然是“左”的错误而外，其它关于解决学术讨论问题方针、政策的规定，还是比较符合解决学术问题的规律的，这与康生、江青等人动辄扣帽子，打棍子，枪杀和摧残学术的恶劣行径是截然不同的。总之，《二月提纲》只不过是试图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它类似批判略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中央的领导之下而已。

《二月提纲》原是向中央汇报用的。2月3日，彭真同志和康生等先向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大家都同意。2月8日，彭真、康生、吴冷西、胡绳、田家英等到武汉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在听取汇报时，对中宣部搞的有关何明（即关锋）的文章的材料表示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左派的问题以后再说。在汇报中谈及“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毛泽东同志说，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是要到史学界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据说，毛主席宽的精神，对两边都是宽的精神。对吴晗一边，毛泽东同志问：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同志回答说，他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那一边。毛泽东同志说，吴晗不要罢官，还是当他的副市长，这样讨论就可以放了吧！康生后来诡称，《二月提纲》是背着搞出来的。其实，他既参加了事先的讨论，又参加了对中央的两次汇报，并未有任何反对意见。彭真同志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同志表示，同意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同意林彪的“顶峰”和“最高最活”一类提法，要

彭真和康生去上海期间，顺道到苏州同林彪谈一谈。2月12日，彭真、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等到上海，把《二月提纲》给江青、张春桥看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没有异议。《二月提纲》在向毛泽东同志汇报过后，于2月12日前作中央文件发到全党，不久即被毛泽东同志指为“修正主义纲领”。

一九六六年三月下旬，康生到上海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中日两党会谈情况，说中日两党联合公报已经商定，宫木显治坚持不点名批判苏修，刘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常委讨论后表示同意了。毛泽东同志说，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毛泽东同志也不接见宫木了。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同志主持的常委不满意，就是苏共二十三大发来邀请信，毛泽东同志未定可否，要在京常委会讨论，常委提出应邀进行斗争的方案。毛泽东同志给予否定，于三月二十四日公布中共中央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参看斯诺著《漫长的革命》16—21页）康生在国际问题谈完后，乘机告状，说彭真同志于三月十一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问上海发姚文化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康生说：“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在康生的挑动下，毛泽东同志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毛泽东同志针对彭真、陆定一同志讲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康生于三月底回到北京，即向钓鱼台写作班子作了传达，并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材料，作为他四月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报告的蓝本。康生传达说，主席说陆定一的中宣部长是阎王殿，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康生的传达，既有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有自己的话，也有他理解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话，混杂不清。根据康生的传达，康生要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宣布《二月提纲》作废。通知初稿写出后，毛泽东同志认为写得太简单，不能用，指示陈伯达主稿，另写一个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陈伯达找王力共同起草，送毛泽东同志修改两次。康生说，光有通知不够，还要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下发。大事记由王力、李鑫起草。后成立文件起草小组（即文革小组的前身），成员有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吴冷西、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陈亚丁。两个文件就由起草小组执笔，通知以陈伯达为主，大事记以康生为主，实际上都由江青主持。康生说，错误不能人人有份，五人小组要给吴冷西开脱。王力深知其意，首先是要给康生开脱。王力就在“大事记”里写了一段：“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准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这完全是为康生开脱的谎言。康生还说，特别是毛泽东同志讲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话一定要整理上。四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对《通知》又修改了两遍，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只能接受以批判《二月提纲》为由的《五·一六通知》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以中发〔66〕267号文件下达，同时，按照康生旨意写成的歪曲事实真相的《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也一并下发。这两个文件发至县、团一级党委，起初党内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

部，以后逐步扩大传达范围。《通知》于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公开发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五月十五日一夜决定的，说社论来不及了，可以晚一天发表。发表《通知》时，毛泽东同志将“彭真同志”中的同志二字删去了。五月十八日发表《红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此文由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集体起草，经毛泽东同志审阅修改后发表。“三个阶段”和“里程碑”的提法是王力提出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又发表《伟大的战略措施》一文。直到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还发表《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可见对《通知》是十分重视的。根据《通知》的要求，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撤销了按照《二月提纲》建立的学术批判办公室，另行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和办事机构。

根据《五·一六通知》的要求，五月底，陈伯达率领穆欣、唐平铸等人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一举夺了吴冷西的权。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连续五天，每天一篇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并大肆宣扬林彪的那套鼓吹现代迷信的黑货。六月二日刊登聂元梓等人写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炮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公开煽动要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摧毁党的组织，矛头针对北京市委，在全国掀起把矛头指向各地党委的风潮。六月四日，公布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派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加发一篇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以后隔一两天，就发一篇社论，还转载《解放军报》关于“文化大革命”宣传教育要点，《红旗》社论等，几乎每天都有号召，大造舆论。在极“左”思潮的煽动和反修防修美好词藻的诱惑下，学生和青少年富于革命热情，但盲目性很大，他们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自己都很不了解，出于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信赖，加上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和其他缺点的不满，希望改革，群起响应，一批所谓“勇敢的闯将”闻风而动，带头兴起了红卫兵运动，他们首先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和党政机关，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恶浪，并很快席卷全国。这样，轰轰烈烈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了。

（二）《五·一六通知》是“左”的理论、 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

从《五·一六通知》的结构来看，它包括三部分。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二是罗织《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逐条批驳，提出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从内容上看，《五·一六通知》是《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姊妹篇，它把“黑线专政论”推广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雏型。《通知》的问题很多，下面抽出四个方面问题进行剖析、批判。

一、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主观臆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正确地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前提和科学依据。列宁说：“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列宁全集》二十五卷二六六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列宁全集》二十四卷二三页）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之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就是由于我们党能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严格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愿，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因而我们就能和人民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反之，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背离了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量。

《通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它用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口吻，来概括六十年代前期学术领域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在第九条里写道：“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危言耸听，骇人听闻，一笔抹煞了建国十七年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的成就和主流。它进一步发挥“黑线专政论”，认为“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十三个方面”（即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这些文化领域各种艺术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都是“毒草丛生，坏人当道”。这些说法，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学术界和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左”倾思潮严重，民主风气不够。在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之后，一方面是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是“宁左勿右”的思想情绪逐渐滋长，相当普遍。上自主管宣传的领导机关，下到学术文化的各个部门，套框子，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文艺界批了一些人的作品，哲学界批了杨献珍、冯定同志，经济学界批了孙冶方同志，历史学界批了尚钺同志。批尚钺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批他三个问题——“魏晋封建论”、“唐宋资本主义萌芽”、“明清之际进入近代”，总起来是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给他戴上修正主义、托派观点的大帽子。当然，尚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但毕竟是学术问题，不能因为苏联史学界有类似观点，就给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修正主义帽子。对错误观点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说理，以理服人，扣帽子，打棍子，毕竟不是对待学术争论和进行

理论斗争的正当手段。

学术界、文化界的这种情况，到六一年传达周恩来、陈毅同志在广州讲话和六二年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才有所缓和。但为时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还讲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番话。紧接着，一九六三至六四年写“九评”，批苏修。在这种背景下，学术文化领域的“左”倾思潮又普遍高涨了，错误地批判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和学术观点，打击了许多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并且往往硬说他们是服务于某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因而对他们的批判实际上成为政治诬陷。例如，诬陷李建彤同志写的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就是典型的事例。到一九六五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批判本《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后，特别是报上一再点了吴晗、翦伯赞同志的名之后，情况那就不同了，那就不是什么学术问题，理论批评了，这种政治诬陷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坚决拥护党的主张，痛恨国民党的卖国独裁统治，在党领导下，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深受进步青年和学生的爱戴。一九四八年秋，他积极响应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逃出国统区，奔赴解放区。解放后，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在党的长期教育下，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锻炼和考验，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先进战士，象吴晗这样长期和党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竟被扣上“反党”、“反共”的大帽子，难怪翦伯赞同志说：“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翦伯赞同志是早在抗日战争前入党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时他的学术观点也被升级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说同他的争论“不是一般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就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了。《通知》下达后，什么学术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统统被取消了。从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共老手”，“三反分子”的帽子满天飞，陷人于罪的棍子到处打，大兴文字狱，祸患无穷。

《通知》不但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的错误估计和判断，而且对六十年代中期的整个党内和国内形势也作了同样错误的估计和判断。最使人感到“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就是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倒数第二段）而且还认为，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个别的”、“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不是个别部门、个别地区有这样的人物，而是“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第一段）把敌情估计得十分严重，认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篡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且渗透党、政、军、民各部门，遍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真是达到

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连我们党直接掌握和依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也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为林彪、“四人帮”一伙“揪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提供了理论依据）。照此说来，我们党我们国家已经是“阴霾满天”，“危机四伏”，眼看就要“党变修，国变色”，面临着“赫鲁晓夫上台”的现实危险了！这是一幅把现实歪曲的多么可怕的阴森恐怖的图画！

正是根据这样的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围（只能说是从文化界开刀，打开缺口），而被称为“一场政治大革命”。什么叫“政治革命”？即《通知》指出的，“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结语，倒数第三段）即“夺权”。列宁说过：“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的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基本的标志”。（《列宁选集》三卷一三页）

《通知》就是从“夺权”这个意义上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在于当时是不是出现了上面所讲的那种全国性的政治危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是不是面临着重大威胁，以至于我们必须发动这样一场“政治大革命”？六十年代中期发动这场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和“非常及时”的？

现在看得很清楚，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危机。相反，那时由于三年困难迅速得到克服，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是信服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充满信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巩固的。当时人民的愿望和客观形势的要求是：进一步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说，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党把全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力以赴，为高度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落后面貌而奋斗。这是六十年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换句话说，当时并不存在政治革命的形势。列宁多次讲过，只有到了“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而且“上层”也不能照旧统治和管理下去的时候，才出现革命形势。很明显，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并未出现那样的局面。即使存在某些残余形态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存在改革上层建筑、调整生产关系的问题，也不需要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大革命”来解决。客观形势并未提出这样的任务。因此，这场运动的发动，使全党全国人民感到非常突然，对运动“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说到底，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人为地发动起来的。而实践证明，这样做是违反了人民的意愿，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打乱了历史的正常进程，必然得不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其结果导致了混乱和倒退，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和破坏，导致了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几乎亡党亡国。但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把党的工作着重点逐步转移到四化建设上来，使我国重新走上建设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是付了何等巨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啊。

一、根本颠倒敌我关系，把斗争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即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列宁说：“无论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就应该承认，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

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宁全集》二十五卷二四五页）毛泽东同志也一再强调分清敌我的重要性，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恰恰在这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犯了根本错误。《通知》由于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和主观臆断，因而夸大敌情，根本颠倒敌我关系，误把广大干部视为“走资派”，把广大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视为“反动学术权威”，号召对他们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直至夺取他们的“领导权”，“清洗这些人”。实际上，是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统统打倒。

这场“大革命”的对象，完全是人为的制造出来的，是以对我们党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状况所作的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主观臆断为基础的。首先，“党内走资派”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是臆造的假想。在我们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即当权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虽然党内也混进了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但在党内没有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究竟指什么人，从提出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并无确定的标准，完全凭个人的好恶来决定，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时一个人竟可以昨天是“走资派”，今天是革命派，明天又是“走资派”，全看他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几个核心人物的“态度”如何。这一提法最初见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发布的《二十三条》：“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一个概念来规定运动对象，是很不严密、很不妥当的，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引出一条“左”倾路线。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很难给它下个确切的定义。一九六三年农村社教运动开始时，要解放的是一部分农村干部“四不清”的问题，即在经济上反对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在政治上反对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对地富“斗争不力”，与地富“划不清界线”等；在组织上反对队伍不纯；在思想上反对损公肥私等等。有个别蜕化变质的，本来就有固有的名称，就是“蜕化变质分子”嘛。为什么说他是“走资派”呢？不确切。又比如贪污分子，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贪污在任何社会都是犯法的，不容许的，把他说成是“走资派”怎么解释得通！因此，“走资派”这个概念是毫无意义的，只能引起制造混乱。那时，主要整的还是农村基层干部，如生产队长、大队长、支部书记、公社主任、书记等。《通知》和《十六条》仍继续沿用这一提法。“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扩大到上起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下到基层支部书记、甚至汽车组长、炊事组长，都可以成为夺权的对象。因为“走资派”的概念内涵不清，只要沾一点“权”的边（如炊事组长，掌握瓢勺把子），就是“当权派”，就可被打成“走资派”。一点小错误都可以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来都是搞社会主义的，但因持有不同意见，我这一套是社会主义的，你反对我，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逻辑，你只要在工作中说过一句同《毛主席语录》有点不同的话，犯过一点错误，都可以被打成“走资派”，不仅如此，而且“走资派”的外延很广，随便可以打出几百万多“走资派”来。正因为“走资派”是一个没有明确规定又不科学的概念，林彪、“四人帮”可以利用它来打倒他们想打倒的任何人。“走资本主义道路”顾名思义，一定是属于右的性质，单提反对资本主义，就是

只许反右，不许反“左”，结果只能是“左”了还要“左”，以“左”反右，越反越“左”。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能够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大搞“普遍罢官”，“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绝不是偶然的。等到“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起来了，再往回收，说“对走资派要做具体分析，不要认为走资派都是坏人，犯走资派错误的也有好人”。可是，混乱之势已成，严重的后果已难挽回。

用“整”这个动词来指阶级斗争的方式，必然导致“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无视党纪国法，草菅人命的恶果。虽然解放后我们搞过整风，整社运动，但那是对事而不是对人，又当别论。社教运动开始时，虽然也说过对干部要洗“温水澡”，但一提出“整”之后，在多数单位把干部几乎全部赶上了“楼”，而且很难“下来”。到“文革”时，这个“整”字就发展到淋漓尽致了：什么“炮轰”、“火烧”、“油炸”、“砸烂狗头”之类全出笼了。林彪、“四人帮”狂叫的“要把他们统统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正是从“整”字引伸出采的吗？

总之，“走资派”是个不科学的概念。“走资本主义道路”涵义不明确，“当权派”所指又非常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分不清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给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大开“整人”之门，用来无限上纲，打倒一切。“文革”期间，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如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后补委员三十三人，除去世三人外，遭诬受害的二十三人，为总数的76.6%；中央书记处十七人，遭诬受害的十四人，占总数的82.4%；军委副主席七人，遭诬害的六人，占总数的85.7%；三届人大常委委员长和副委员长是中委的十人，遭诬害的七人，占总数的70%；国务院副总理十五人遭诬害的十三人，占总数的86.7%；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六人，除一人去世外，遭诬的有四人，占总数的80%；八届中委、后补中委一百九十四人，除有病、死亡的三十一名外，遭诬陷靠边站的九十六人，占总数的58.9%。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革”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之多。冤狱遍于国中，遭诬受害致死致残的干部不可胜数。在“文革”期间，被戴上“走资派”帽子的几乎到处都是。经过平反以后，究竟还有谁定为“走资派”呢？即使是林彪、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四人帮”，在对他们定性论罪的时候，也未使用这一概念。实践证明，“走资派”并非“科学的抽象”，完全是臆造的假想，应当坚决抛弃它。

《通知》第九条提出“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结语又提出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以后，《十六条》规定要斗争所谓“反动学术权威”。这个概念也是不科学的。“反动”指什么？按照前一种提法，可以理解为学术思想上的反动；按照后一提法，可以理解为政治立场上的反动。如指政治上的反动，那就批判他政治上的问题就是了，与学术思想无关。如指学术思想，而在政治上不是反动的，则根本用不着“反击”、“彻底揭露”。例如，一些相信唯心论的学者，宗教界人士，他们在政治上拥护党，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怎么能够去“反击”呢？学术思想问题只能通过讨论的方法来解决，怎么能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消灭唯心论的学术思想呢？这种模糊不清的概念，在“文革”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把旧社会过来的一些知名的专家、作家、学者、教授打倒了，甚至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有成就的

同志，都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不能幸免。文艺界人士大批被迫害。仅文化部直属单位受害的就有二千二百五十多人。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老舍、周信芳、马丁、潘天寿等九十多人被害死；据十七个省、市不完全统计，教育界的干部、教师受害的142607人，致死的7682人；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七机部两个研究院和十七个省市，共有53155名科技人员遭迫害。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绪沛、昆虫学家刘束承、理论物理学家张家燧等被折磨而死。仅卫生部直属十四所高等医药院校，共有教授、副教授六百七十四人，受害的五百五十六人，其中致死的三十六人。奇怪的是，也有在政治上、学术思想上都反动的所谓“学者”，如冯友兰、赵纪彬之流，却成了“四人帮”的“座上客”、“此门学士”，成了“梁效”写作班子的“师爷”。原因在于他有一套反动的政治手腕，善于看风驶舵，会拍“老娘”的“马屁”，搞什么“百鸟朝凤”当然会得到“女皇”的“青睐”，因而“反动”立即变成“革命”了。由此可见，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是应当抛弃的不科学的概念。

总之，由于革命对象不清，没有搞清楚究竟有没有敌人，究竟是不是敌人，没有搞清楚敌我双方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就宣布敌情异常严重，危在旦夕，就发动一场你死我活的“大革命”。其后果必然造成这场“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对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和其他阶层人民进行诬陷迫害的大冤案。

三、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规定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

①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提出无产阶级的学术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错误方针。

《通知》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等同起来，然后又把政治问题设为禁区，不准讨论，讨论了就是犯罪。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理论问题当然有联系，但也有区别，无论如何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通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为理由，来抹煞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这是完全说不通的。应当怎样理解“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列宁解释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解释：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列宁全集》四卷191至192页）由此可知，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非一开始就是政治斗争，而只有当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自觉地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时候，这种斗争才是政治斗争。同时，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政治斗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斗争，在思想领域表现为思想斗争。虽然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有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但都不等于说经济斗争、思想斗争就是政治斗争，都应该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总之，无论从阶级斗争发展的各个阶段来看，还是从阶级斗争在各个领域里各有不同表现形态来看，都不能把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因此，《通知》借口这个命题而不准提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至于把政治问题列为禁区，不准讨论，更加没有道理。如果政治问题不准讨论，只能奉命行事，试问，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政治民主可言呢？！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

一谈，但两者确实联系很紧密。任何政治问题（包括路线、方针、政策等）都有自己的理论依据的，而任何学术、理论问题都会对实践产生政治影响。这种情况表明，如把政治列为禁区不准讨论，那么，学术、理论问题也就很难深入地展开讨论。因为一深入开展，势必涉及禁区。这样，学术、理论问题还怎么讨论呢？

《通知》认为，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第二条）很明显，《通知》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学术讨论、理论探讨，武断地认为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把学术理论领域的争论简单化归结为两家：不是无产阶级一家，就是资产阶级一家，把“百家争鸣”说成实际上是“两家争鸣”，既取消了肃清封建遗毒的严重任务，也忽视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这样逻辑的必然结论是：我是无产阶级，你反对我的观点，跟我的看法不一致，那你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通知》全文都贯串着这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口吻。这是完全违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

《通知》提出无产阶级学术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这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对待文化历史的理论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成果。如对法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采取批判继承的方针，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列宁、斯大林专门批判过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批判过所谓要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否定文化遗产，鼓吹文化虚无主义，想要凭空创造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口号。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化虚无主义，一九二〇年十月列宁发表了著名的《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反复强调学习人类创造出全部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只有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列宁选集》四卷三四七页）过了几天，列宁在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代表大会起草了决议草案中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选集》四卷三六二页）斯大林说：“有个时候，在我国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十月革命后在我国保留下来的铁路是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利用这样的铁路是不体面的事，需要把它挖掉，建筑新的‘无产阶级’的铁路。由此他们获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穴居野人’”。（《斯大林选集》下册五三一页）毛泽东同志早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加以总结，作为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继承下来。（《毛泽东选集》二卷四九六页）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通知》要消灭资产阶级学术，请问怎样消灭呢？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表演，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凡是不符合他们帮派口味的东西，管它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一律贬斥为“封、资、修”加以封禁、销毁（甚至付之一炬，如砸孔碑、挖孔坟、砸孔庙），对这些作品的作者一律予以打倒（甚至投进监狱，从肉体上消灭），造成了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严重局面。在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

斯涅威统治下，连郭老也违心地宣布要把自己的著作统统烧掉！这个方针，说穿了，就是要消灭同林彪、陈伯达、康生、“四人帮”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方针，是毁灭文化的方针。执行这一方针的结果是：抓辫子、打棍子、扣帽子如恶风卷地，说假话，搞迷信，打砸抢，越演越烈。“黑线专政论”肆虐横行，文化专制主义毒雾滚滚。国力衰惫，民气戕伤，真是一场浩劫和灾难。

②鼓吹“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

《通知》第四条提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所谓上层建筑，就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斯大林文选》五二〇页）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社会经济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简单地说，即政治和文化。《通知》说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也就是要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政。什么是专政呢？专政是指掌握政治的统治阶级凭借暴力手段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的镇压。列宁说：“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三卷八三五页）“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敌我矛盾时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政治措施。谁对谁实行专政，这只能是政治领域里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果把专政手段移用到思想文化领域，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决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能用批判的武器，不能用武器的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在这里，任何粗暴的作法，不但与事实无补，而且只能把事搞糟。因为一定的思想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只能伴随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变革才能实现。因此，企图采取专政的手段来强制解决某种思想文化问题，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某种观点、某部作品，某一出戏，某个电影，一旦被认为有问题，常常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当作阶级敌人，革命对象，而对他们实行所谓专政，后果极其严重。以后“四人帮”提出的所谓“在思想领域专政”，“在意识形态领域专政”，“把文化部办成意识形态里的公安部”，以及所谓“全面专政论”，其源盖出于此。这种提法，就是前面讲过的，把“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观点歪曲引用的必然结果。“四人帮”故意抹煞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同政治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原则区别，在他们看来，似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切斗争都是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是敌我斗争，因而无一例外地要统统实行所谓专政。

（3）否认真理的客观性，鼓吹真理的阶级性。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个命题表明真理是客观的。客观真理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无权探索真理，宣传真理，捍卫真理。而不管谁掌握了真理，人们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即尊重真理、服从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掌握了真理，包括掌握了部分真理的人，从来都是采取尊重、学习的态度的。这就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尽管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学者，

马、恩照样是尊重、肯定他们的，并不因人废言；照样吸收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分，用来建立和证实自己的学说。马、恩对待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李嘉图、欧文、傅立叶的态度，就是明显的例证。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吸取他们学说中的合理部分才创立起来的。

同样，列宁并没有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后期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而否定他前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这也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不要跟一个人，要跟真理，谁发现了真理，就服从谁，管他是挑大粪的，还是干别的什么的。

以上说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通知》却把这一观点诬蔑为“资产阶级口号”，它根据什么呢？

《通知》认为，这个观点否认了真理的阶级性。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是客观的这一论断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这就是说，人们的认识就其形式来说虽然是主观的，但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客观的。真理是客观的，它包含着不依任何个人、集团、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尽管人们的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观察同一对象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但是关于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因此，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承认真理有阶级性，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客观性的观点。试问：如果不同的阶级都有各自真理的话，那就成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什么客观真理可言？《通知》提出真理阶级性的命题，完全是武断的谬论（这方面报刊上发表了不文章，不再赘述）。用这个错误的命题来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恰好证明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通知》往下的批判，根本不顾形式逻辑的原则，把在真理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原则，一下偷换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第四条）试问，这些问题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怎么能是一个问题呢！例如，象清除林彪、“四人帮”这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问题，怎么会是一个问题呢！这种偷换论题的“批判”法，除了证明自己无理而又武断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否认了客观真理，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标准，宣扬和推行了封建法西斯的权力真理论，助长了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人们在真理面前不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在真理面前的依附关系、等级关系，只有某些人或某个人有权力有资格掌握真理，其他的人只有等待这些人的恩赐，才能看见真理的光辉。而掌握真理的人，又一定是伟大的天才。这种人地位越高，真理就越多。地位达到高，他也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了。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句句是真理”。这种真理化身的人的言论，只能成为信仰的对象，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别人无权研究，顶多只能注释。谁如果想搞点平等，探讨、研究这些言论是否正确，横祸就会从天而降。十七世纪荷兰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圣经应和其

他文件一样，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被认为亵渎神圣，大逆不道，被开除教籍。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党的好女儿张志新烈士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异议，不仅被开除了党籍，而且竟遭杀身之祸。类似张志新同志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有识之士还不乏其人。这种理论上的专制主义，在“文革”中还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突出的是《公安六条》中规定的“恶毒攻击”罪。许多冤案都由此而来。粉碎“四人帮”后，这种权力真理观并未绝迹。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实际上还是坚持权力真理论。在他们看来，凡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写的，都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终极真理。同样一个错误观点，只要是毛泽东同志说了，错误就变成正确；同样一个正确观点，被所谓犯错误的人一讲，正确的也变成了错误。这种观点，无疑是十分荒谬的。

（4）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鼓吹以“破”代“立”。

必须全面理解破和立的辩证关系。破，是对旧事物的批判和否定；立，是新事物的产生、成长和发展。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毛泽东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选集》二卷六六六页）破和立这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决不是说，破等于立。我们打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旧的国家机器，夺得了政权，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因此就自行成长起来，必须经过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建设和工作，才能建立起来。把破和立等同起来，以破代替立，象“四人帮”说的，“抓了革命，生产自然而然就上去了”，是错误的、反动的。破并不是目的。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得到一个被打碎的旧社会的废墟，而是为了在这个废墟上建立新社会，创造新生活。破，是为立扫清道路，创造条件。立，才是目的。破的任务是艰巨的，立的任务往往更艰苦更困难，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更长的时间。把破当成目的，说破就是一切，这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态度。

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时期，破无疑是中心的任务，应当破字当头。但是，当革命夺取政权以后，破的任务虽远未完成，立的任务却日益成为矛盾的主导方面。我们提出着重点的转移，就是表明我们已把“立”提到首要地位，也可说是立字当头。这是辩证法，不能说任何时候都应当是“破字当头”。老是破，不稳定，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怎么谈得上“立”？应当说没有破，是不可能立的。但是没有立，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破。如果我们不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把它建设好，资本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破除掉的。因此《二月提纲》说的“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并没有错，而《通知》竟不问青红皂白，批判这句话是：“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无限上纲，一连扣了许多大帽子，不讲道理，它自身才是割裂破和立的辩证关系，为林彪、“四人帮”大搞破的绝对化，推行“破就是一切，破就是立”的“捣乱哲学”大开方便之门。

四、在组织上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设立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发号施令，主宰一切。

为了贯彻执行《通知》提出的这样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通

知》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实际上是一次夺权。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原有的文件起草小组的基础上，于1966年5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名单主要是江青提出的。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1966年8月2日中央决定陶铸同志担任中央文革顾问，名列康生之前），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等七人，以后还补充了四个大区的同志，即郭影秋同志（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代表华北局）郑厚翘同志（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东北局），杨植霖同志（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西北局）刘文珍同志（西南局宣传部长，代表西南局）。总共十八人。其中郭影秋、郑厚翘、杨植霖、刘文珍四同志，只是在文革的初期出席过几次讨论起草《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文件的会议，工作岗位仍在原单位，并未到中央文革担任实际工作。因此，中央文革成员名义上是十八人，实际工作的只有十四人。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事和职权有过很大变化。起初，即从1966年5月至12月，中央日常工作由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决定（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由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主持；十一中全会后，由周恩来、陶铸同志负责），文革成员列席参加，起参谋助手作用（江青曾说“文革小组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由于陶铸、王任重同志等在文革小组中抵制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胡作非为，成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障碍，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1967年1月初将陶铸、王任重同志打倒（还有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等同志也先后被打倒）。这样，中央书记处完全停止活动。接着林彪、江青等人又借“反击二月逆流”为名，把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同志（其中副总理五人，军委副主席四人，七人都是政治局委员，四人是书记处书记，李富春是常委，国务院业务组长，都是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老同志）打下去，靠边站，迫使中央政治局完全停止活动。从此，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夺取了处理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大权。他们在一人之下，全党之上，发号施令，主宰一切。中央文革公然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布指示，开创了踢开政治局闹革命的最恶劣的先例。而文革小组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组成，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等列席，和林彪同伙，都是一些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也有这些人参加。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小组碰头会都有周恩来同志参加。他在这两个会内部，坚持原则，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保护一些老干部、名流、专家、学者，才为我们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尽管周恩来同志挺身而出，力挽危局，但毕竟处境困难，孤掌难鸣，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根本扭转形势，纠正方向、路线的错误。用文革小组代替书记处，代替政治局，彻底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践踏了党章。在我党历史上，王明篡夺党的领导，还是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实现的。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不能得逞。而这个文革小组完全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撇在一边，假借“最新最高指示”，直接号令“造反派”揪斗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甚至任意宣布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为“大

叛徒”、“最大走资派”，等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它早已夺取了中央的领导大权。直到九大开会，在主席台上，文革小组成员及其列席者坐在前排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前排右边。主席团名单的排列，把文革成员和列席者列在前面，政治局委员排在后面。人们一望而知，这次代表大会是由文革小组而不是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集的，党章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实践证明，中央文革被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掌握了领导权。他们通过种种阴谋，居于一人之下，全党之上，利用篡夺得来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依靠所谓“造反派”实行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局长，制造大量冤假错案，把许多老干部打倒，把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局长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反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它从反面教育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十分重视领导班子的配备和建设，决不能让坏人来篡夺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们从形势、政治、理论、组织四个方面对《通知》进行了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错误估量，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漆黑一团，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由于对形势分析的错误，因而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把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革命对象，即把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在理论上背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全盘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否定对历史遗产要批判继承的原则，提出所谓消灭资产阶级学术的方针，否定真理的客观性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在组织上，建立由江青五人一手控制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文革小组，君临全党全国，主宰一切。由于它已“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五〇页），是“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集中表现。因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就标志着“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什么经验教训呢？

对于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经常注意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同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革命思想作斗争，不断地自觉地揭露和克服自己组织中确实存在的阴暗面，坚决防止和避免走上脱离人民、压迫人民、蜕化变质的道路，这的确是一个长期的严肃的任务，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课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符合实际的估量，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大量的和必然长期存在的），而决不可以主观臆断，以致颠倒敌我，混淆是非，必须依靠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而决不可以抛开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必须凭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而决不可以破坏民主和法制。总之，决不可采用《通知》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方法。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惨重牺牲得来的历史经验，我们一定要永志不忘。

三、《五·一六通知》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具体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则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表现，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既然经过实践检验，造成十年动乱、一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了；那末，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表现的“继续革命理论”，也应该予以全盘否定，彻底清算。这里，不对“继续革命理论”展开全面批判，只就《五·一六通知》与“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在联系谈一点看法。

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左”倾思潮更加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矛盾日益尖锐复杂。而这一切，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又恰好证明他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的正确，因而就更加急切地想要发动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斗争来揭露和解决这些矛盾。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中回顾“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过程时说：“过去我们搞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九大报告）毛泽东同志究竟把什么看作我们的“黑暗面”，又为什么非要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不可呢？这个答案就在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通知》中。

《通知》的基本精神是什么？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作了以下回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集中到一点，还是政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害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混进党和政权领导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段文字概述了毛泽东同志亲笔加到《通知》中的三段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第一段）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

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结语两段）

这点十分清楚，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的黑暗面”，就是指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要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就是党内“走资派”。既然人数这样多，分布面这样宽广，危险性又这样严重，那末，任何局部的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非要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不可。总之，“文化大革命”是非搞不可了。《五·一六通知》正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制定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通知》的基本精神、中心思想是：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向党内“走资派夺权”。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主稿写成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把“继续革命理论”归结为六条要点。除了其中第一点是属于“务虚”，即应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问题这一点外，从第二点到第六点说的都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那里首次从几个长期“存在”讲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革命的必要性，进而把问题引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依然是政治问题”，引到上层建筑领域“全面专政”。那末，向谁“夺权”呢！第四条的回答是：向党内走资派夺权。接着第五条规定的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夺权。最后，第六条讲的是“斗私、批修”的根本纲领，归结到挖“修正主义根子”，即落脚到改革一切“不适合”的“上层建筑”。很明显，这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确立情况下，通过“全面的阶级斗争”，搞政治大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动力是所谓“造反派”，任务是“全面专政”，即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全面专政”。总之，“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夺权”。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著名论断，即“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31页）然后加以发挥，说今天“只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继续进行革命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正是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把“继续革命理论”抬到吓人的高度。还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里程碑。这样，就把当时反对和怀疑这个理论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统统贬斥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同时，还把我党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提法改变了，而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标志，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这一“新发展”，并以此为标准衡量一切。

以上说明，从“继续革命理论”的形成过程来看，《通知》和它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产物；从基本内容来看，两者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说，《通知》奠定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继续革命理论”是《通知》中阐述的向党内走资派夺权，实行全面专政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通知》的发表，是一代人灾难的开始。如果说，在这以前，“左”倾思潮还未系统化的话，那末，《通知》的制定和通过，就标志着在我们党内不但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而且标志着这条路线

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给我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条路线指引下进行的。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通知》指引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呢？

“文化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所依据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一个进步阶级推翻一个反动阶级的统治，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取代一种反动或落后的生产关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建立以后，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需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断变革和完善，我们还要正确处理社会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这些都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任务，但是，这种革命的性质和内容已经完全不同阶级对抗社会中的革命。无视社会历史条件的这种根本变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继续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就必然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如果说所谓在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始终存在并作为主要矛盾存在的阶级斗争，是“文化大革命”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础，那不过是一种想象。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没有发现这样一个基础。接受那种脱离现实的假定，必然导致可以用思想划分阶级，可以在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等，毫无社会科学常识的奇谈怪论。而且，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消灭阶级，而是在消灭剥削制度以后还要不断地产生资产阶级，如果共产党内还要不断地产生资产阶级即“走资派”，如果每隔若干年就要进行一次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去推翻新的资产阶级和“党内走资派”的政权，如果这一切都是命定的和长期循环反复的，那就势必是人们认为，用社会主义制度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竟会更为残酷和使人痛苦。这一切当然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的完全失败是必然的，它对党、对人民和国家只能造成令人痛心大破坏是必然的。

恩格斯说得好：“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恩全集》第四卷458页）列宁说：“革命是要靠试验和实践才能领会的。”（《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476页）十年浩劫，教训深刻。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亲身经历者和受害者，回顾以往，记忆犹新，痛定思痛，感触很多。我们一定要认真研究《通知》，仔细剖析，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

谭宗级

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和覆灭的过程，我们党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所作的斗争，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三批材料，已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关于林彪历史上的错误和问题，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已有系统的揭发；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祸国殃民的重大罪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列举了四大罪状，同志们都看到了；关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以及我们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经验教训，叶剑英同志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作了全面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可以说有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各种问题，同志们都很熟悉，我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思虑再三，只好就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崛起及其覆灭这个问题介绍一点情况和材料，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下面讲五个问题：

- 一、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原由；
-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关系；
- 三、林彪反革命集团形成的几个主要问题；
- 四、林彪反革命集团走向破产和覆灭；
- 五、严格区分敌我界限和路线是非。

（一）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原由

过去，林彪死党吹嘘林彪“一贯紧跟”、“一贯正确”、“一贯高举”，那是欺骗，不符合事实。“九·一三”事件后，在“四害”横行时编写的党史讲义、两条路线斗争史，又说林彪从投身革命之日起就很坏，一贯反对毛主席，一坏到底，一点事没做，这也不符合事实。如果真的是那样，他怎么能够当上“接班人”呢？难怪有的学生学了这种两条路线斗争史后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林彪一坏到底，为什么我们党没有能够及早发现，却让他步步高升，爬上“副统帅”的高位呢？实在令人费解。列宁说：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二卷512页）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历史的考察，这个问题就不难获得正确的答案。

林彪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的真实面目的暴露有一个过程，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林彪生于一九〇七年，湖北黄冈人，又名育容。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五月，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上井冈山，从此就在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中工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对革命虽作过一些有益工作，但也犯过不少错误。他历任红一军团长、一一五师师长、四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五年四月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着地位的提高，他追求个人权势的私欲日益滋长。

林彪的个人野心由来已久，“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心怀贰志。早在一九五三年，他参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暴露了他是有个人野心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后，他接替彭德怀同志，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野心逐步增长。在他看来，身居要职，手握军权，有了实现个人野心的方便条件，他煞费苦心研究策略，寻求怎样攫取更大的权力，进一步爬上去的门径。这时，林彪翻阅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历史书籍，包括英雄豪杰，历代开国皇帝的传记，研究“政变经”、“登龙术”，让人给他摘录了不少卡片，自己也写了一些黑笔记。叶群专门记载了抓“一号（指毛泽东同志）活思想”的方法，以便“应对”。叶群一再嘱咐林彪的秘书要经常提醒林彪，说话不离主席，举手不离语录，把他的真面目伪装起来。林彪真是挖空心思地钻研施展权术的诀窍，寻求篡党夺权的捷径。

为什么林彪能够被立为“接班人”，爬上“副统帅”的高位呢？从我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出发，结合林彪发迹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一、林彪鼓吹现代迷信，大搞造神运动，标榜“高举”，骗取信任。

林彪深知，在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传统。在这种条件下，要想爬上去，篡夺最高权力，必须把自己装扮成对毛泽东同志最崇敬最虔诚的忠实信徒，“高举”旗帜，“紧跟”不二，亦步亦趋，才能骗取信任，步步高升。因此，一九五九年九月，他刚就任国防部长，便在全军高级干部会上提出所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鼓吹“三忠于”、“四无限”，开展“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群众运动；狂热地颂扬领袖的“天才”，“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大搞造神运动。林彪的这套货色，大家非常熟悉。打开《林彪语录》，许多“警句”触目皆是，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林彪搞的这种“造神运动”，骗取了人们的信赖，误认为他是“高举”、“紧跟”的“最好学生”，“光辉典范”。他当“接班人”，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当之无愧的。

二、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信任和赞赏。

林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上井冈山起，一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工作，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器重。

林彪上井冈山后，多次说过：“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

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还多次提出要离开毛泽东同志去分散打游击，并且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因此，针对林彪的右倾悲观思想，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写了一封长信给他，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右倾悲观和不要革命根据地的流动游击的错误思想，目的还是在耐心教育他。一九四八年中央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打算把这封信收入，林彪闻讯写信给中央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使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经毛泽东同志同意，此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点名批评林彪的那部分删去了。这说明毛泽东同志那时对林彪的批评是从爱护出发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林彪在山西隰县附近，穿上日本“皇军”的大衣，骑上高头大马抖威风，被阎锡山顽军误认为日军打中负伤。毛泽东同志特地去电促其来延安疗养一段时期，并告诉他：“这是中央的决定，必须坚决执行。”四月十日下午，林彪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骑马奔驰三十多里路，赶到拐峁八路军总医院看望。以后，还送林彪到苏联去治伤。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主席时，毛泽东同志就有选林彪当“接班人”的意图。当时毛泽东同志未得全票，少了一票，谁不选毛泽东同志当主席呢？结果是毛泽东同志未选他自己，他投票选林彪当主席。这一票说明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林彪是十分赞赏和信任的。以后中央分一线、二线，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打算的：让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处在一线，处理日常工作，他退居二线，让林彪好好休息，养好身体，一旦帝、修、反打起来，就让林彪出来，协助他指挥战争。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搞的一套“突出政治”着重从政治上建军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是十分赏识的，曾多次表扬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贺龙、聂荣臻同志，称赞“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很大的一个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要求工厂企业单位都要学解放军，建立政治部，实行四个第一、三八作风。认为“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以后又号召全国学解放军。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人员、《解放军报》编辑和记者、战士演出队时又赞扬林彪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本来是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总结经验教训的。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公开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传达到全党，与会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但林彪却与众不同，在会上大讲“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的体会，他的突出优点是实际，总是与实际八九不离十，……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当前出现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这篇讲话很满意，甚至还对林彪说了很感激一类

的话。

对林彪的生活、健康问题，毛泽东同志也给予极大的关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写信给林彪说：“你的来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文件）的看法是正确的。”信里还特别提醒林彪要注意“养生之道”：“曹操有一首题为《龟虽寿》的诗，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望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毛泽东同志还特地亲笔把曹操的四言诗《龟虽寿》抄录下来，附在信中，送给林彪，鼓励林彪养病的信心。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无微不至。

一九六五年取消军衔制，恢复红军时代的领章、帽徽，都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赏。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林彪向毛泽东同志报送总后勤部的报告，毛泽东同志看了立即回信，提出要解放军和各行各业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大学校，即“五·七”指示。这实际上是反映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左”倾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林彪和江青合伙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同志为之亲自审阅、修改、定稿。林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都是经过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过的，认为“很好”而后决定下发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以后，林彪又回到大连养病。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从武汉回京，决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要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八月四日夜十二点，毛泽东同志叫杨成武同志通知空军准备飞机，又叫秘书徐业夫告诉林彪立即回来。林彪在吴法宪的陪同下，连夜乘飞机回京。八月五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就成了“副统帅”。

这里顺便说一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江青信是否真的？怎样理解这封信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湘潭县韶山滴水洞看到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非原则地颂扬他的讲话很不满意，便写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封给江青的信。林彪知道后很紧张，叫叶群在各种场合一再表白，说什么林彪是“好心”呀，主席这一批语，别人要“利用”呀，“主席喜欢的人才这样批评”呀，等等。毛泽东同志为了安定林彪，说：“只要今后改正这种作法，可以把他的信烧掉，信的内容不再下达”。烧信时专门找叶群到场。当时戚本禹认为，毛主席写的东西都是宝贝，烧了真可惜。他向周总理表露了这种心情。总理说，不要紧，我那里有一个抄件，我叫陶铸抄了一份。以后，批林整风中印发出来的这封信，就是照抄件翻印的。总之，原信已烧，抄件还在，这封信是确有其事的。

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已看穿了林彪的本质，当时是为了先搞刘少奇就不动林彪。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还是领袖“高瞻远瞩，洞察一切”的“天才论”观点，领袖是人不是神，他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同样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只是看到了林彪在思想理论上的错误观点，对林彪的本质并未看穿。因此，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让林彪当了“接班人”。说那时就看穿了，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九大，选举大会主席团时，毛泽东同志曾在大会上提出要选林彪当主席，他当副主席，被林彪装模作样地连续不断地“毛主席万岁”的高呼声打断了。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怎样写进九大党章的？

规定林彪为“接班人”，最早见之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末中央《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通报》。这个文件是康生、姚文元起草的。其中写道：“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彪，进一步提高林彪的威望，……”后来经过修改，便成为九大党章中的一段。林彪在这段文字上言不由衷地批道：“全文删去或改写”。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当时的中央碰头会也不同意。这种违反马列主义和党的原则的“预立储君”的做法公然出现，说明我们党当时对林彪的本质缺乏认识，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封建专制遗毒影响之深，应当作为教训，引以为戒。

三、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定林彪为“接班人”的特殊情况。

林彪被选定为“接班人”，固然和毛泽东同志有重大关系，但并非他个人任命，而是通过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的，当时还是得到相当多数同志拥护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这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分析。

从当时常委的情况来看。八届一中全会选出常委六人，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届五中全会又增选林彪为常委、副主席，这样常委就是七人了。在七人常委中，除毛泽东同志而外，刘少奇同志（1898—1969年），邓小平同志（1905年生）当时被指控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是被炮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对象，当然不可能再当“接班人”了；陈云同志（1905年生）一直被指责为“右倾”，朱德同志年纪大了，他生于1886年，比毛泽东同志年长七岁；周恩来同志常说：我这个人是不能挂帅的。毛泽东同志对周恩来同志也“不太满意”，而林彪是当时七人常委中年纪最轻的（他生于1907年，当时只有59岁）。周恩来同志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常委中只好是他当接班人，这是很自然的”。

从林彪本人来说，他有一定的“政治资本”。“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既无战功，又无政绩；而林彪却不同，他是赫赫有名的十个元帅之一，名列朱德、彭德怀同志之后，位居第三，从黄埔参军起，经过北伐、南昌起义、上井冈山、反“围剿”、长征、抗日、解放战争，打过仗，有战功。

林彪不但在军事上搞了一套新花样，什么“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很迷人；而且在政治上又打着“高举”的旗帜，掀起所谓群众性的“活学活用”运动，赢得了不少声誉。这样，就被人认为是“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文武全才”，“是最理想的接班人”。

据说，贺龙同志听到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后说：“原以为林彪这几年光养病了，那知他读了这么多书，有学问，我就吃了不看书的亏”。象贺龙同志这样久经锻炼的老同志，竟然被林彪的假象所蒙骗，一般人就更要受骗上当了。

还有林彪的亲信为他评功摆好，大造舆论，也起了欺世盗名的作用。一九六〇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报刊上接连刊载周赤萍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

彪》，李作鹏写的《东北战场上的辽沈大决战》，《三下江南》，梁兴初写的《南渡松花江》、《黑山阻击战》等文章，大肆吹捧林彪，称林彪为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领导者”，“具有非凡的战略远见和伟大气魄”，为林彪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此外，甚至日本也出版了寺尾五郎写的《林彪的作战》，高度赞扬“林彪是毛泽东思想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反映了世界舆论对林彪的好评。

由于林彪装出“最最革命”的姿态，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煽动宗教式的狂热，把自己说成什么“举得最高”、“跟得最紧”、“永远忠于领袖”。他玩的这种手法，确实在一个时期内迷惑过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甚至我们党内一部分高、中级干部也未察觉。邓力群同志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党校作报告时曾谈过他对林彪的认识过程。他说：“就我个人来说，对于林彪，一直到庐山会议，都没有发生什么怀疑。虽然我觉得他的一些提法不妥当，但是他拥护毛主席，我是相信的，认为把他选为接班人是很好的。我也跟别人讲过，说历史经验证明，一个伟大的人物需要由另外一个伟大人物来维护他。马克思需要恩格斯来维护，列宁需要斯大林来维护，毛主席需要林彪来维护。我就是这样看的。东北解放以后，我脑子里想，也跟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原来主席是想让刘少奇当接班人。在东北全部解放以后，我认为刘少奇当接班人不如林彪好。因为刘少奇政治上强，但是他不会打仗，而中国这个国家只是政治上强，不会打仗，这个接班人是很大的缺陷。林彪政治上强，又会打仗，我看这个人将来当接班人最合适了”。邓力群同志原来对林彪的看法，代表和反映了不少高、中级干部当时对林彪的认识。

再从当时党内的状况来看，从一九五七年以来，个人崇拜、“一言堂”盛行，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党的领导逐渐变成封建家长制的个人专断。许多重大问题常常是毛泽东同志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已经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情况十分明显，即使有的同志对林彪不满意，在那种气氛下也不便公开表示反对的意见，为了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顾全大局，也只好投赞成票。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不正常情况下的选举，免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同志的副主席职务，而使林彪成了党中央的唯一副主席。

（二）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关系

林彪、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以林彪为头子和以江青为头子的两个帮派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逐步发展形成的一团两伙。林彪、江青一伙，既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共同的阴谋活动，又有各自的反革命野心和各自的阴谋活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狼狈为奸，结成反革命阴谋集团。同时，又各自组成帮派体系，明争暗斗，互相争权夺利。

一九六二年至六八年间，林彪、江青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进行篡党夺

权的罪恶活动。林彪要利用江青的特殊地位，江青则要借助林彪作“护法尊神”，这样，他们就互相勾结起来。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他们相互勾结的第一步。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为了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势，实现她的政治野心，由上海赶到苏州，以“文艺革命”为题目，同林彪密谋勾结。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给总政治部下达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强，在文艺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江青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在会上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这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一定要搞掉这条黑线”。这条黑线“在三十年代的后台是王明，现在的后台是刘少奇”。随后，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阴谋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这是林彪、江青进行篡党夺权所采取的一个严重步骤。

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任命原来并无军籍的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林彪又任命江青为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使江青得到指挥部队文艺工作的权力。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在接见军队干部时的讲话中，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林彪、叶群还指使江腾蛟等人，到上海、苏州一带去抄三十年代文化人的家，把抄来的有关江青三十年代丑闻的资料统统焚毁，为江青销毁历史罪证，深得江青的好感。江青对叶群说，你有什么仇人告诉我，我替你报仇。

江青为林彪爬上“副统帅”的地位十分卖力。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她吹捧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风度。他一再声明身体不好，没做多少事，其实并非如此”，“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写上他”，“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一九六九年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谈到是否应该写上接班人时，江青宣称“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同一期间，张春桥在上海宣扬：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在党章上了，这就放心了”。江青还为林彪拍摄照片。一九七一年刊在《解放军画报》上的一张林彪故作姿态学习《毛选》的大幅光头照片，就是江青拍摄的（署名峻岭）。

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一年，随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在九大以后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篡夺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在他们这一帮野心家内部，以林彪为头子的一伙同以江青为头子的一伙，逐渐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个斗争首先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九大上表现出来。林彪集团操纵选票，布置他们的党羽少投江青的票，结果江青少得六票，十分不满，为此还要进行追查，被毛泽东同志制止了。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争夺权力斗争激化的表现。林彪集团耽心林彪的“副统帅”地位不稳，怕被“四人帮”夺走，急于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便在庐山会议上指名道姓地骂康生、张春桥是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揪出来，千刀万剐，目的是想压一下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伙人，表明他们才是最坚决捍卫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的，是有力

重的，以便进一步篡权。当时只揪出了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作了检讨。叶群为了搞好一团两伙的关系，还亲自带着几员大将去向江青道歉，承认错误。毛泽东同志当时还保护了一下林彪：一是把“称天才”的语录中摘引林彪的话删去了；二是在《我的一点意见》的末尾，加上了“我和林彪一致认为”这句话，以示林彪和陈伯达有所不同。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集团被粉碎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利用职权，掩盖他们与林彪勾结的真象，伪装成反林彪的“英雄”，蒙混过关。一九七二年九月，王洪文由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后，成为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成员。从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正式组成“四人帮”，更加疯狂地进行阴谋活动。（这方面的情况另有专题，不赘）

（三）林彪反革命集团形成的几个主要问题

林彪集团从反党到反革命有一个发展过程。前面讲过，林彪的野心由来已久。林彪集团形成的过程大致是：在宗派主义的基础上，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网罗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罪恶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后，又随着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不断暴露而逐步走向破产，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自我爆炸，归于覆灭。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利用左倾路线，并把它推向极端，大搞篡党夺权的反党阴谋活动；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阴谋败露，便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密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变成赤裸裸的反革命集团。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策略主要有三条：一是鼓吹现代迷信，大搞造神运动，骗取信任。正如林彪不打自招供认的，“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不称天才成不了伟人”。他是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能手，是举世罕见的现代“造神家”。这方面的情况，前面已讲过，不赘。二是诬陷忠良，排斥异己，扫除障碍；三是网罗党羽，培植亲信。林彪是怎样施展后两条反革命策略的呢？下面结合林彪集团形成、发展的过程来揭露。

一、策划打倒彭、罗、陆、杨，开始篡党夺权第一步

在林彪看来，谁妨碍他篡党夺权他就整谁。经过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被整下去了，朱德同志也被他批了一通；总政主任罗荣桓同志不同意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的一些提法和做法，也挨过林彪的批，而且已在一九六三年去世。这几个老上级、老同志都已扫除。林彪认为，第一个直接妨碍他篡权的就：掌握军队日常工作领导权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副总理、书记处书记罗瑞卿同志。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不久，林彪瞅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底对罗瑞卿同志先下毒手了。

罗瑞卿同志当总长，本来是林彪提名的，为什么一九六五年底他又拿罗瑞卿同志“开刀”呢？据林彪自己说：头一、二年，罗与他合作得比较好。后来么，罗就不听他的

了，有事也不向他请示汇报，甚至逼林彪“让贤”、“让位”，他才发现罗有野心，因此下决心向毛主席报告，拿掉罗。

这统统是骗人的谎话。林彪整罗瑞卿同志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罗对林彪搞的什么“顶峰”、“最高最活”，以突出政治为借口制造军政对立，破坏战备的一套东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成了他篡党窃国的首当其冲的直接障碍，因而采取种种卑劣手段，捏造罪名，肆意进行诬陷和迫害。

当姚文元的文章出笼不过三周，林彪得知杨尚昆同志已调离中央办公厅时，立即发难整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指派叶群带上事先指使人写好的诬陷、揭发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状。叶群一连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七个小时。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同志写了批评罗瑞卿同志的反对折中主义的批语。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召开上海会议。叶群在会上发言三次，讲了十一个小时，并印发叶群带来的诬陷材料，作为会议主要文件。极端保密的会议开了三天以后，才突然打电话，派飞机把正在西南视察工作的罗瑞卿接到上海，立即隔离起来，进行了背靠背地揭发批判。揭发材料是林彪指使李作鹏等人捏造罪名，任意诬陷写成的。然后由林彪上报毛泽东同志，未经核实会议就印发了。

林彪一伙诬陷罗瑞卿同志的主要罪名是逼林彪“让贤”。即叶群所说的，罗瑞卿在一九六五年二月要刘亚楼转达的四条意见：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照顾好林彪；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放手让罗管。“办好了总长不会亏待你的”。这四条纯属捏造，无论怎样逼供，找出多少人的证明，罗瑞卿同志从来也没有承认过。叶群在上海会议发言后，见罗不承认，心里着慌（当时邓小平同志说：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就赶紧找人证明。十二月十五日，让其女林立衡写了假证明；二十五日，又找吴法宪写了假证明；还找刘亚楼妻子写了假证明。这几个人现在都承认，那是叶群一手导演叫写的，他们根本没有听说过。这完全是制造伪证，蓄意进行政治陷害。

林彪、叶群等还无中生有地说，罗瑞卿在背后讲毛主席的怪话，对毛主席不满，不尊重老师和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挑拨离间，罗瑞卿同志在被关押审查期间，林彪一伙竟然灭绝人性地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以治疗腿伤为要挟，逼迫罗瑞卿同志承认强加的罪名，而罗瑞卿同志坚贞不渝，视死如归，坚持斗争。最后，他们竟下毒手，将罗瑞卿同志的胫骨锯断，造成终身残废，以致早死。

林彪整罗瑞卿同志，开创了党内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整人的恶劣先例。从此，林彪以此为口实，上下左右搞株连；罗瑞卿同志的上级，为罗受诬害说过几句公道话的，就被指责为包庇罗，是罗的后台，如整邓小平、贺龙同志就是这样妄加罪名的；同级的，被斥为连在一块的“难兄难弟”，如整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同志，就施用这种伎俩；如是罗的下级，就斥之为罗的“爪牙”，公安系统、总参谋部不少干部受株连，就是这样造成的。林彪整罗瑞卿同志是“整人立威，杀一儆百”。同时，林彪通过整罗，又进行拉帮结伙，网罗党羽。例如，李作鹏、吴法宪能按照林彪的旨意写假材料，上海会议用上了，被认为是忠于林彪的一伙。以后当他们受冲击时，林彪、叶群出面死保，这些人就死心塌地的追随林彪，成了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

诬陷陆定一同志是林彪一手策划的，其主要借口是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的问题。

林彪授意别人捕风捉影地整了一份所谓《陆定一是严慰冰反革命幕后主使人的八大证据》，硬说严慰冰的言论行动（包括写信）都是陆定一同志指使的，他们开的是夫妻店，通过写匿名信方式来迫害林彪一家，挑拨林彪和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严慰冰同志从一九六〇年六月至一九六六年二月间，写了二十多封信给林彪、叶群。寄信人用过北京按院胡同王光的名义（即王光美同志母亲所办托儿所所在地），还用过了张少华的名字。林彪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说写按院王寄，是挑拨林彪和刘少奇的关系；写张少华（毛主席的儿媳妇叫邵华）是挑拨林彪与毛主席的关系。更可笑的是抓住严慰冰被捕前（一九六六年四月被捕入监）不久，陆定一从上海给严写信谈买手表的事，说有三防的男表、女表，全钢、半钢。林彪穿凿附会地说，全钢、半钢无锡话是“全讲、半讲”，说这封信是订立攻守同盟，这纯粹是捕风捉影，任意编造，陷人于其罪。

今年上海出版的《青年一代》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严慰冰同志的访问记，其中谈到严慰冰同志系老革命家严仆同志之女，她于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抗大学习，知道林彪的老底，曾“亲眼目睹林彪、叶群的许多劣迹，深知林彪品质不好”。对林彪不满，便写信骂林彪，“骂林彪是言之有据的，方法当然不足为取”。她还说，“她反对林彪，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不值得宣传”。

批彭真同志，改组北京市委，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意图，中央的决定。同时，林彪诬陷彭真同志，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林彪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批判彭罗陆杨提出所谓政变问题的蛊惑人心的讲话，大念“政变经”，有预谋地在党内制造了极度紧张的气氛。他诬陷彭罗陆杨是“四大家族”，联合起来搞政变，还诬陷彭真同志在晋察冀时执行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彭真同志在会上申辩说：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林彪马上插话，恶狠狠地说：其实，做梦也没有忘掉。林彪把搞颠覆、搞政变的大帽子扣到彭罗陆杨头上，就是把他们置之死地不许辩解。彭真同志在会上多次要求中央进行审查。

在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杨尚昆问题揭得最早，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左右，就被调往广州，改组了中央办公厅领导班子。给杨尚昆同志定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密”；“同罗瑞卿关系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等。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诬陷杨尚昆同志是“反党集团的情报部长”。

这里附带说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态度如何？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江青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他们一些提法，我总感到不安”，“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意志为转移吧”。康生于九月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林彪“五·一八”讲话的通知和批语，九月十六日报送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于九月二十二日批了“照发”，对中央的批语“……他对毛泽东思想做了全面地、正确地、科学地评价”一句作了修改，将三个“地”字都改为“的”，并批：“评价是名词，不是动词，因此，它的前面只能用形容

词，不能用副词”。

总之，林彪策划打倒彭罗陆杨，为他篡党夺权扫除了一大障碍，夺得了一些权力，也搜罗了一些党羽。

二、残酷迫害贺龙同志致死

林彪整垮了他篡党夺权的第一个障碍罗瑞卿同志后，又玩弄阴谋手段，栽赃陷害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便授意吴法宪、李作鹏写了诬陷贺龙同志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九月，叶群捏造材料，口授给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原处长宋治国，指使宋写诬陷贺龙的材料。材料送交叶群时，还让秘书看着，当面问宋治国，是你写的吗？马上让秘书写出证明材料。林彪连同吴法宪、李作鹏写的材料，一并转报毛泽东同志。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林彪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这就是“八·二五事件”。

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同志“搞颠覆活动”，“到处发现他伸手夺权”，咒骂贺龙同志是“土匪”、“大阴谋家”。

一九六七年春，叶群诬告贺龙同志历史上有问题，提出要立案审查。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建立专案审查，康生任组长。直至一九六九年九月被迫害致死。（详情见薛明同志的文章《向党和人民的报告》，此处从略）。

所谓贺龙同志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一九三四年八月，贺龙在湘鄂西根据地时处决了蒋介石派来充当“说客”的熊贡卿一事。此事湘鄂西分局早已报告中央，专案组也从中央档案馆复制了十多份。这件证明贺龙同志坚贞不屈的原始材料，专案组藏匿不报，以致铸成冤案，将贺龙同志残害致死。

贺龙被整死，原红二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二十多人受株连，许光达同志竟被迫害而死。林彪集团乘机又夺得不少的权力。

三、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彭罗陆杨时，刘少奇同志曾被迫作过检讨，林彪一眼看出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同志不满。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就更明显了。因此，林彪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和一九六九年三·二〇讲话中，多次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这些不赘述，下面讲一点新的材料。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十二日，叶群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谈话，向雷英夫提供十二条诬陷刘少奇同志的材料。然后，雷英夫按照叶群的授意写成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写的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对雷英夫说：用你写信的形式，把材料送给我，由我转批，“这样就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将雷英夫写的材料批给江青，由江青直报毛泽东同志。这封信的内容直接涉及王光美。很明显，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各种非法手段刑讯

逼供，制造伪证，栽脏陷害，炮制出来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行审查报告，在上面批道：“刘贼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江青同志致敬！”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诬害刘少奇同志的又一罪证。

林彪除在许多场合公开点名诬陷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外，单独打击邓小平同志有这样几次：

(1)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刘少奇同志的“错误”。林彪把矛头主要对准邓小平同志，他赤膊上阵，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处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注释问题上是为二野和自己评功摆好。事实上，邓小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秉公处理和克己的。林彪特别攻击邓小平同志和吴晗同志打扑克，说是打政治扑克，属于敌我矛盾。这样，迫使小平同志当场向康生交待工作，即当场交权。

(2)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林彪在一份反映邓小平问题的材料上（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搞社会强制，现在苛捐杂税太多，”）亲笔写上批语，报给毛泽东同志。大意是说，邓对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的态度是指桑骂槐，骂解放军。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3)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林彪在一次会议上破口大骂邓小平同志是“黑帮分子”、“坏分子”、“反党分子”。

四、反击“二月逆流”整老师。

所谓反击“二月逆流”，这是林彪、江青、康生合伙炮制的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其目的是想通过打倒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同志，进而打倒周恩来、朱德同志，为夺取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力奉江青之命向林彪汇报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情况，讲到徐向前同志责问江青一伙“你们还要不要解放军”时，林彪说，他不能代表解放军。

二月十七日谭震林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斥责江青一伙“真比武则天还凶”，手段的毒辣是党内没见过的，把老干部“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谭震林同志坚毅地表示，“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拚下去”。这些话真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刺林彪、江青一伙的心脏，代表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浩然正气，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正义呼声。

林彪二月十九日在信上批道：“想不到谭震林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颠倒是非，为整老同志定了调。林彪把信报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只批已阅，未表态。林彪把批件撕碎扔到痰盂里，后由秘书拾出来洗净拼复原状。

毛泽东同志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王力等人的错误汇报，严厉地批评了老师们。决定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开批评会，开展对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同志的批判围攻。叶群也参加了，是重要打手之一。

反击“二月逆流”的后果是：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七个政治局委员被打下去，从此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常委也不能正

常行使职权，处于半瘫痪状态。党政军大权基本上被林彪、江青一伙所把持。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伙一继续对老帅们展开全面围攻。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议程并无批“二月逆流”的内容，怎么又搞起来了呢？

毛泽东同志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出，“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是否必要？成绩是不是主要的？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以此为借口，搞了一个中心发言记录发到全会，就批起“二月逆流”了。定的调子是“二月逆流”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有计划地把老同志分别编入六个大组（按大区分），分割包围，以便围攻批判。除在怀仁堂受批判的六位老同志（谭震林同志被诬为“叛徒”。未到会）继续遭围攻外，连谷牧、余秋里同志也挨批（被诬为“两个帮凶”），有些人在发言中还指名攻击了朱德、陈云、邓子恢三位老同志（被诬为三个“老右倾”）。其他一些中央委员如蔡畅、胡耀邦、陈少敏、李志民等同志也遭批判。

林彪原想把简报上攻击老同志的话都引到总结中去，再加以上纲上线，但被毛泽东同志制止了。所谓“二月逆流”是六七年二月发生的，早就批过了，这些老同志已靠边站，不管事了，为什么时隔一年半，又拿出来批呢？林彪，“四人帮”这样干，其目的就为召开九大把老同志打下去做准备。千方百计地破坏老同志的威信，让他们说话没有人听，做事没有人帮，在九大召开时被排挤出政治局，然后再把他那一伙塞进来。这次围攻老同志，确实做了这方面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五、与江青合谋制造“杨余傅事件”，篡夺军委领导大权

1968年3月24日，林彪和江青相勾结，用阴谋手段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大冤案——“杨余傅事件”。林彪当场宣布逮捕所谓叛徒余立金，撤销杨成武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司令员。

关于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完全是诬陷的，1967年有人揭发说，皖南事变突围时，有人看到国民党兵押着几个新四军，其中有一人象是余立金。吴法宪早就知道此事，到68年春，他和余立金的矛盾尖锐了，吴法宪就转报上去，余立金就这这被打成了“叛徒”。后经多方调查，根本无人能证明余立金被捕过。相反，却有好几人证明是和余立金一起突围，化装到上海的。李一氓同志便是和余立金一道去上海的。因此，给余立金同志戴上叛徒帽子纯属诬陷。

关于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事实真象，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基本上讲清楚了。

原来，1968年3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是鲁迅书信手稿丢失了。江青要傅崇碧回去过问这件事。查问的结果是：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转到文化部；1967年6、7月间，江青已派戚本禹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有收条。这些手稿已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傅崇碧同志为了当面汇报清楚这件事，3月7日与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的秘书联系好，然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

台，得到允许后才驱车进入。路上遇见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但未料到，江青一进门就气势汹汹地吼叫：“傅崇碧，你带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同志坚持说明这些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江青却说不可。傅崇碧同志把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条子交给她，并指出存放手稿的地点。然后把装着书信手稿的箱子打开，果真全是鲁迅书信手稿。江青无言以对。

3月8日还召开了一次警卫会议，为了维护江青的“尊严”，批评了傅崇碧，搞了几条规定，如必须先打电话经过允许；只进一人，不许带人；文件不要直接送，统由中办秘书局转；不许带武器等等。问题已经解决了。隔了两周以后，又把此事翻出来，硬说是杨成武指使干的。这是用林冲误入白虎堂的手法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进钓鱼台大门是得到陈伯达的秘书同意的，怎么说是“冲进去”的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确实对傅崇碧同志采取了保护措施。会上宣布撤销了傅崇碧的卫戍司令员职务，同时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后经毛泽东同志批示，把他家属也送去沈阳。当然他这个副司令员是没有权的，处于被隔离审查状态，不断写交待材料，就这样度过了七年。

林彪为什么要整杨成武同志呢！

林彪在“三·二四”大会上宣布杨成武的罪状是：同余立金相勾结，要打倒吴法宪，夺空军的权；同傅崇碧相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有野心，想排挤黄永胜等。林彪还说杨成武的主要错误是山头主义、两面派，政治品质很坏，两面三刀，整江青的黑材料等。这些罪名，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

根本原因是林彪对杨成武心怀猜忌。1967年夏，杨成武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大江南北。林彪怀疑杨在毛泽东同志面前说过林彪的坏话。有一次，林彪问杨，主席问过我什么情况，你怎么说的。杨说没讲什么。其实，毛泽东同志曾对杨讲过：林彪封我四个官儿（即“四个伟大”）。可能林彪听到什么风声，而杨没有告诉他，引起林彪的猜疑。还有，1967年3月，林彪告诉杨，不要送文件给叶帅。杨请示周恩来同志后，继续照送。9月下旬，杨随毛泽东同志视察回京后，曾到一些老师家里去传达过毛泽东同志视察时的谈话内容。1967年9月下旬，杨成武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组长后召开第一次会议就明确宣布：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要向常委请示汇报。杨确实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对老师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大约这些就是林彪指责杨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内容。

整杨的直接导火线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王飞等人随意关押余立金的秘书。杨接到揭发王飞等人的信后，要吴法宪处理。吴反向林彪告状，诬陷杨余勾结要夺权。同时，林立果正送给空军党办王飞等人培养，整党办的人就是整到叶群、林立果的头上来了。因此，便捏造出杨、余勾结要夺吴法宪权的罪名。

江青为什么要和林彪勾结起来整杨成武呢。因为从上海、北京弄到的一些有关江青在三十年代丑闻的材料，都存放在杨成武那里，杨成武感到不好处理，一直未动。江青得知，勃然大怒，说你想放长线钓大鱼吗！后来这批材料经林彪批准，在中南海内销毁了。

“三·二四事件”后，3月25日改组了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不久，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这天，李作鹏写信给林彪，指控叶帅是杨成武的后台。后来，又扬言杨成武、傅崇善长期在晋察冀、华北地区工作，暗示聂荣臻、徐向前同志也是他们的后台。从此，黄永胜等不再给老帅们送文件，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操纵在以林彪为头子的，黄、吴、叶、李、邱为主要骨干，以办事组和空军为主要活动阵地的这一伙人手中，林彪集团得到进一步发展。

六、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

为什么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障碍扫除，大权到手，名正言顺，羽毛丰满。

所谓障碍扫除，就是说，从整罗瑞卿同志开始，以后诬陷贺龙同志，整老帅，制造杨余傅事件，这时，被林彪集团认为障碍他们夺取军队领导大权的人都已扫除了，有的被整死，有的整垮，有的靠边站，有的被半打倒。总之，除林彪以外，没有一个老帅还能管事了。他篡权的主要障碍都已扫除了。

所谓大权到手，就是说，不仅军队的主要权力已经掌握在林彪和他的亲信、党羽手中，而且地方上的党政财文大权，通过“三支”“两军”，不少也落入林彪集团之手。如中央、国务院不少部门都已实行军管或派有军代表，当时四机部、六机部、国家体委归李作鹏分管，五机部归邱会作分管，二机部由吴法宪分管。各省市不少是林彪集团所把持，如江西的程世清，上海的王维国，浙江的陈励云，广东的丁盛等。

所谓名正言顺，就是说，九大党章已规定林彪为接班人，林彪的“副统帅”地位已用法定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封建性的遗迹，完全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同无产阶级党的性质根本不相容的。也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林彪在九大上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他林彪，他如果在贺龙手下早成了段德昌了。其实，杀害段德昌的是当时在湘鄂西搞肃反扩大化的夏曦，根本与贺龙无关。

所谓羽毛丰满，就是说，林彪集团的主要骨干和亲信黄、吴、叶、李、邱等人，都已进入政治局，掌握实际权力，在中央委员会中，军队干部占45%，其中不少人是林彪集团的党羽，如程世清、梁兴初、陈仁麒、丁盛、刘兴元、刘贤权等。一方面林彪、“四人帮”在政治局中占据半数以上，另一方面，不少老同志都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如李富春、陈云、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的坚持，朱德、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等同志才保留在政治局内。

林彪集团在九大选举时耍阴谋，肆意进行破坏。投票前，他们布置各代表团，指定选哪些人，不选哪些人。因毛泽东同志说过，要选老帅们当中央委员，他们便规定对老帅们的投票只能刚过半数，使之勉强当选，实际上是采用另一种形式进行排斥打击。即使被选进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也不会起什么作用。

九大会场的布置十分奇特，在主席团座位的排列上十分引人注目：在左边就座的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

兴、温玉成等人；而在右边就座的是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壁垒分明，一目了然！

曾几何时，无情的历史事实终于表明，自称为左派的林彪、江青一伙，不是一个个都被押上了历史上的审判台，几乎全是右派、反革命，成为遗臭万年的小丑，而被他们咒骂为“老机”、“老右”的，经过大风大浪的考验，都是真正的左派、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列主义者。

“物极必反”。九大是林彪集团发展的顶峰，也是他反动面目开始大暴露，走向没落破产的开端。

(四) 林彪集团走向破产和覆灭

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集团从极盛走向破产的开始。林彪并不满足于九大党章规定他为“接班人”的地位，等到自然接班的到来。用叶群的话来说，就是“怕林彪的身体拖不过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同时还耽心“夜长梦多”，怕接班人地位不稳，中途发生变化。因此，林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中规定设国家主席，一心想当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

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进行的一系列阴谋活动，搞突然袭击，秘密串连，煽风点火，欺骗同志，结果阴谋败露，遭到破产。1971年中央发出的77号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已有详细的叙述，不再赘述。

九届二中全会这场斗争，最后这样结局，完全出乎林彪集团的预料之外。此后，林彪集团的核心成员黄、吴、叶、李、邱被迫检讨，处于被动地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但林彪一伙不甘心失败，便铤而走险，阴谋策划搞反革命武装政变，密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作垂死挣扎，林彪集团由反党集团一变而为反革命集团，暴露出穷凶极恶的反革命面目。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过程，简单说来就是谋害、南逃、叛逃。这方面的情况，《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三作了详细的揭露，同志们都非常熟悉，这里略加叙述。

一、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69年10月，在林彪授意下，吴法宪委任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并委以指挥一切的大权。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人组成“联合舰队”。1970年5月2日晚，林彪接见了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等人，5月3日，周宇驰、王飞等开会向林彪表忠心，共推林立果为“头”。这个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阴谋武装叛乱的特务行动队。

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在王维国参与下，建立“上海小组”，进行反革命活动。

1970年后，胡萍、王维国、刘锦平、顾同舟（广州空军参谋长），在上海、北

京、广州建立秘密据点。

1970年9月，林彪阴谋窃取国家最高权力未得逞，加紧武装叛乱准备。1971年2月，林彪、叶群、林立果由北京来到苏州，随后林立果经杭州到达上海。3月21日，林立果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谋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在沪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秘密开会，确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负责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1971年4月，王维国受林立果指挥，在沪成立为政变服务的“教导队”。

1971年3月，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米家农，在林立果授意下，把原民航局宣传队改变成反革命服务的“战斗小分队”。

1971年9月5日晚，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毛主席在南方同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并密报林立果、叶群。6日，李作鹏在武汉得到刘丰关于毛主席谈话内容的密告。李作鹏当即返回北京，面告黄永胜、邱会作，黄即电告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叶群得到黄永胜、顾同舟的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谋害毛主席。9月8日，林彪亲笔写了反革命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10日，林彪又写信给黄永胜：“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交王飞送给黄永胜，让王飞充当林立果和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9月8日晚，林立果潜回北京，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分别向周宇驰、刘沛丰、江腾蛟、王飞、胡萍等人传达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具体策划部署谋害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并指派江腾蛟为第一线指挥官，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火车，用炸药炸苏州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或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地的油库，由“教导队”以抢救毛主席为名进行杀害，或由王维国乘毛主席接见时动手。

同时，林彪、叶群为作叛逃的准备，指使周宇驰等人从空军司令部拿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以及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的机场资料。

毛泽东同志于9月12日胜利返回北京，林彪谋害的阴谋彻底破产。

二、阴谋南逃另立中央，实行南北割据，分裂国家。

1971年9月11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主席已离沪返京。林彪、叶群得知这一情况，阴谋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于新野、胡萍布置南逃。胡萍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王飞、于新野拟定了南逃人员名单，研究了分工和具体行动计划。并派林彪的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转北戴河见林彪、叶群。当晚十时许，周总理发现可疑后，追查飞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并命令该机立即返京。胡萍一面谎报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谎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返京，一面要周宇驰向林立果通风报信。周总理又下达一道命令：必须有周、黄、吴、李四人联名指示才能放飞。

三、外逃叛国，自取灭亡。

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接到关于周总理追查飞机的密报后，因反革命叛乱阴谋已经败露，即与刘沛丰等到山海关机场仓惶登机叛逃。他们不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有开，机舱门还未关上，就命令飞机启动滑行，于零点三十二分起飞，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林彪、叶群的武装叛乱阴谋彻底破产。

1971年9月13日三点十五分，周宇驰、于新野、李维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2685号直升飞机外逃，驾驶员陈修文同志发觉后挫败了他们的叛国行动。直升飞机降落时，陈修文同志被周宇驰杀害。从截获的飞机缴获了大批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下面回答两个问题：

一、林彪是不是“超级间谍”？十大报告虽曾说过“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23页）这个问题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出的起诉书，只列举了他们的四大罪状：煽动、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夺权；迫害和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其中并无间谍罪行的条目。如果林彪果真是“超级间谍”，起诉书是不应该遗漏的。

二、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不是坠毁的？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于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1点53分飞越国境，2点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汉东北六十公里处坠毁。

13日上午八时半，蒙古外交部召见我驻蒙大使许文益，就中国飞机失事坠毁在蒙古境内一事提出口头抗议。大使请示中央后答复他们：是中国民航机迷失航向，误入贵国领土，表示遗憾。

15日我驻蒙大使和蒙方人员一道去察看现场，拍摄了一批现场照片（见材料之三第三部分23证），给中央写了报告。

飞机上的九具尸体，在坠毁现场就地埋葬。这九具尸体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潘景寅，还有司机杨振刚，机修人员机械师邵起良、张延奎、李平三人。

从坠毁到埋葬经过80小时，即暴尸三日有余，这是叛徒林彪的可耻下场！

经过专家鉴定分析，认为这架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并非空中爆炸或被击落，也看不出发生过格斗的迹象。

（五）严格区分敌我界线和路线是非

耀邦同志多次讲过：要把毛主席和林彪、“四人帮”区别开来，把毛主席的前期和后期区别开来，把毛主席的正确和错误区别开来。这是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时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我们在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时，一定要严格区分两种界限，一是毛泽东同志所

犯的“左”倾路线错误，这是党内同志所犯的错误的错误，要认真分析，吸取教训，引以为鉴戒；二是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是敌我问题，他们是篡党窃国大盗，祸国殃民，罪恶滔天，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充分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使他们无法逃脱罪责，受到历史应得的惩罚。

“文化大革命”历史表明，毛泽东同志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以及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信用，对于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和横行是有重大的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毕竟同林彪等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林彪一伙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的罪恶目的是要毁灭社会主义制度，毁灭人民民主专政，毁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毁灭我们的党，使我国人民重新沦为受压迫、受剥削、被奴役、被摧残的悲惨境地。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帮派体系。他们不但秘密准备了自己篡党夺权的干部班底，而且秘密准备了自己阴谋叛乱的武装力量——“大小舰队”。他们在全国制造混乱，是为了实现所谓“乱中夺权”。他们的这些阴谋活动是背着毛泽东同志进行的。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甚至密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和策划进行武装叛乱。因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性质是确定无疑的。

与此相反，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他在主观上还认为是在拯救和保护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坚持马列主义，是在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他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还是基本上保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务院，勉强地保持了党的统一。他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一批领导同志，解放了一批干部。例如，他一面遍信林彪、江青一伙的假汇报，受他们的蒙蔽，错误地处理了罗瑞卿、贺龙、“二月逆流”、“杨余傅”等问题，但一经发觉，他能予以平反改正。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贺龙、杨余傅、罗瑞卿问题，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搞错了，要翻案。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听了一面之词不好，向同志们作自我批评。林彪自我爆炸后，多次说“二月逆流”不要再提了，亲自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为受诬陷的老同志恢复名誉。对于明显的陷害老同志的假材料，如谢富治报送的诬陷叶剑英同志的假材料立即驳回。

1968年4月13日，谢富治授意“中央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将香港《工商导报》1934年6月4日和11月29日，造谣诬蔑叶剑英同志“企图投敌”的文章抄报中央，阴谋中伤叶剑英同志。毛泽东同志阅后严厉斥责：“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已看过，现又送来”（1968年4月23日）。他领导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对江、张、姚、王等人也进行了多次批判，并且不让他们取得最高领导权。这些都给党后来粉碎“四人帮”造成了有利条件。直到他的晚年，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中国的安全，一再提醒要警惕北极熊的突然入侵，比较客观地分析国际形势，基本上正确地掌握中国的对外政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力量去反对霸权主义，加强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努力支援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尽管他犯了令人惋惜的严重错误，他仍然是受到党内外、国内外一切革命者尊敬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总之，毛泽东同志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罪行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划清界限，决不可混为一谈。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自

以为是为了反修防修，但是这也不能减轻他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悲剧也就在此。这是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牺牲所得出的必须牢牢记住的历史经验。

“四人帮”是我党历史上作乱 最久的一个反革命集团

金春明

历史是无情的，曾经飞扬跋扈，横行一时，给党和人民、给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灾难的林彪、江青一伙，今天正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党和人民的审判。这是一个历史的判决，它宣告了真理必然战胜邪恶，革命一定战胜反革命。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任何胆敢凌辱人民的坏蛋，尽管权势再大，终究还是要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这里开会，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四人帮”这样一个反革命集团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他们怎样兴风作浪、祸国殃民，又是怎样一朝覆亡的。从时间上说，可以说是偶合，但是，从党史研究的使命上说，却有深刻的需要。

下边准备就四个问题，介绍一点情况，谈一点个人看法，供同志们参考，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批评指正。

（一）“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和特点

“四人帮”，原来是按职务高低排列，王洪文因为是党中央副主席所以列为首位，实际上他不是首领。所以这次审判已按实际地位排列，江青是第一名，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脑。这几个人的简单情况如下：

江青，女，现年六十六岁，山东省诸城县人。文革前曾任中宣部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艺术局的顾问，后来长期养病，在毛主席身边做点秘书工作。文革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共九届、十届中委、政治局委员。

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文革后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九届、十届中委、政治局委员，十届政治局常委。

姚文元，男，现年四十九岁，浙江省诸暨县人。文革前在上海《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文革后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九届、十届中委、政治局委员。

王洪文，男，现年四十五岁，吉林省长春市人。文革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

事，文革后当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司令，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九届、十届中委、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

这四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不知名之辈，既非中央领导干部，也不是某一方面的权威。但却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跃而成为活跃于中央，横行于全国的显要大人物，拉帮结派，控制舆论，兴风作浪，制造灾难，而且长达十年之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是很发人深思的。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马克思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书所写的第二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是很有启发的。马克思说：“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的笔下却被描写成了晴天的霹雳。而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选集》（一）599页）这段话应成为一种指导线索，帮助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分析“四人帮”能够上台和作乱的条件和局势方面，从而找到防止事变重演的办法和经验。

那么怎样认识使“四人帮”能够发迹的条件和局势呢？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四人帮”是在左倾思潮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迷信和全国大动乱而产生于党的肌体上的一个毒瘤——癌。这句话包括三个意思：（一）没有在全党滋长和发展的左倾思潮，就不可能产生“四人帮”，因为“四人帮”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捣乱一切，如果党内没有左倾思潮，这种东西一出来就暴露了，孤立了。可是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着左倾思潮，夸大阶级斗争，喜欢“革命”的词句，赞赏“打倒一切”的斗争性。这样，他们就不但不会孤立，反而可以骗取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桂冠，蒙蔽一部分人，获得支持和信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四人帮”是左倾思潮发展到极端而产生的一个恶果。（二）没有现代迷信盛行，就没有“四人帮”，现代迷信一方面窒息了我们民族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使我们凡事“以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对许多事物丧失独立的识别能力，以致不能很快认清林彪、康生、四人帮这样一些党内大奸的真面目。另一方面，现代迷信又根本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设想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的国家里，象“四人帮”这样一些人要得到提拔重用，飞黄腾达是不容易的。既使得到某个领导人的垂青，提升也是有限度的。但是，我们由于搞现代迷信，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一个人高居于全党之上，“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他的一句话可以使人死，一句话也可以使人高升。“四人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骗取了领袖的信任才一步登天的。（三）仅有上两条，没有适当的机会也不行。我们常说“时势造英雄”，需要有一个“势”，也就是形势。而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国大动乱，就给“四人帮”这些坏蛋提供了这样一个形势。

上边是讲“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形成的种种条件。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江青早就有政治野心，但一直未能得到适当的机会。按她自己的说法是“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文艺问题违反实际情况的第一个批示，认为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

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江青看准了这个机会，打起搞“文艺革命”、“戏剧改革”的旗号，开始了活动。她先在北京活动，但受到了北京市委的抵制。北京不成，江青就跑到上海活动，得到了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后来曾以感激的心情说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11·28）柯庆施让张春桥给江青当助手。张春桥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对江青百般逢迎，受到江青的信任。这样，两个野心家就互相勾结起来。

一九六五年，江青在上海组织起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又看中专门会舞文弄墨，善打棍子的文痞姚文元。姚文元自然对江青极力巴结。随后又靠江青之力，张春桥、姚文元都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这样一个小帮派就有了核心。江青一伙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势，招兵买马，拉帮结派，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帮派体系。随着帮派体系力量的增强，江青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一九六八年，她就在一些亲信中攻击周恩来同志“掌握方针原则差，在动乱中看不清方向，作不出决策”。同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召开九大时，她建议党中央多设几位副主席。毛泽东同志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使江青的野心未能得逞。一九七二年九月，王洪文由上海调中央工作，成为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四人帮”就完备地形成了。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视为实现她当“女皇”的军师和“闯将”，张、姚、王则把江青视为靠山，把江青奉为首长和领导。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帮派分子也把江青奉为领袖，表示要对她效忠到底。

这个反革命集团有哪些特点呢？

（1）依赖特殊身份，可以传达“最高指示”，代领袖立言。所谓“特殊身份”，当然就是指江青是毛主席夫人而言。按着西方习惯的说法叫作“第一夫人”。世界各国都有第一夫人，发挥各种作用，那是因人，因国情不同而异的。中国是一个长期实行封建皇权统治的国家，皇帝是万岁，娘娘是千岁，在群众中这种封建的思想影响是很深的，再加上现代迷信的狂热，江青的地位就大大与众不同了。而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极力地利用她这个特殊身份，美化自己，欺骗群众，捞取政治资本。十年当中，她每到一地或开大会，总是首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一九七四年，毛主席批评了江青，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可是江青依然如故。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在大寨讲话还是：“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身体很健康”。甚至一九七六年八月，还要《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而我们当时的有些领导人，由于有封建残余思想作怪，总还是认为江青可以代表毛主席。

不仅如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谁要想去见毛主席，都得先通过江青，由江青同意安排了，才能见到。七五年秋以后，又是毛远新当联络员，政治局委员、甚至党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毛主席。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就给了“四人帮”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可以利用特殊身份，胡作非为。

有的同志可能会说，江青当主席夫人并非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为什么以前没有起破坏作用呢？这里自然有毛泽东同志的责任。据一位在上海地下党工作过的老同志谈：毛泽东同志和江青结婚前，党中央曾打电报给上海地下党，要她们了解江青的情况并提出意见。上海地下党负责人经研究打了电报给中央，认为江青不宜和毛泽东同志结婚。后来中央又发来电报说已经结婚了，但中央规定江青只照顾主席生活，不参预政治活动，如同志们有意见，请按此解释。多年来，对江青确实也是这样办的。但是，后来毛泽东同志违反了党中央的这个规定，信任重用江青，支持她参预政治活动。江青在上海搞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是知道和支持的。江青搞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主席让江青去找林彪的，纪要毛主席还亲自动手修改三遍。江青进中央文革小组是毛主席赞同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干的不少事是毛主席赞同或授意的。因此，江青之所以能猖獗横行一时，毛泽东同志是有重要责任的。这也是“四人帮”得以横行十年，难以纠正的一个根本原因。

(2)有理论伪装，摆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面貌，装腔作势，欺骗蒙蔽不少人。

林彪集团当然也尽量搞一点带理论色彩的东西，如什么“最高最活”，语录本、老三篇等，但到底是一批武人，舞文弄墨不如“四人帮”，搞不出成套的假理论。“四人帮”就是依靠挥舞“理论棍子”起家，先是批“海瑞罢官”，接着批“三家村”，批周扬，批陶铸的两本书，一路打下去。

他们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错误理论主要有哪些呢？是否可以说主要是六个，即：

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

②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是以文艺为突破口，否定十七年，进而打倒一切的一条大棒。

③打碎国家机器论。以总结上海“一月革命”经验，坚持巴黎公社原则为借口，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称为旧政权要彻底打碎，以使他们篡党夺权。

④批“唯生产力”论。这是康生的一大发明，也是“四人帮”用以破坏国民经济，反对生产建设，祸国殃民的一条坏理论。

⑤全面专政，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对全国人民实行全面的封建法西斯专政。

⑥民主派即走资派论，或党内资产阶级论，为打倒一切革命老干部，由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理论依据和反动纲领。

这六大错误理论，发明创造权当然不完全是属于“四人帮”，不少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或同意的，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也是有贡献的，但在宣扬、论述、发挥等方面，“四人帮”是负有无可回避的责任的。

他们过去批刘少奇同志的所谓“黑六论”，那是颠倒是非，完全搞错了。他们的这一套倒是应该加以彻底批判的“黑六论”。

(3)结成全国性的帮派体系。如果说林彪集团主要的势力是在军队，搞大小舰队，企图利用三支两军，把一切都“军起来”。“军起来”这句话是我们在河南“五·七”干校时，听传达王新讲的，说军干群三结合要军队干部挂帅，称为“军起来”。这话不知是

否王新的发明，但确实反映了林彪集团的特点。“四人帮”在军队里没有多少力量，主要势力在地方。他们也千方百计在军队拉人，但除了丁盛、陈亚丁、徐海涛等极少数坏家伙外，基本上是拉不动。但是在地方，他们却搞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普及全国各地的帮派体系。如在中央各部委有文化部的于会泳、外交部的乔冠华、体委的庄则栋、工会的金祖敏、卫生部的刘湘屏、公安部的祝家耀、教育部的周宏宝等。上海是他们的基地，有一批骨干，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陈阿大、潘国平、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叶昌明等；辽宁有毛远新、杨春甫、刘盛田、尹灿贞等；福建的陈佳忠、李庆霖；浙江的赖可可、罗毅、翁森鹤、张永生；江西的涂烈，安徽的郭宏杰，河南的唐岐山，湖北的夏帮银，江苏的华林森，四川的黄廉等等。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力量是一批野心分子、冒险分子、出卖灵魂的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他们以迟群、谢静宜直接控制的“两校”写作班子为中心秘密联络点上下串连，互通消息，传达江青一伙的“指示”，收集情报，编造诬陷材料，监视革命干部，串连各地帮派，煽动纠纷，制造混乱，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篡党窃国为最终目的。

这样的帮派体系是我党六十年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流毒之广，为祸之烈，也是史无前例的。作为完整的帮派体系，今天已不存在了，但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仍不可低估。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这个反革命帮派，当然是通过法制的程序，仍然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政治任务。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但主要的是不是这么三个。

（二）“四人帮”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关系

“四人帮”集团所以能迅速发迹是同他们同林彪集团的勾结，得到林彪集团的支持分不开的。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关系，可否概括为三个一样和四个互相。三个一样是：

路线一样：都是推行“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极左路线。在路线上，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手法一样：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不过一个是“举得最高，学得最好，跟得最紧、用得最活”的“伟大助手”，一个是被称为“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的文艺革命“伟大旗手”。

目的-样：都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乘乱夺权，篡党窃国，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区别是建立父传子世袭的林家天下，还是江青当“女皇”。这方面就不需要多说了。

四个互相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互相争夺。

江青与林彪的勾结是从一九六六年初开始的。江青想利用解放军这个阵地，请这位“尊神”庇护，来推行自己文艺上的一套，进而实现其政治野心。一九六五年江青就找过当时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罗拒绝了。一九六五年底，林彪搞突然袭击捏造罪名打倒了罗瑞卿同志之后，江青就转而去

找林彪。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日，江青从上海去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目，进行政治交易。江青要借助林彪的地位和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林彪也需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份为己所用，所以二人一拍即合。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林彪就给总政下达指示，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二月二日，江青就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人开始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二十日会开完了，由部队同志整理了一份纪要，江青看了不满意，又找并无军职的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才写成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子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又由林彪写信给军委常委，军委通过了，最后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所以，这个“纪要”可以说是林彪与江青勾结的产物。

后来，一九六七年一月，林彪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林彪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还在解放军军级以上干部会上吹捧江青，说什么江青“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同志”。甚至江青闹着要提级（从九级提到五级），总理不批，也是报林彪批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怕把自己三十年代的丑史暴露出来，叶群、吴法宪就指使上海的空四军一些人，化装成红卫兵，抄了上海、苏州一些老的文化人的家。把搜抄到的有关材料交给江青，经林彪批准销毁了。

林彪帮了江青的大忙，江青一伙当然很感激，也极力为林彪效劳。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上提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急用先学，立杆见影的所谓三十字方针，过去大家一直以为是林彪的创造，其实据揭发，那是张春桥帮助林彪搞的。所以“九一三”后，还一直不准批判这个“三十字方针”。

在把林彪的“接班人”明文写入党章的问题上，江青一伙是出了大力的。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主席提出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利用他们整理各地意见通报全国的机会，借工人和“造反派”之口，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坚持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她吹捧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

“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一九六九年四月，九大前夕，党中央开会讨论党章，在谈到是否要写上接班人的名字时，江青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张春桥也在上海极力鼓吹，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了，这就放心了”。

在这个问题上，康生也是很卖力气的。他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发言中说：“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九大以后，康生还在中央机关的万人大会上，鼓吹党章上写了

林彪为接班人，我们党反修防修永不变色就有了保证等。现在读起这些“名言”真是辛辣的历史讽刺。

从上边列举的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由于他们的狼须为奸，就增大了反动能量，成为令人侧目而视的一股邪恶势力。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九大前，他们是以勾结为主，共同打倒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搞乱全国、乱中夺权。虽也有互相争夺的矛盾，但比较小。九大后有了一个变化，林彪自认为羽毛丰满，急于抢班夺权，而江青一伙，也当了政治局委员，自认为势力已经不小，不那么依靠林彪这位“尊神”的保护了。如果按林彪的话说，就是在“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上发生了争夺。这个互相争夺的矛盾有一个发展过程。九届二中全会，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林彪、江青两伙争夺的一次大暴露。会后，随着批陈整风的深入，这种矛盾就越来越多了，以致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中，把江、张、姚列为要消灭的笔杆子托洛茨基集团。但就是在这种时候，两个集团也还在互相勾结利用。大家记得“九一三”前不久，有一份杂志封面上还有一副林彪读《毛选》的彩色大照片，那就是江青精心替林彪拍摄的。

所以，“文化大革命”前五年多，这两个反党集团的关系一直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互相吹捧、互相争夺的。而九大前，以勾结利用为主，九大后，争夺矛盾逐渐增多，但也并未公开对立。是否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关系。

（三）“四人帮”单独掀起的两次大恶浪

“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多，大量的坏事都是林彪、“四人帮”利用我们党所犯的左倾路线的错误共同制造的。许多重大事件，谭宗级同志在讲林彪问题已经讲过了。这里只讲后五年中的两次大恶浪：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北京接连开了两次万人大会，一次是军队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一次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两次大会都是江青亲自出台指挥，迟群、谢静宜两个干将登台表演，大放厥词。接着江青就批文件，送材料、放火烧荒，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指挥她的写作班子抛出一篇又一篇的黑文章，掀起一股批宰相、批周公、找大儒之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逆流。

为什么要搞这样一场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它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至今还没有看见系统的说明材料，也没有看见毛主席当时的讲话原文，有些问题还说不清楚，从目前接触的一些材料看，大体过程是这样：

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央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批林问题时，讲到过要批孔。

一九七三年五月，江青去看毛泽东同志，见到那里放着郭沫若同志著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主席送了江青一本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并把一首诗念给了江青，就是：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江青把这件事和这首诗告诉了姚文元。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同志把江青叫去，又叫她手记了一首诗，叫作《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在这次见面中，毛主席给江青讲了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说“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是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这次谈话中还批评了《人民日报》，说：“《人民日报》说林彪极左，上海不同，说是极右。《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又朝回搞呢？这是王若水组织的”。江青说，王若水给毛主席写信，主席对这封信非常不满意。江青还传达说，毛主席讲：“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什么是“大事”呢？据江青、姚文元等人解释，就是没有抓阶级斗争，没有抓批林批孔。

在姚文元主持的《红旗》杂志评论中，就说：“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短评）。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叶剑英同志，因此这个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很清楚的。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亲自批发了七四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就是由江青直接指挥编辑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从上述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到，这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确实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个过程中，“四人帮”也搞了不少的私货，如批“走后门”之类，但从根本上说，不能认为批林批孔是他们“背着毛主席”搞出来的。

批林批孔对不对呢？抽象地说好象没有什么不对。林彪难道不应该批？孔老二我们从“五四”运动就开始批，一直到今天，肃清封建余毒仍然是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重大任

务，所以，也不能说不需要批孔。但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作具体的分析，而不能一般的抽象的去议论。正如列宁所说的：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二卷512页）我们应当按照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首先，从内容上看：既不是批判林彪推行的极左路线，也不批判孔孟的皇权思想、专制主义，更不批现代迷信，而是集中到一点批“克己复礼”，按照《红旗》杂志评论员的说法：“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的内容很多，中心的一点是克己复礼”。（《认真学，深入批》1974年第三期）“克己复礼”按通常的解释应该是“要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可是他们说不对，复礼就是复辟，“林彪的克己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简言之，克己就是搞阴谋诡计，复礼就是搞复辟，克己是手段，复礼是林彪路线的实质”。（《文汇报》评论：《继续革命，反对复辟》1974年2月10日）再具体化，就是批“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里又偏重在“举逸民”。按照当时的社论，所谓“举逸民”，就是“妄图把被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红旗》短评：《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当时“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三年多了，林彪党羽除了一部分被“四人帮”接收外，早已不在台上了。这时再提出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地就是针对文革初期受批判靠边，而当时重新开始工作的老干部了。他们所说的“举逸民”就是指老干部重新上台工作。而所谓“复辟”，也就是指恢复“文革”前的正确政策。所以，从内容上看，批判是不适当的，错误的。

其次，从目的上看，搞这么一场运动干什么？当时《红旗》评论员的说法：“只有通过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1974年第二期）集中起来就是两句话：一批极右实质，二肯定“文化大革命”这两点目的，今天看来当然都是错误的。

那么，当时提出这两点有没有针对性呢？是有针对性的。大家知道，“九·一三”后，周恩来同志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在不能不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尽力排除干扰，力挽危局，平反了一些冤案，比如为贺龙同志恢复了名誉，解放和使用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了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使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形势有所好转。可是，周恩来同志采取的这些正确政策和做法，却被认为是“不抓大事”，是搞“复辟”，“否定文化大革命”。例如：周恩来同志曾指示《人民日报》批判左倾思潮、无政府主义。1972年10月，《人民日报》组织了一整版批左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马上指使上海《文汇报》，以召开工人座谈会的名义搞材料报给毛主席。毛泽东同志作了一个批示。从此之后，就只能批极右实质，再也不准批极左了。结果使《人民日报》一些同志受到两年多的批判，周恩来同志也不能再管《人民日报》。

又如：周恩来同志1972年7月14日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时对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排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其后，周培源写了一封信给总理，提出三点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7月23日，总理把信批给有关同志：“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象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

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此文本是《人民日报》约的，但姚文元不让发表。发表后，张、姚就指使上海派人到北大调查此文的背景“是不是总理要他写的”。张春桥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1973年冬，又把此文作为“复旧”的典型，把周培源作为批判的重点对象。矛头指向周总理是很清楚的。

所以，联系上边这些情况，批林批孔的本来目的就是维护左倾路线，针对周恩来同志和一大批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的老同志的。这样的目的，当然也是错误的。

第三，实践效果是很坏的。集中起来说，就是破坏了在“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全党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形势，使全国重新出现了动乱的局面；使逐渐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急骤下降，钢总产量比73年下降16.3%；国民收入增长率从正号变成了负号，财政出现赤字；在群众的思想上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这是大家都经历过的。

因此，无论是从内容上、目的和效果上看，批林批孔运动都是错误的，不需要的，有害的。对此，毛泽东同志当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过去有一种说法，好象只有“四人帮”另搞一套才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应该说就是原来那一套也是不对的。那么，“四人帮”有没有另搞一套呢？当然是有的。他们的另搞一套，中心是利用我们党的错误，妄图打倒周恩来等一批老同志，由他们来组阁掌权。过去说另搞一套主要是“三箭齐发”，批“走后门”，事实证明，要害并不在这里。

“四人帮”搞反周组阁的阴谋活动，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1.大造舆论。指使他们的写作班子，连篇累牍地炮制大量反党文章，别有用心地吹“女皇”，宣扬吕后、武则天、甚至西太后，批周公，批“宰相”、“代理宰相”、“现代大儒”，大搞影射史学。并摆出一副总结儒法斗争历史经验的面孔，宣传西汉王朝前期和中期反复辟斗争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在中央政权始终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四人帮”登台执政鸣锣开道。

2.加紧组织班底。十大以后，王洪文、张春桥，得知四届人大即将筹备召开，以为时机已到，就在1973年9月，指示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张春桥反复叮嘱“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10月，王秀珍等就在上海举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1974年3月，王秀珍到北京找张、姚、王密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轻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的领导工作”。4月底上海市委提出一个八十八名中央副部长备选名单。到了10月，王洪文又进一步指示：“要

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除了上海之外，在辽宁和其它地方，“四人帮”也作了组织准备。

3.在中央政治局发难。突出的一件事是制造风庆轮事件，搞突然袭击。风庆轮是国产的一条万吨轮，战胜艰险，远航欧洲，胜利归来，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四人帮”却乘机大作文章，不仅搞了不少假的东西，而且无中生有的捏造罪名。

指使上海党羽炮制了一封一万多字的诬告信。他们就在信上加批语，借题发挥。江青攻击交通部是“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专政”。说交通部派驻风庆轮协助工作的李国堂同志是什么“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等等。王洪文并悍然下令将李国堂同志扣在上海批斗。以种种手法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已因病住医院，所以他们主要攻击邓小平同志，1974年10月16日晚，在政治局会议上，江、张、姚、王有预谋地利用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同志挑衅。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邓小平同志，对风庆轮这场斗争，你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立场呢？这样的挑衅已经多次，小平同志已忍无可忍，就顶江青说，我要调查。“四人帮”就一拥而上，滥施攻击，使政治局的会议无法开下去。经李先念同志调解，小平同志离开了会场。小平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会后江青造谣说：邓小平态度恶劣，同她吵了一架，最后扬长而去等等。

4.向毛主席告状。10月16日的会议没有能够压服邓小平同志，“四人帮”进行了一夜的紧急策划，17日即派王洪文飞到长沙向毛主席告状。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开了一夜会，商定派我来汇报。趁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等等。同时还吹捧江青、张春桥，妄图搞掉周总理，由他们组阁执政。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清楚地知道江青“积怨甚多”，“志大才”，担不起领导国家政府的大任。批评了他们的作法，明确支持周恩来同志主持四届人大，“四人帮”的这个阴谋未能得逞。

这些事实说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批林批孔虽然是不对的，但同“四人帮”搞阴谋，利用批林批孔打倒周总理，自己上台执政性质是不同的。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周恩来同志带病作报告，重申实现四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很大鼓舞。会后，周总理住院治疗，邓小平同志受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坚决果断，同“四人帮”作斗争，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同时批判派性，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短，收效很大，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但是从11月开始，情况起了一个大变化。9、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主席写信，揭发迟群生活作风上的一些问题。内容是确实的，作法也完全符合原则，但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11月2日，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这就开始了一场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而且越刮越大，从清华刮到全国，不久就公开在大字报上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迫使小平等一批老同志无法工作了。

许多同志感到不理解，四届人大时，毛主席还讲邓小平“人才难得”，只过了十个月，评价就完全变了，为什么？乔木同志有一次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的宗教和陷阱。这个提法我感到很有启发。“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明的，他自以为找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式是最好的，不仅可以反修防修，而且可以靠七、八年再来一次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这个“文化大革命”是谁也碰不得，谁也不能说不好的。一直到晚年，还是讲自己一生作了两件大事。所谓“宗教”，就是一种神圣的崇拜的信念。正因为他把“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东西当成了宗教，同时也就成了他的陷阱，在这个问题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四人帮”利用这点作乱，很多好同志也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论断而遭殃。邓小平同志搞全面整顿的许多作法，很自然会被毛泽东同志认为是触犯了“文化大革命”，是恢复了文革前的旧东西。在他看来邓当然是“右倾翻案”，所以，邓小平同志就被打倒了。提出这样一种看法供同志们参考。

当然，这期间“四人帮”的造谣挑拨也是起了作用的。特别是毛远新1975年9月和11月两次同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起了很恶劣的作用。毛远新以反映群众的思想为名，向毛泽东同志作假汇报。他说：“地震、涝灾、自然灾害、工作中的缺点都不怕、有信心。但觉得现在有一股风，“文化大革命”还对不对？是七分成绩还是七分错误？主流是什么？刘少奇路线还能批不能批？文艺革命还对不对？教育革命还对不对？我担心在这里”。“我对上面担心，怕出大的反复”。“现在谣言一大堆，集中攻击江青同志”，“干部政策落实，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也应有正确态度”。诬蔑邓小平同志“上来几天就带头翻案”。“只能做些具体工作，抓总的不行”等等。后来传达的毛泽东同志指示（（76）4号文件）很多就是由此而来的。

有的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那么难于解决，面对小平，一下子就解决了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认真分析，这里表明了毛主席对待江青等人和对待邓小平同志基本态度是不一样的。乔木同志在6月13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依靠的骨干是林彪、中央文革一些人，是造反派的头头，如所谓五大领袖之类”。“另一种人所谓留用人员，所谓旧政府的留用人员，象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后来又用了邓小平，用了一个时期。但对这些人始终是不信任的”。了解了毛主席对待两种人的不同态度，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所谓“解决”，是对他信任的人，“解决”小的缺点毛病，所以可以慢慢来，半年、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而对他所不信任的人，他认为又是犯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那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于是，一下子就解决了。对这两种“解决”的不同，外国人也看出来。比如夏尔·贝特兰，在他的《大跃进》一文中就说：“一些现在被说成是对那四个人的批评的毛主席语录，实际上是毛给他们的忠告：不要孤立自己，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要操之过急。这些忠告和毛泽东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如刘少奇、邓小平的批评，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外思潮》〔二〕83—84页）。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就在这里。

关于批邓问题，情况大家都了解，就简单谈上边一点看法供参考。

(四) “四人帮”阴谋政变，自取灭亡

时常听到有些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林彪一伙搞反革命政变，有纲领、有行动、有个《“571”工程纪要》，摆在那里，铁证如山。“四人帮”搞反革命政变，主要罪证是什么呢？确实至今还没有看到“四人帮”有一个象《“571”工程纪要》那样完整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但是，江青一伙要搞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是有大量事实证明，确凿无疑的。

上边我们已经谈过“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妄图反周组阁阴谋未得逞之后，“四人帮”就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工作，包括舆论上的准备和武装力量的准备。让我们来看一看下边的事实。

1975年1月召开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就在会议期间，王洪文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准备内战、外战一齐打”，请看，王洪文要准备打仗了。打“外战”那是一句漂亮的空话，打“内战”才是内心的真话，就是说，起码这时“四人帮”已经在考虑准备抓枪杆子，图谋用武装夺取政权了。

接着，他们就以上海为基地，进一步实行“第二武装”计划，搞所谓民兵、保卫、消防“三位一体”的试点。大家知道，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民兵历来是受正规军指挥和领导的，成为解放军的一支得力助手。建国后，民兵也是一直是受人武部领导的。可是王洪文搞的这种试点，却反其道而行之。其特点就是取消人民武装部，用民兵指挥部吞并人武部，使民兵不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指挥，而完全由他们的帮派体系控制。王洪文和王秀珍在私下密谋时，曾赤裸裸地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一九七五年夏，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在政治局内批评了“四人帮”。王洪文在受到批评之后，回上海呆了几个月。他在上海搞什么呢？主要是搞武装。王洪文宣称他要“搞四十万民兵，要有四十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和购置了枪支四万八千四百六十二支，指挥车十辆，雷达指挥仪十套，步、机枪零件四十一万八千件。他们计划装备步兵三十个团，十个高炮师，三个地炮师，一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团，配备一三〇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2门等等。这么多的武装放在哪里呢？本来按照规定，武器由解放军统一保管的。可是，“四人帮”作贼心虚，害怕解放军。所以王洪文就给他们的上海党羽下指示：“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发到民兵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搞这么多武器干什么呢？王洪文说：“要准备打游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不能顺利实行的时候，就不惜发动阴谋叛乱，打内战，把中国重新陷入战争的火海之中，这是何等地阴险毒辣而反动透顶啊！

“四人帮”野心很大，并不以在上海搞“第二武装”为满足，而且要在全国搞“第二武装”。经过王洪文、马天水、王秀珍等人的一番密谋策划，就在1975年，他们布置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周宏宝出面，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正式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总指挥部”，各省、市、自治区也建立民兵指挥部，中央和地方的民兵机构实行垂直领导，不受军委各总部和地方军事机关的领导，而且准备由王洪文担任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的总指挥。这样的荒谬建议，当然不可能得到党中央的批准。

王洪文的这些话并不是个人的，孤立的，应该说是“四人帮”整个阴谋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一伙就总结了一条经验，叫作：“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当时就指使马天水等人积极组织武装力量。所以，王洪文搞的这一套，可以说是贯彻他们的“既定方针”。江青不是1975年9月在大寨的讲话中，说：“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江青说自己是每天枕着武器睡不着觉，真是念念不忘篡党夺权！

1976年2月，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文件发出的当天，张春桥就写下了“2月3日有感”，发泄不满，露骨地表现了要实现“新桃换旧符”的反革命野心。

1976年4月，王洪文打电话给马天水，指令“抓好民兵训练和装备”，并指使王秀珍制定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的方案”，这也是阴谋家惯用的贼喊捉贼的手法。王秀珍接到王洪文的指令，马上召集叶昌明、陈阿大等人开会，布置“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内战、外战一起打”。6月，王洪文下令马天水突击发枪，马天水等人立即作了发枪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在上海市共突击发下枪炮七万四千多件，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

8月，姚文元下令给上海“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的编写组，要他们提前把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编好，准备用这个材料造舆论，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不幸逝世。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更迫不及待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9月16日，他们利用控制的舆论工具，在“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上海《文汇报》还有通栏大标题：“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夺取更大胜利”，“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等大造舆论。

他们还拍了标准象，准备了就职演说的发言稿，这些都是三批罪证材料上已经有的，不需多说了。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徐向他汇报了他们和当时的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一齐密谋，准备打内战的情况。丁盛8月到上海，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丁盛告诉马、徐、王，当时驻防在从南京到无锡、苏州一线的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他“指挥不动”，这个军对“上海威胁很大”“你们要有所准备”。听到这个情况，张春桥马上指示徐景贤“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隔了一天，王洪文就打电话给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28日，张春桥又特别派了肖木去上海，通

知马、徐、王等人“要提高警惕”，“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要准备“打仗”。这里问题就提得十分尖锐而明确了，焦点就是“谁挂帅”。也就是说，“四人帮”已经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正是在作了这样一番准备之后，“四人帮”的首领就杀气腾腾地出场了。江青10月1日跑到清华大学讲话，诬蔑邓小平同志“迫害毛主席”。她说：“我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为他翻案的”。江青说：“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她让年轻人把好东西留着，准备迎接他们的“盛大节日”。

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北京市郊的平谷县发表讲话，叫嚣：“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他让大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这些阴阳怪气的话，矛头指向何方，是大家都很清楚。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胡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没有好下场的”。这实际上是公然发出了要推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由他们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一信号。就在这个信号发出的两天之后，10月6日，党中央就作了决策，粉碎了以江青为头子的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除了上述大量事实之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上海余党立即布置实行反革命武装暴乱，也是一个有力的反证。

10月6日之后，上海余党同“四人帮”的一切直接联系都被切断了。这些热锅上的蚂蚁千方百计了解情况。当通过他们派驻公安部的骨干祝家耀，确实了解到“老娘”已经“心肌梗塞”之后，马上在10月8日实行紧急动员。他们提出了“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等反动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人民书”，要同党和全国人民“决一死战”，还策划用钢锭堵住机场跑道，用沉船堵住吴松口，切断电网，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消息。他们制定了代号为“捍一”、“方二”的武装叛乱作战方案，决定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设立了秘密指挥点，架设十五部电台，调集和布置民兵、武装警察、警备部队三万五千多人，集中二百五十辆卡车，和大量食品和其它物资。

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在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人民面前，在反革命集团首脑已经被隔离审查的情况下，上海一小撮余党的这一番倒行逆施的反动部署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热锅上的蚂蚁的一番奔忙，只不过进一步暴露了“四人帮”武装政变的反革命密谋，又为他们自己增添了一项确凿的罪证而已。

“四人帮”所以能在1976年10月6日被一举粉碎不是偶然的，是有充分的群众基础的。当然中央某些领导同志是起了重大作用的，是有功于党和人民的，但绝不应当把十月的历史性胜利，仅仅归功于某个人。应该看到党心民心之力量。“四人帮”一出场就是不得人心的。他们发家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场就反响冷淡。《文汇报》发表姚文二十天，报社只收到三篇来稿，其中还有一篇是全面批驳姚文的。在整个

所谓讨论期间，仅《文汇报》收到的反对姚文的来信来稿就有三千多件。文革十年中，用各种办法进行反对“四人帮”斗争的人，更是遍于全国。十年中仅错判为“反革命”的案件，就有十七万五千多件，涉及十八万四千多人。其中包括因刘少奇冤案而被株连的二万六千多件，二万八千多人。（江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人民1980·9·17）没有判刑而受到各种各样打击迫害的人当然更多了，进行反抗斗争的党员、干部、群众何止千万。广大人民群众在运动中逐渐认识了江青一伙的真面目。特别是经过批林批孔和批邓之后，“四人帮”的面貌，人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对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压制，更是丧尽人心，激起了无比的义愤。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四五运动”就是一次大爆发。“四五运动”是一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抗议错误路线，挽救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民革命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诗人艾青在自己的诗中这样说：

天安门事件，
是光明与黑暗，
民主与专制，
革命与反革命的白刃战！
天安门事件，
象乌云深处的闪电，
照出了鬼魅的原形，
画出了刽子手的嘴脸。
天安门事件，
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
加速了“四人帮”的灭亡。

（《在浪尖上》《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0日）

粉碎“四人帮”是群众的意志，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的体会

王洪模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召开的一次极重要会议，也是我国进入向四个现代化和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目标进军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次会议，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近二十年中积累的许多问题。会议深入批判并坚决纠正了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同时也基本上纠正了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初步清算了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以来犯的某些严重左倾错误和路线错误。经过三中全会，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牢固地转上了马克思主义轨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史上的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有某种相似的重要历史地位。

下面谈两个问题：

- 一、会议的简要情况。
- 二、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及其重大意义。

一、会议的简要情况

三中全会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召开的。这两年形势的特点是，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

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基本上摧毁了他们的帮派体系，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很大一部分权力，开始形成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二、着手恢复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文化教育和科学卫生等事业，初步把各项工作纳入有秩序发展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都得到了一定的恢复。第三、从一九七八年五月起，在报刊上、理论界和领导层，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行了两条思想路线的交锋。从这几方面看，两年来党的各项工作，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基础上，迈开了前进的脚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向“四化”进军打下了初步基础。

但是，另一方面，这两年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问题是党内有些领导人，受毛泽东同志的“左”倾路线影响较深，在新时期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理论、路线和政策，阻碍全党为纠正过去错误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以致使党的路线没能从根本上全面转到马克思主义轨道。这就造成党的工作的某种徘徊和前进不快的局面，甚至发生一些新的失误。其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重新确定了“四化”的目标（这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沿袭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的基本路线”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提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理论和路线延续下来，妨碍人们纠正过去的“左”倾路线错误，并导致思想混乱和工作摇摆不前。在经济建设上，重犯了高指标、新冒进的“左”倾错误。加重了因过去工作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破坏已经存在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出现了大幅度的财政赤字。一九七八年二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九八五年钢搞到六千万吨，新建和续建一百二十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等大计划。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积累率一九七八年高达36%。这些超过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大计划的实施，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也增加了国家财政赤字。在思想上，这些同志以“两个凡是”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干扰党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路线；不但继续宣扬神化领袖的旧的个人迷信，还制造新的个人迷信。在组织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仍有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被某些领导人压下来，特别涉及一些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动，许多重要领导人不能重新出来工作。这一切，都严重阻碍着党纠正过去错误和向“四化”进军的前进步伐。

这样，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方面党需要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另一方面在实现这一伟大转变时，必须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同时也要突破那些坚持过去错误路线同志所设置的禁区，认真清理党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犯的严重“左”倾错误（包括五八年到六〇年的路线错误）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左”倾路线错误。这样才能吸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保证党在实现新时期的伟大任务时，路线正确，不重犯过去的错误，步入胜利之途。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三中全会召开前，先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时三十六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才正式开三中全会，十二月二十二日结束，共开了五天。三中全会以后又开了一天政治局会议。三个会议加在一起近一个半月，是粉碎“四人帮”以来开得最长的会议。研究三中全会的精神，要把三次会议结合起来去领会，三中全会公报就包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内容。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首先由华国锋同志致开幕词，提出来要把我们工作的着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华国锋同志讲话以后，许多同志热烈拥护工作重点转移的提议，但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与此相应，还要解决一些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时说，为了搞好工作重点转移，应当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讲到“61人叛徒集团”、“天安门事件”、康生、谢富治错误等六个问题，提请中央决定。陈云同志说，我很担心这些问题不解决，能不能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

能不能同心同德搞“四化”。陈云同志发言的简报出来以后，大家一致拥护。接着在继续讨论中又提出彭德怀同志问题，“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问题。大家认为，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主持工作时搞得很好，人们说“毛主席的路线又回来了，根本不是什么右倾翻案风”。这样，中央常委决定，会议就这么开起来。从中央工作会议到三中全会，都是放手让大家讲话，包括批评中央工作的各种意见，对历史问题的各种意见。大家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路线是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畅所欲言，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指名道姓的。根据胡耀邦同志的传达，两次会议大家都抢着讲话，绝大部分没有什么稿子，放开讲，发言自己负责，定稿就登简报。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也有些人写了稿子，写了一本本。两个会，产生了三中全会公报，华主席和叶、邓、陈副主席的八个讲话，一九七九到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件，还产生了登载五百多份发言的简报。由于简报上的发言，中央都没有核对过，不便于提供给我们研究（我自己也只是听到耀邦同志传达说有这些简报，并没有看过），所以我仅就三中全会公报和华主席、叶、邓、陈副主席的八个讲话，以及两个农业文件、一个计划文件，谈一下从党史的角度看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及其意义。

二、三中全会的主要贡献及其重大意义

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包括很多方面，这里仅就自己的学习体会，谈以下几点：

（一）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决定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并且阐明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三中全会完成了这个任务。三中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会议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全面回顾了从建国开始，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把工作重心向着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转移的情况，肯定了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指出，由于我们一九五七年以后在工作指导上曾发生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尤其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妨碍了工作重点的转移。特别是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打断了。这样，在新的形势下，及时地果断地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

然后，全会又分析了重点转移与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关系以及新时期政治路线的内容。会议认为，决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是实施新时期总任务的重大步骤。党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它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

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地革命。我国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但是，“大规模地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不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会落空。全会还指出，“党所提出的新时期总任务，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三中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对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定，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它标志着党在政治路线方面已经基本上纠正了过去的“左”倾错误，牢固地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恢复和发展了党在“八大”时期制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为什么说三中全会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对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定，是从根本上使党的政治路线转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呢？

第一，三中全会的决策和规定，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要求，符合我国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及其任务的论述就讲到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宣言》里马恩曾指出：“工人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夺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选集》第一卷第272页）马恩这段论述，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任务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内容：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在我国一九四九年已经解决了。二是无产阶级要利用自己的政权，剥夺剥夺者。在我国，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已经完成了。三是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是我国一九五六年已经提出，没能很好实现，而成为当前最紧迫，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要任务。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也提到：“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了，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列宁在这里强调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解决以后，就要把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党的工作的“首要地位”，并且要把它作为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来看待。

斯大林一九三九年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工作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资本主义分子的最后残余，组织文化教育，组织完全现代化的军队来保卫国防。”斯大林虽然在实践上犯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他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的论述是正确的。

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尤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展经济，繁荣和提高文化，“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的论断，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重要观点，而这恰恰是过去被我们长期忽视的观点。实践证明：这些正确观点是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新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基本任务的这些论断，来确定自己政治路线的。

三中全会关于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策和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定，也符合我国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三中全会的上述决策和规定，是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二十多年的条件下作出的。这时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早已经不存在了。广大人民群众同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斗争，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残余形态。整个来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显然，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和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正是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而采取的政治路线。这里举几个数字加以说明：1948年毛泽东同志曾估计我国有3600万地富分子，二十年来地富分子死了不少，现在还存在的地富分子（指摘帽以前）约有四百万。经过评议，绝大多数地富分子已经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表现不好抗拒改造因而继续戴帽的不到五万人。这五万人分散在具有八亿人口的农村。有的县，这次评议后继续戴帽的分子是原来地富分子的千分之一。民族资本家在一九五六年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时候，全国工商业者是七十一万，加上私方代理人五万，一共七十六万人。二十多年死了一部分，退休了一部分，当时把有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小业主也划了进去，现在落实政策又划了出来。结果，现在全国企业、商店里担任工作的原资本家约有十多万人。那么这些人的工作情况怎样？据上海、无锡、天津部分企业的调查：在这部分企业里一共有原资本家六千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有二百九十八人退休，剩余参加车间、商店劳动的原资本家有五千三百七十七人，工程技术人员有十九人，一般科室管理人员有四百三十四人，担任车间主任的七人，担任厂长、经理的没有。这个状况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他们的工资状况如何？根据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四个城市的统计：现有的原资本家，工资在五十元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工资在五十元至一百元的占百分之五十八，两项加起来占百分之七十九点三，工资在一百元至二百元的占百分之十七点七，二百元至三百元的占百分之二点三，三百元以上的占百分之零点七。这个工资收入和我们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收入差不多。从这里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资本家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造，绝大多数已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种阶级关系的现状，正是三中全会关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依据。实际上这种类似的阶级关系状况早已出现了，由于过去工作上的失误才推迟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干扰了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以上是说，三中全会制订的政治路线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的理由。

第二，三中全会的决策和规定，是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错误，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

前面我们谈到，从建国以来，党的事业经历了成功和失误的曲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又逐步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这就是说，截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在近三十年中，虽然大部分时间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一部分时间犯了路线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就犯了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三中全会在清算“文化大革命”错误中，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澄清了过去被错误路线和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颠倒是非。其中包括：所谓一月风暴，所谓二月逆流，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对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工作的评价等等。会议对这一系列大是大非的拨乱反正，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的否定。会议讨论中还认为，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也不可靠，但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要有一个过程。尽管三中全会还没能象四中全会那样，从几方面概括出“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错误，但是只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才能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在思想上是明确的。

三中全会还对党内生活中因五七年以后的严重左倾错误而积累的许多问题，尽可能做了纠正和解决。其中纠正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和对彭德怀同志问题的平反，是个很大的，带有路线性的拨乱反正。

三中全会不但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是非，而且深入到五八年下半年到六〇年这一段，加深对它的全局性左倾错误的认识，就促使党的政治路线更为彻底地转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

我们说，到了三中全会才使党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转到正确轨道，还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限于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党内某些同志总想循着过去的错误路线走的干扰，因而对于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犯的“左”倾路线错误，未能深刻认识和加以纠正。一九七七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就其部署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重新确定“四化”的基本目标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会议通过的文件，在路线上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仍旧作为基本内容，甚至还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变化。由于有了前两年拨乱反正的基础，人们对过去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入了。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党和人民痛定思痛，严肃地思考一些问题。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竟能篡夺这样的高位，横行无忌，造成国家的莫大灾难呢？党和毛泽东同志有什么重大失误被他们利用了呢？这种冷静的思考和总结，推动人们对过去的理论和路线重新进行审查。三中全会在热烈而充分的民主气氛下，找到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和“左”倾路线错误，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被颠倒了的大是大非，还解决了近二十年积累的问题，因而能够重新明确地确立党的正确政治路线。

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政治路线，在拨乱反正方面有以下几个特点：

(1) 纠正了延续多年的“左”的形势分析，重新肯定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全党的工作重点必须及时地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2) 重申了党的“十一大”已经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今后长期的中心任务，除非有大规模外敌入侵，绝不能干扰这个中心任务，并且取消了十一大还沿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等错误提法。同时，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本身就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那种认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是革命的观点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3) 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把这些思想概括到党的政治内容中去。

(4) 三中全会还强调了民主化和繁荣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包孕了后来提出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初步思想。

当然，三中全会还只是从根本上使党的政治路线转上正确的轨道，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完善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才逐步完成的。可是三中全会实现政治路线上的根本转变，不是个简单的事。要使全党全国人民从多年来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转到今后主要讲经济建设，讲“四化”，讲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这种主攻方向的转变，不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变，也是人们头脑中的重要思想转变。

(二) 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三中全会把党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转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也需要把党的思想路线转到正确轨道，因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三中全会正是这样做的。

“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只有党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立场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全会批判了汪东兴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论调，指出“现在还有不少同志不敢大胆地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状态是在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把人们思想禁锢在他们反马克思主义圈子里的一定条件下形成的。

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把思想路线能否正确解决，提到党和国家存亡的高度。

三中全会的上述决定和论断，标志着党的思想路线已经从根本上转到正确轨道。为

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全会纠正了党在过去工作中背离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错误，彻底否定了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现代迷信”。

如前所说，我们党自建国以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遭受过两次严重的挫折，这是同党的思想路线的曲折分不开的。从新中国成立到三大改造的胜利年月，党基本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谦虚谨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但是，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没能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三大改造后期，主观主义成分就多了，至于一九五八年到六〇年那次左倾路线错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路线错误，其思想根源则是背离了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一九五八年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主观制造敌情，根本脱离了我党的基本实际。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十年动乱，则由于党、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主观主义的形势估计，空前严重地制造和夸大敌情，并形成了一套主观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恶果。三中全会勇敢地清理过去这些错误，实事求是地为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平反，为一九七五年因努力恢复党的正确路线而遭到诬陷的邓小平同志恢复名誉，就是对过去那些错误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否定。

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发生的这种思想路线上的错误，后来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所利用，推到极端，制造了一种“现代迷信”。别有用心地把毛泽东同志做的每一件事，在文件上划的每一个圈，所说的每一句话，写在纸上的每一个提法，都当作最终的绝对真理，而不受实践结果的检验，成了新的“教义”。说什么不论符合不符合客观实际，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他们那里，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他们用这一手，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作为进行阴险无比的罪恶活动的保护伞。我们确实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人物，在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下，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他决不是至高无上的天神，他也会犯错误。他说和做得对的，我们就坚持；不对的，我们就改正。毛泽东同志对林彪讲的“四个伟大”也感到讨厌，说明老人家有时对他们搞的这一套也反感。把领袖神化，在有近十亿人口的中国，造成只有一个人动脑筋，其他人都听命的局面，这是很危险的。这种“新经学”，严重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活力。这种思想僵化的状态，不但使我们的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许多事物丧失了识别能力，而且使我们的许多人对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长期肆虐也丧失了判断能力和斗争能力，这是他们得以长期横行而不能及时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中全会总结历史上这一沉痛教训，在保护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的前提下，深刻揭露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现代迷信”的阴谋，批判了他们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给全党恢复毛泽东所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以新的活力。这是恢复正确思想路线的一个方面，批判了林彪等人制造的“现代迷信”。

第二、全会批判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度流毒甚广的“两个凡是”的谬论，指

出“凡是”论实质上是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继续，从而否定了“两个凡是”，从根本上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兴高采烈地认为，造成我们国家许多灾难的祸根已经拔掉了，各方面的工作按道理应该发展的很顺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要想贯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决策，都会遇到阻力。当时，一般干部和群众比较关心的有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邓小平同志能不能出来工作？二是天安门事件的性质究竟应当怎样估计？三是这些年来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确实搞了一大批错案，这些冤假错案能不能平反？（现在才知道牵连一亿人口）一般人的想法，这些问题是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然而，实际上解决起来却相当困难。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些重大是非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的斗争。正值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大力进行拨乱反正的年月，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说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是李鑫同志组织起草的，汪东兴同志审定并批准发两报一刊社论。六日广播，七日见报。社论发表以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许多同志说，坚持“两个凡是”，直接目的就是阻止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是阻止天安门事件平反。“两个凡是”与林彪的“顶峰论”是同一个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按既定方针办”。

四月十日，邓小平同志在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中说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五月三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小平同志的信，肯定了小平同志的提法。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王震同志和邓力群同志一道去见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曾来看过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主席讲，一个人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都改得乱七八糟呢？就是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小平同志接着又说：“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象主席这样。马恩没有说过两个‘凡是’，列斯没有说过两个‘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两个‘凡是’。我对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说，我提出的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同林彪做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思想体系看待。”

我们开始看到“准确的完整的”这个提法的时候，觉得很好，但不知道是针对“两个凡是”的。现在看来很清楚，正是小平同志这个提法，开始澄清“两个凡是”在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混乱。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而且毛主席有时情况不明，在连话都不能说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怎么能沿用不变？这场争论是汪东兴等人挑起来的。真正拥护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志，当然不能对他们挑起的争论置若罔闻。“准确的完整的”提法一出来，就给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提供了思想武器。这场争论越到后来，越在各方面展开，它的性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一九七七年七月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小平同志复职。华国锋、邓小平同志在会上都讲到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党的十一大文件和华国锋同志讲话，又重申了这一精神。小平同志原先准备在党的十一大作个发言，针对“两个凡是”讲讲党的作风问题，第一位的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凡是”所以错误，就在于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胡乔木同志按照小平同志讲的意思，起草了一个稿子。因为小平同志致闭幕词，这个稿子就作为聂荣臻同志的发言，后来整理成文章，登在《红旗》杂志上。

一九七七年九月《人民日报》发表陈云同志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的重要文章。陈云同志写道：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路线问题。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同时，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华国锋同志又一次讲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叶剑英同志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南京大学的胡福明同志。原稿经《光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修改后，又送中央党校的同志修改过。这篇文章竟受到汪东兴同志的责难。

在党中央和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已经采纳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提法，倡导实事求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形势下，汪东兴同志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并且在一个小组会上专门点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名，说“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在他的鼓动下，一些同志竟然以“砍旗”、“犯了方向错误”等帽子，围剿这篇观点正确的文章。

同年七月，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针锋相对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法是正确的。九月间，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视察工作，又一次阐述理论要同实际结合，批评一些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

在坚持实践标准和坚持“两个凡是”的彼此对立的观点多次较量之后，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恪守“两个凡是”论的同志们仍然挑起争论。他们说，在报刊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有意议论毛主席的错误，影响安定团结。争论一挑起，他们的错误观点就遭到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绝大多数同志的激烈批评。与会者认为，这几位同志代表一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潮，根本违背毛主席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只能按领袖的话去讲问题去办事，有些过时的甚至错误的东西也要沿用，那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华国锋同志说到：我在去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上，曾专门讲过“凡是毛主席作过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现在看来，

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这“两个凡是”的提法，虽然同《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说法不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应做自我批评。在会议的这种形势下，汪东兴同志在三中全会上才做了《我的初步检讨》。会议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胜利而告终。

这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胜利，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胜利。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时期，从封建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那一次思想解放，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延安整风，从把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更好结合，带来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到三中全会这次。这是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和汪东兴同志炮制的“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它必将促使我们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夺取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新胜利。

三中全会，不但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而且在指出任何一位领袖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对我党和我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这样，三中全会就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及其有关问题。

（三）规定了正确的计划方针，制订了解决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使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

三中全会规定的政治路线，其基本内容是同心同德搞“四化”，那么为了落实这个任务，就要扎扎实实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因而，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七九、一九八〇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尽快把农业搞上去的问题。

全会认为，制订经济规划应坚持既有雄心壮志，又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方针，不能单凭良好的愿望，急于求成。与会者说，提到会议上的工业方面的两年规划，方向是对头的，雄心壮志是好的。但是，在经济工作方面存在的矛盾暴露得不够，没有把问题揭露出来，实际存在的问题不解决，生产是搞不上去的。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呢？会议讨论的意见，可以概括成这么几条：第一是工业同农业的比例关系失调。第二是基本建设同工业生产、基本建设同发挥现有工业生产潜力这个比例关系也失调。第三是先行工业没有先行。工业上的粮食、煤、电、原料工业没能优先发展，不够吃；交通运输一直紧张。第四是管理体制上弊病很多。权力过于集中；用行政办法管理经济，以党代政，以政代企；机构臃肿，责任不明，办事踢皮球。

三中全会的功绩之一是及时发现了这一情况，提出必须立即解决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失调问题，同时要改革国民经济管理体制，克服上述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各部门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鉴于提到会议的两个经济规划安排不够理想，全会建议经国务院修改后，再提交七九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央下决心要在七九年夏天全面着手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正是在三中全会这一精神指引

下，七九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由被动到主动的转折点。

为了尽快地把农业搞上去，三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制定了两个农业文件。三中全会关于农业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来受到严重破坏。农业搞不上去，粮食不够吃，林牧副渔等得不到很好发展，半个现代化也实现不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过去农业的发展情况，指出了取得的成绩，同时承认近二十年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出现过两个马鞍形：一九五八年到六二年是一个马鞍形，“文化大革命”十年又是一个马鞍形。要讲真话，不是什么十三年连续大丰收、十五年连续大丰收。只有实事求是地揭露存在的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想方设法地把农业搞上去。会议提出把农业搞上去的二十五条措施，主要体现在《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文件强调头几年关键是纠正农业方面的“左”倾错误政策，全面落实党的正确农业政策，把国家、集体、个人这三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在经济上必须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提出了一系列当前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会议批判了过去的一些“左”倾错误提法和做法，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呀”，“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啦”，把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出路带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去堵，多种经营的路都堵死了，结果是大家穷得要死。会议认为，只有全面落实党的农业政策，把农村经济繁荣起来，才谈得上农业现代化。

会议制订的农业上的两个文件，打中了农村工作的要害，两个文件的贯彻，使农村普遍出现了繁荣景象。这就说明了农业文件的正确性。

（四）三中全会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就着手解决组织方面的问题。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把他们篡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权利重新夺回来，交给坚持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所信赖的同志手里，就是一次重要的解决。但是组织上还存在着“四人帮”横行时期遗留的很多问题。两条思想路线的争论，实际涉及到由执行什么路线的干部来掌握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因此，重要的干部职务调整是势在必行的，也是与会者和广大党员的强烈要求。

三中全会适应这种形势，为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决定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三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同志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这是解放以来所没有的措施。过去，七大以前有过，有采取这种措施的先例。全会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并选陈云同志为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同志为第二书记，胡耀邦同志为第三书记，黄克诚同志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同志为副书记，还选举了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

三中全会结束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解决组织问题的继续，政治局会议除了讨论

决定新增加同志的分工，还讨论了一系列的人事安排。第一，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确定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辞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确定胡乔木同志担任中央副秘书长兼毛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同志不再兼毛著编委会的职务了。确定中央第二位副秘书长是姚依林同志，他还兼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也就不再兼任办公厅主任了。确定宋任穷同志为中央组织部长，张平化同志调到中央党校当副校长，后又调任农委副主任，建议调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当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会议还确定冯文彬同志兼任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德中同志（原在周总理身边，是八三四一部队政委，后被“四人帮”排挤走了）调回中央当办公厅警卫局长兼中央警卫师师长、党委书记。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许多同志对中央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出了很多意见，政治局接受同志们的意见，才重新做了这些安排。汪东兴同志原来身兼九职：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办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办公室主任、“毛办”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一个人集中了这么多重要权力是很不合适的。这次把许多兼职减下来了。三中全会对汪东兴等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又犯了新的错误的同志，主要不是算多少年前的老帐，而是着眼于现在，既看到他们犯的严重错误，又看到他们曾经做过的有益工作，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没有采取过火斗争和过分处理的错误做法。这表明，三中全会在党内斗争上已经恢复了我党的正确传统。

总括以上四个方面，三中全会在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重要时刻，在政治上纠正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以后的工作中曾经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在经济上改正了急躁冒进，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在思想上扭转了唯心主义横行的局面，在组织上抛弃了“左”倾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从而根本上纠正了过去的“左”倾路线错误，使党的各项工作开始牢固地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次会议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是因为我党有历史上纠正“左”倾路线错误的经验，有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拨乱反正的政治、思想准备，而最主要的还是会议发扬了延安整风精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恢复和发展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从而依靠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正确地解决了新时期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与会的同志说：“这是延安整风以来开得最好的一次会议”，或说是“建国以来开得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重大历史意义？用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经过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纠正了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左”倾路线错误，同时也初步认识了58年到60年那段“左”倾路线错误，使党的路线回到正确轨道上来。这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想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经过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了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就信心百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三中全会理论意义在于，经过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和今年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恢复

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上,又大踏步前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根本谈不上毛泽东思想发展,那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遭到空前践踏和歪曲阶段,把毛泽东思想科学的基本观点搞得面貌全非。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年,其特点是拨乱反正,在理论上则是大力恢复被践踏了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并在新的实践中有所丰富和发展。这一段,我们党“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查;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上,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符合客观实际新论断、新决策”(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这种理论观点上的恢复和发展就我们经常接触到,可以归结这么几点:

一是在形势分析和对主要矛盾的论述上,恢复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个理论问题不可轻视,它是我们党提出任务,制定路线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近二十多年,我们的许多失误与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偏差有关系。

二是党的中心任务确定上,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明确了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并把它作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条件。

三是不但把四个现代化作为我们近几十年的基本目标,还把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作为基本目标,这对于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四是在思想路线上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头等地位,发挥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的基本思想,一扫近二十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唯心主义的流毒,打开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宝库。

五是在组织上实行集体接班否定个人接班,废除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在国际共运史上,没有先例;在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前提下,推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反映新形势下的需要,都有理论意义。

六是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重大改革。克服权力过分集中,根治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殊化等弊端;纠正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在基层,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等等。在中央,前几天廖盖隆同志讲到,党中央设立三个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全国人代会分成两个院“区域院”、“社会院”,都是改革中的新事物。社会主义民主的多样化形式,是防止和纠正错误、防止社会主义异化变质的一种很好的探索。这些都是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先声。它说明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的高度民主,不是一句空话。

理论上的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还有许多新内容。这里只有挂一漏万的提几点。

以上是讲三中全会的路线根本转变所带来的新发展,也是三中全会的意义。

三中全会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也会有不足。我看有两点:第一、对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新冒进,虽然看到了,但对其后果认识还不深刻,对造成新冒进的“左”的指导思

想批判不力。会后虽在79年5月明确地提出新八字方针，由于左的思潮批判不力，调整工作遇到的阻力很大，有时调整不下去。第二、三中全会实行路线和工作重点的根本转变，非常正确。但会内精神与会外宣传结合不够。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之后，没能象对待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样，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教育，因而影响到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政策的更好贯彻。后来采取的许多重大措施，如大力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臭老九”帽子，对57年错划的右派予以平反，对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摘掉其帽子等等，都是正确的。那是按照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因过去左倾错误而遗留的问题。可是，一些同志竟转不过弯来。由于长年流毒全党的“左”倾思潮……没有很好的清算，以致有些同志往往把中央提出的符合客观事实的方针、政策，看成是右了、“修”了，而把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一些过左的方针、政策，看成是“革命”的，影响这些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政策的积极贯彻。所谓思想僵化、半僵化，就是僵在近二十多年某些左的口号、方针、政策上，僵在客观实际已经向前发展，思想还停在旧的认识上，这些需要党的强大的宣传教育工作来解决的。三中全会在这一点是有缺陷的。

综合以上，三中全会在党史上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我们党史专业工作者，有义务研究和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让党的正确路线更能广泛深入地掌握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其变成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巨大的物质力量。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周文琪

(根据录音整理)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6日正式成立，到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为止，它存在二十四年零两个多月。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直到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国际的提议，并决定从1943年5月26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从1922年7月到1943年5月整整干了二十一年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正确与否，革命成功或挫折，是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分不开的。

在党史教学或研究中，根本不提共产国际问题，有许多问题就不好理解，就不能说明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确实十分重要。但这个问题也确实很大，加以资料和个人水平的局限，只能提供一些情况，作为共同探讨这一问题的参考。错误之处，请指正。

(一) 共产国际成立的一般概况

1. 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组织领导

1919年3月2日——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三十多个国家工人政党的代表。俄国共产党的代表有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契切林等。列宁宣布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共产党作了报告，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援助……，我们将继续认为，我们有义务支持每一个承认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人运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的工作委托执行委员会来办理，这个执行委员会由俄国、德国等七个国家的党选派一个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选出五个人组织政治局（执行局），他们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普拉廷、拉科夫斯基等（他们都是俄国人）。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共产国际就这样产生了。

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从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先后召开过七次代表大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有执行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主

席团会议来处理 and 解决共产国际的日常事务。执委会下面领导西欧党的是西欧局，领导中东、近东、远东各国党的是东方部，直接领导中国党的是东方部的远东局，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次克，因此又称伊尔库次克局（达林称为“远东书记处”）。

从国际成立到1926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全会期间，为时七、八年的共产国际主席是季诺维也夫；第七次全会决定取消共产国际主席改为政治书记处之后，第一个政治书记是布哈林，1929年7月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把布哈林开除之后，库西宁和曼努斯基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主要领导人；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则是季米特洛夫。

从共产国际“一大”起，每次大会都有中国代表或代表团参加。第一、二次代表大会都是在中共成立之前召开的，当时中俄交通还刚刚打开，共产国际还不能或来不及邀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出席大会，而由侨居在俄国的华工组织派人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

国际一大是1919年3月召开的，参加国际一大的中国代表是刘绍周和张永奎。刘绍周又名刘泽荣，是“华工联合会”的主席，张永奎是华工联合会莫斯科分会主席。“华工联合会”是十月革命后在旅俄华工中很有影响的组织，于1918年12月中旬在彼得格勒成立，联合了各地原有的旅俄华工组织，有四万——六万会员。在国际一大第四次会议上，刘绍周向大会读了祝词，并多次同列宁会见。

共产国际“二大”是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开幕，7月23日移至莫斯科举行，至8月7日结束。刘绍周、安恩学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所代表的组织是“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

所谓“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据苏共马列研究院档案材料记载，它“是俄共（布）外国部的组成部分。1920年7月1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它是侨居苏联的中国党员组织的唯一中央机构。”它“从一开始活动就同共产国际建立密切接触。1920年7月，组织局向共产国际执委提出要求准予派遣代表参加国际“二大”。共产国际执委满足了这一要求，于是两名中国党员、组织局的代表列席了大会。”

在国际“二大”第五次会议上，刘绍周作了关于中国情况的发言，并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

1921年6月22日——7月12日，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还有瞿秋白。他是1920年10月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的，1922年2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共）。张太雷同志在大会发言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对中国以至世界革命的严重危害，要求国际和各国支部对远东、对中国革命运动给予更大的注意和更多的援助。

参加国际“四大”（1922.11.5——12.5）的是陈独秀和刘仁静。刘仁静代表中共在大会上讲话，主要表明中共要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李大钊同志代表中共参加了国际“五大”（1924.6.17——7.8）并发了言。他在列举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量侵略罪行之后，指出党在民族革命斗争中按照国际“四大”所通过的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决定进行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参加国际“六大”（1928.8.17—9.1）的中共代表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等。1935年国际召开了“七大”，王明、康生和林育英等参加了大会。

此外，中共在国际有常驻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常驻国际代表是向忠发，从1928年国际“六大”到1931年8月，驻国际代表团由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黄平、余飞等组成。四中全会王明等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后，王明、康生就取代了瞿秋白等。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回国后，王稼祥、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曾担任过短时期的驻国际代表的工作。

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国际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比如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各国党要统一和协调行动，季诺维也夫在会上极力坚持要实行集中制、坚持把国际变成一个世界性的集中统一的党。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组织实际上成为它负责各个民族的处。这在共产国际建立初期就引起一些国家的党的不满，例如，1923年，国际执委第三次扩大全会上，斯堪的纳维亚几个国家的党就提出：共产国际执委所实行的是独断而不是民主集中制。挪威党的代表指出，国际执委既不充分了解真相，又不和挪威党中央磋商，就开除了一个挪威工会领袖，国际执委未经通知挪威党中央，就在《真理报》上发表一封给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特别是对挪威党的领袖公开进行攻击更为不满。为此，挪威和瑞典党提出，国际执委会只应处理和决定国际性问题，至于各个国家本身的问题，应由各国支部自行处理，但这一意见遭到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驳斥，认为这是要使共产国际带上“联盟主义”的色彩。

对于这种过分强调集中、统一，使共产国际内部这种“组织螺丝帽拧得过紧”的现象，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上曾提出过警告，他说：“在1921年，国际第三次大会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关于各国党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但列宁的这些话，并没有在国际的实践中得到纠正，它经常是以俄国的工作经验，机械地用来指导各国党的活动，并从组织纪律上强行要各国党贯彻执行，从而就不能不犯很大的错误。

另外，在共产国际范围内，俄国党实际上处于一种领导党的特殊地位，联共党内的问题往往可以不列入国际的议程，从而遭到一些党的反对。1926年召开的国际执委第六次全会上，曾几次讨论了俄国党在国际中的地位问题，但季诺维也夫说：“只要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成功，就必须保持历史经验最丰富的苏联共产党的影响”。

由于这些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不正常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共运的团结。

2、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

共产国际的反倾向斗争，大多是围绕苏联党内斗争而展开的，但它直接影响到各国革命的发展，这特别明显的反映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1924年列宁逝世后，托洛斯基纠集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反对联共党、反对斯大林，托派分子拉狄克，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和斯大林展开争论中，提出十九世纪以后的中国经济结构已经不是封建制度而

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由此出发，他反对斯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对封建的理论，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显然是托洛茨基在大革命的武汉时期主张中共立即退出国民党、打倒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的理论根据。为此斯大林曾亲自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和反封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27年5月召开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正是中国革命发生新的变化，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托、季联盟对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提出自己的反对提纲。当时和托、季联盟的斗争主要是反“左”，因而直接反映在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是更加强调联合，而忽视斗争。

1928年7月，国际“六大”前后，斯大林又开展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国际“六大”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第三时期，也就是所谓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苏联在国际间的地位就更为重要。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一直担心以日本、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因而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并要求把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例如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蒋介石怂恿张学良从苏联手中夺回全部铁路管理权，中苏断交。这时共产国际在给我党关于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中，要求我党号召群众“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同时还指示我党要显示军事威力，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

当时，布哈林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要严加戒备，但主张应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紧张局势，斯大林反对布哈林这种见解，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由于斯大林反对布哈林的右倾结果，使1929年中国刚刚结束瞿秋白“左”倾错误之后，又跟着反右，结果连续发生“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关系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以俄国革命的影响，在推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促进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形成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共产国际及其驻中国的代表马林等对中国革命还了解得不多，因此在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对国民党的认识方面，还是右倾的。讲三点：

1. 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维经斯基、马林等先后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1919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从思想上、理论上，同时也从组织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1920年6月5日，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在这篇报告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他的主要思想是：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民族和殖

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成亲密的联盟；②共产国际必须帮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未来的共产主义分子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政党的组织；③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④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但不能同他们“混为一体”，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⑤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的这些光辉思想，规定了共产主义者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因而极大地援助了中国革命。列宁为大会起草并通过的其他一些文件，还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的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为各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新型政党确立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共产国际、列宁的建党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

就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召开前不久，即1920年5月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中国。（维经斯基中国名吴廷康，十月革命前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1913年去美国并在美国加入社会党。十月革命以后，1918年春回到俄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加入了共产党。国内战争时，在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期间，他从事地下活动，参加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鄂木斯克起义。粉碎白匪军以后，他又从新回到海参威，那里的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被捕并被流放到萨哈林岛（库页岛）做苦役。推翻白匪政权后，1920年1月间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由于他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的经验和通晓英语，5月间他就被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中国。和他一道来的有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人员马迈耶夫等）。他到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会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到中国后，首先通过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威的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同志，然后经李大钊同志的介绍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他曾向陈独秀表示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的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能够很快的联合起来，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将予以支持。在此期间，他除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外，还会见过孙中山先生。

不久（大约1921年1—2月间），维经斯基就回俄国向国际报告他在中国初步活动的结果，嗣后他就被留在国际远东局任主任秘书，负责处理远东局的日常工作。

1921年6月间，荷兰人马林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到达上海，和他同时在上海的还有接替维经斯基的另一个国际代表（属伊尔库次克局）尼科尔斯基。马林原名斯尼弗莱特，他原是荷兰铁路工人，当过铁路工会的干部，入党后由荷共派到印尼做工人运动，并参加了印尼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是远东第一个马列主义组织，在此期间他又使印尼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参加到印尼的民族主义组织回教联盟中结成民族反帝统一战线，1920年他作为这个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被派在民族殖民地事务委员会任秘书（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列宁）参予制定国际民族殖民地政策，由于列宁的推荐，他成为国际驻中国的代表。

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后，和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一大”的李汉俊、李达、张国焘等人有所接触，并对如何制定党的纲领方面提出过意见，但他和他们的关系并不融

洽，“一大”召开的前期甚至没有请他参加会议，但后期还是请马林等参加了，就在他们参加会议的当天晚上，他们围坐在李汉俊家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法国巡捕房的密探突然闯了进来，但转身又走了。马林十分机警，建议会议马上停止，所有人马上离开，接着马林和尼科斯基首先走了，会议随后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这样，虽然马林参加了“一大”，但并没有能表达他的见解。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但由于共产国际的帮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因为当时都不知道是怎么搞，国际提出了按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来建党，这就有了榜样。但也有问题，从“一大”通过的党纲来看，是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夺取政权，主要是搞工会、工人运动，这都是照抄西方的，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任务以及具体道路等等还不清楚。

2.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920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列宁谈到了支持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问题。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列宁在谈到世界革命的前景时，又强调指出了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巨大意义。列宁当时说：“十分明显，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运动，最初是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转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大得多”。1922年1月，为了与帝国主义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共产国际又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这时中国党刚成立不久，这个大会对党制定具体纲领和建立统一战线策略思想方面起了巨大影响。

1921年10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通知，要中国、朝鲜和日本派代表参加在苏联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亲自去找孙中山的国民党进行联系，国民党决定派出一名代表（张秋白）参加这次大会。

1922年1月21日，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出席大会的除中国外，还有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其他远东国家的代表团，中国代表团有三十人左右，代表中既有中共代表，也有国民党代表，既有工、农代表，也有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如张国焘、柯庆施、王烬美、邓恩铭、邓培、张秋人、王乐平、于树德、王光辉、王丽魂、黄凌霜等都出席了大会。

大会是在列宁的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团，张国焘和产业工人的代表邓培以及国民党代表张秋白等参加了接见。列宁除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无限光明的前途外，着重地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列宁甚至还询问了国民党代表关于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

大会开了一个星期，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揭露了当时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所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罪恶，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当前最大的敌人，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大会着重地研究了中国问题。大会认为

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当前的革命任务就是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为了完成这一革命任务，大会号召建立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并明确的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大会的这些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说来是非常新鲜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刚刚成立，对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大家都知道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但怎样达到这一目标，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要经过哪些道路，很多人是不清楚的。1921年7月《共产党》月刊短言曾提出过要反对中国的政客军阀，但它是想把反帝和反封建结合在一起“毕其功于一役”，而且也不是把它们当作党的纲领提出来的。但经过这次会议的启发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解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经过民主革命的阶段。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就是要反对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一部分代表不久回到祖国把大会的成就报告中共中央。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7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这两个文件就是在这次大会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两个文件和中共第一个党纲相比较，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方面进了一步：

比如，《中共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联系到当时的形势，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当时喧嚣一时的“武力统一”，“联省自治”，“好人政府”等等各种反动政治主张，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多年来和军阀妥协的错误，明确指出：解决中国混乱政局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党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

《二大宣言》进一步根据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共产主义纲领和民主革命的纲领，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最彻底的革命纲领，这个纲领，有效地动员了广大人民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在《二大宣言》里还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和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相适应，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也给中共以巨大影响。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中共很多党员，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中的民主势力是估计不足的，甚至存在着讨厌情绪。但在这次会上，中共的代表和国民党的代表在一起开会，一起讨论有关民主革命的问题。在大会的影响下，192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中，具体地提出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

“中共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但这个文件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作用表达出来。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进一步强调了“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

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具体怎么办，二大决议案很含糊，共产国际也不可能具有具体指示。

3. 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促进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项战略决策。

共产国际从1921年6月第三次代表大会起，根据列宁的思想，不止一次地研究了制订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列宁在第三次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还阐述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巨大意义。1921年12月共产国际制订了统一战线提纲（十二月提纲）。22年2月，共产国际第一次扩大执委会进一步指出“十二月提纲”是正确的，但“在运用这种策略时，要和各个国家的条件相适应”。

具体到中国来说，共产国际曾经有过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的方针，但最后共产国际一项战略决策是要建立在苏联援助下的国共合作。因此，维经斯基在中国不仅促进建党，而且在1920年秋天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这是共产国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接触，孙中山询问了苏俄和布尔什维克革命问题，要求建立电台联系并希望得到军事援助。

1921年6月间，马林接替维经斯基来到中国。12月间，他带着翻译张太雷从上海到桂林和孙中山见面，“就承认和联合苏俄的可能性问题进行过三次长谈”，孙中山表示只有在他的北伐战争结束之后，他才能公开和俄国结盟。马林从桂林又到广州，正好遇上香港海员大罢工，他亲眼看到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所以他回到上海后，竭力主张共产党应当放弃对国民党的不介入态度，而是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当然，他也认为在活动中共产党不能放弃它的独立性。但马林的这个主张为党内多数人所反对，于是马林在1922年4月24日离开上海回苏联。

除马林外，苏共国际代表达林，根据苏俄政府与北洋军阀政府谈判的特派代表裴克思的指示，也在1922年4月下旬到广州和孙中山直接接触。他的任务是要“搞清孙中山的内外政策，孙中山对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他的近期计划和国民党作为一个积极因素在广州政府的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在达林和孙中山的谈判中，也谈到了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的情况下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当时这个主张就遭到张国焘等人的反对。

1922年8月间，马林从苏联再次回到上海的时候，正是中共“二大”闭幕后不久，他批评了“联合战线”的政纲。他说孙中山不会赞成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但他的意见，仍旧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提议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方式进一步具体实施“二大”规定的“联合战线”。就在西湖会议闭幕后不几天，孙中山因陈炯明的叛变从广州到达上海，他好像是失掉了一切，这时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等分别去拜访了他，孙中山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是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和列宁直接参加了的第二次大会不同。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研究了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些理论和战略问题，而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则讨论了东方各国已经积累的实际工作经验，因为在这以前，中国、印度、土耳其、波斯这些国家都已经建立了共产党。这为解决一系列策略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东方问题”提纲中写道：“如果西方各国在进入组织上积蓄力量的转变时期提出的是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口号的话，那么殖民主义的东方现在则必须提出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口号”。

纲领中提出要防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一个或几个心怀敌意的帝国主义大国相互勾结”的问题。

纲领中还指出，反帝革命只有同土地革命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胜利。这份文件强调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印度的、波斯的、埃及的）害怕土地革命口号，证明当地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和封建资产阶级地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些资本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有赖于后者的”。在中国嗣后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也完全证明了这些论断。

纲领虽然也考虑到反帝统一战线的社会成分很复杂，但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只是含混地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首先应当在整个反帝战线中赢得革命的独立地位”。

总之，共产国际当列宁在世时，并在他的参加下制定出了建立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纲领，这个纲领回答了很多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中国党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是陈独秀、刘仁静。刘仁静代表中共作了如下发言：“为了消灭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大前提，势须形成一个反帝的联合战线，因此本党（中共）决定与国民党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我们是以共产党员的名义并以个人资格参加党……”。

1923年1月，共产国际作出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只要国民党客观上进行着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同年5月，在给中国党的指示中，又特别强调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应力求工农联盟的实现”。“指出如要发展民族革命与建立反帝战线，就必须同时发展农民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只有能够吸引中国农民基本群众——小农——参加运动，这个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些指示，尽管有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估计不足，未明确提出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缺点，但它对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加强与国民党的合作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在这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众的党，以适应目前革命的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共中央决议，中共须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遂

行此决议。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决议”。

1923年9月，联共派鲍罗廷来华，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也有力地促进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改组会议，发表了改组宣言，并指定专人和鲍罗廷办理改组事宜，这样，全面改组国民党，正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条件，就日益接近成熟了。

以上，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从“赞助中国国民党”到“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统战政策的发展过程。

在这里应当肯定国际在建立国共合作方面的积极作用。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党的“一大”，“二大”。其间，党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在他指导或参加下制定的；但应当看到他的消极方面，这从1922年7月11日马林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工人阶级和对国民党的看法都是右倾的。

另外，当时香港海员大罢工已经发生，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却说“……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分化成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对国民党的看法是“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只看到国民党革命性的一面，没有看到它妥协性的一面。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头一句话就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共同的目标应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是只有民族革命，没有社会革命。

但1923年5月，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的指示则比较明确的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主力军的作用问题。

中共“四大”决议案中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它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三)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关系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存在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农民问题以及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的阶级分析等问题上是右倾的，对中国革命三个阶段的划分是错误的。讲两点：

1、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问题。斯大林指出，由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这是“共产国际（就是说联共中央也是如此）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整个路线的出发点。”但托洛茨基和拉狄克等则认为中国自秦汉以后土

地就可以自由买卖，加上十九世纪以后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不是什么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一开始就应该是反资产阶级。这显然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斯大林在1926年11月《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讲到，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极端软弱，“中国革命倡导者和领导者的作用，中国农民领袖的作用，必不可免地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手中。”

第三，关于土地革命问题。斯大林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斯大林热情赞颂当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千百万农民群众卷入伟大的土地革命的斗争，并且热烈支持农民在这些省份赶走地主“建立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的革命行动。但托洛茨基则认为封建残余在中国或者是简直没有或者是微乎其微，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在中国主要的事情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中国关税独立的革命，但争取关税独立的革命则是资产阶级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的纲领。

第四，关于和资产阶级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成立临时的联盟”这一思想，进一步指出在像埃及或中国这一类国家中，共产党人应当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到工人与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政策。这种联盟可以采取统一政党、工农政党的形式。所谓国共合作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改造国民党，发展工农革命分子，实行篡党的政策。

但托洛茨基把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认为中国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容许和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特别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第五，关于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斯大林明确指出：“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己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第六，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成立工农苏维埃，就是准备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准备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个政党即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办到。

第七，关于三·二〇“中山舰事件”的方针。斯大林当时就指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联共（布）中央指示，必须采取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的方针。

第八，关于“四·一二”前后对蒋介石的方针问题。1927年3月3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和武汉政府对立前，联共中央提出了三条方针：发展群众运动，武装工农，揭穿国民党右派。“四·一二”发生后，托派分子拉狄克等人主张立即占领上海，进行决战，斯大林坚决反对，认为在主客观力量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进行决战，是帮助了中国革命的敌人。这是正确的。

但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在阶级分析上

是右倾的。斯大林认为广州国民党政府“不但是革命的而且甚至是中国将来革命民主政府的榜样”，国民党的旗帜是“中国一切旗帜中最孚众望的。”在1926年3月，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国民党作为同情政党被接纳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国民党右派胡汉民代表国民党出席了会议，蒋介石还成了主席团的“名誉委员”。对汪精卫，一直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但汪精卫既不赞成没收地主的土地，对工农也有戒心。实际上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斯大林在他的文章中（1927年7月《时事问题简评》），把中国革命运动机械地死板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四·一二”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武汉时期，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转入了反革命阵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革命。”第三阶段，中国革命进入了苏维埃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就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了。这里，斯大林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统划出无产阶级同盟者之外，这是不正确的。

2、陈独秀和共产国际

陈独秀在回顾和总结大革命所以失败的问题上说，由于他“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了可耻的悲惨失败”。中国党“过去以至现在”“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的。”至于他个人，从国共合作问题到中山舰事件以至发表可耻的“汪陈宣言”，都是由于“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的结果。”

当然，如前所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错误分析和指导，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有影响。但这种把大革命失败的罪过，完全推到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一，陈独秀并没有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在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上，陈独秀从一开始就站在反对的立场上。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在给吴廷康（维经斯基）的信里，就公开反对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他提出六条反对理由，并且告诉维经斯基：“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这时，鲍罗廷不在广州），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的指示是必须采取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的方针。但陈独秀拒绝采纳，坚持退让政策。斯大林当时就指出，这是民族资产阶级想压制革命的第一次严重的企图。而陈独秀不仅不敢揭露事实真相，反而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是“我们应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甚至讲“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由于陈独秀坚持执行退让政策的结果，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使蒋介石达到了他打击和排斥共产党，完全控制第一军的目的。

当1926年下半年，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帝国主义、蒋介石加紧破坏活动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斯大林曾多次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比如1926年12月，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其基本内容除论及反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权外，特别强调农民问题，明确指出：“在现时革命发展过渡阶段上，土地问题开始获得了尖锐的形式，它是今日局面的中心问题，哪个阶级能够毅然处理这个基本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那么这个阶级就成了革命的领袖，在当前中国环境下，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急进的土地政策之唯一阶级，急进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胜利完成反帝斗争及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

从当时形势来说，北伐基本胜利了，革命再要前进，就是要深入土地革命。只有把几亿农民发动起来形成一个暴风骤雨的形势，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非常正确。但1926年12月，由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却否定了这个指示。他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文中，原则上同意国际的决议，但认为事实上无法执行，说当前的工作是纠正农运的“过火”行为，然后才能没收土地。

1927年，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条方针：发展群众运动，武装工农，揭穿国民党右派。但陈独秀却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一味妥协退让。为了迎合蒋介石的要求，竟自动禁止工人纠察队执行镇压反革命的任务，放弃了深入发动群众，来支持和巩固上海革命政权的任务。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汪陈联合宣言》，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欺骗和麻痹人民，解除了党和革命人民的精神武装。

1927年4、5月间，党的“五大”以后，为了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共产国际在5月召开的第八次执委全体会议上，专门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接着国际又发出了五月紧急指示。在这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意见中，反复建议中国党大力发展革命势力，深入发动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可靠的武装，改造武汉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领导权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这些指示和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陈独秀所把持的党中央却拒绝接受，甚至把国际的指示扣压下来不让党内许多同志知道。

第二，陈独秀抗拒国际、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正确指示，不是偶然的，是有他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指导的。这就是他只承认中国工人阶级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要分子”，而不是领导阶级；认为农民有参加革命的可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革命便失去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等等。

当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有它的发展过程的：

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具体讨论改组国民党和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陈独秀就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贬低无产阶级，认为在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应居于领导地位，无产阶级是附属的。主张把共产党完全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他的口号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

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仍旧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

在国民革命中只能“做一个督战者”。

当1926年7月12—18日党中央四届三中全会（扩大）召开前夕，陈独秀给蒋介石一封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果中共阴谋倒蒋“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在陈独秀这一思想指导下，他为会议起草的决议案，提出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方针、政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①关于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新右派的关系问题。陈独秀在《中央政治报告》中提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陈独秀认为“在估计革命运动之社会的力量中，并非要不要资产阶级参加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是否参加及是否参加到底的问题。”陈独秀断言：“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在《军事运动决议案》中，他把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新右派的军事武装看作民族革命的中坚力量，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权。

②关于农民运动和农民武装问题。在《农民运动决议案》中，规定农民协会组织“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而应包括中小地主在内。对地主阶级的策略，是用“全体农民联合”的口号，不可打倒大地主。在农村联合战线内，当地主与贫农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陈独秀反对农民革命武装，说农民“有了武装之后，很容易超出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竭力阻止农民掌握武装。他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

③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断言：“中国工农阶级要能实际领导这个革命，其最重要的条件，必须代表工农势力的本党成了群众的党，而且有很好的组织。”“而我们现在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之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并指责那些坚持由无产阶级领导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志是“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陈独秀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这时阶级斗争日趋尖锐，革命到了严重的历史时期，而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和政策继续发展。陈独秀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这次会议的一系列决议案，反映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

①关于革命政权和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事。”

在1926年12月，²³中央政治局与国际代表吴廷康，鲍罗廷联席会议通过的《政治问题决议案》中，再次重申：“应使左派由我们的援助获得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地位。”那种“以为我们党之独立，即是组织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我们直接领导之下，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抗，这样解释我们党之独立，必定走向和国民党脱离而危及整个的民主革命运动。”因此，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极其危险”的。陈独秀完全放弃了党对民主革

命的领导权。

②关于武装问题。陈独秀放弃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不去扩大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而是帮助唐生智等发展武装，对于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建立军事独裁，收编大量军阀军队，不断扩大他的反动武装力量，不但不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反而一再退让，并提出以“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平衡”的办法，来延缓蒋介石的反动。

③关于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与蒋介石关系问题。陈独秀认为国民党问题，其要点“乃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而目前联合战线中发生严重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认为，之所以造成国民党蒋介石右倾，是因为“湘鄂工农运动之突起，即因恐怖而表现右倾”；同时，是因为“我们党中的左稚病”，“包办国民党”“包办农民运动。”因此“必须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要求“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防止我们过于向左”。

④关于工农运动问题。陈独秀认为工人运动的“左倾”，已使联合战线破裂的可能性异常严重。关于农民运动，陈独秀断言：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他们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目前的迫切要求是“减租减息”和“反抗苛捐杂税”等等。

1927年4月27日，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独秀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辩护。他仍然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关于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他认为是错误的，是“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关于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说“虽然我感觉到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策略太右了，可是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也是太革命了的，我们在相当时期内，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

总之，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时已经形成。这是他的“二次革命论”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所决定的了。

另外，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他们的思想作风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也有很大关系。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是维经斯基，他到中国和陈独秀会面后只是要求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发起组，并和这个组织建立联系，大约在1921年春他就回国了。

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第二个代表马林，对陈独秀的思想是有影响的，如前所述，他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认为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农民群众对革命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对当时的国民党他则认为比共产党更能联系工农群众。

1923年11月维经斯基接替马林作为国际代表第二次来到中国。他在上海设立了工作机构，对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党中央起重要的指导作用。1924年12月，他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响导》周报上发表《国民会议、军阀和帝国主义》一文，宣传了列宁的民族殖

民地革命的理论，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孙中山北上后在对日本问题上的某些错误思想进行公开的批评。但几乎与此同时，他积极支持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提出所谓“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1925年12月（国民党二大前夕），陈独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孙科、叶楚傖、邵元冲等商谈所谓国共关系问题，陈独秀反复表白共产党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为此和国民党右派还达成了七点协议。陈独秀和国民党右派的这次商谈，是得到维经斯基的支持的。但特别严重的是1927年2、3月间，当我们打下武汉以武汉为中心来对抗在南倡的蒋介石时，维经斯基竟跑到南昌想同蒋介石妥协，寻求蒋介石的谅解。鲍罗廷斥责维经斯基的这一行动是扮演了十月革命时加米涅夫、李维诺夫那种工贱的角色，不但动摇了当时的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而且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

1923年后，对中国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影响较大的要算是鲍罗廷和罗易了。

鲍罗廷是1923年9月到中国的。他先到北京，通过加拉罕（苏联驻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的介绍，然后经由上海到达广州，10月25日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政治顾问。

鲍罗廷到中国后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从联共内部来说，他是“中国南部苏联军事政治工作团”的总负责人，公开的身份则是“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总顾问”，指挥俄国所有军事和政治工作的顾问人员。他既不受加拉罕的管辖，也不受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指挥，他是直接受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政府的领导。这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重要的关系。从国民党方面来看，他不仅是政府和军事顾问，而且是党的顾问，不仅是技术的顾问而且是决策的顾问。总之，鲍罗廷作为国民党的总顾问，对国民党的党政军都可过问，当时国民党右派邹鲁到处叫嚷说：“党权不在最高党部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的国民政府，而完全集中于政治委员会（按：相当于联共和中共的中央政治局），于是俄人鲍罗廷就拿政委会顾问资格在里面肆行操纵，顺我者生，逆我者死。”

由于鲍罗廷的权势很大，当时广州东山的“鲍公馆”俨然是个小政府；另外，鲍罗廷对陈延年等同志领导的广东区委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对鲍罗廷在大革命时期的功过也应具体分析。1926年前，鲍罗廷参加了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国民党章程是鲍罗廷起草的。另外，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政治制度的拟定都和鲍罗廷直接或间接从物质和技术上的帮助有关。他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中坚持斗争，坚持镇压商团的叛变，在此期间，他“赞成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1926年7月，他在黄埔军校题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讲演中，认为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是好的，但要解决土地问题。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鲍罗廷贯彻斯大林、共产国际的思想有很大关系。1926年9—10月间，这时蒋介石包揽军权、政权和党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鲍罗廷和广东区委的策划下，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重要决议案。这些决议案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右派猖狂进攻的。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召开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蒋

介石从南昌到武汉，鲍罗廷在会上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蒋介石回到南昌后，立即给党政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顾问的职务。3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三中全会，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鲍罗廷批评了蒋介石，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剥夺了蒋介石所窃取的中央执委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只是没有解除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

但鲍罗廷也犯了一系列右倾错误。特别在大革命后期完全和陈独秀滚到一起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时，鲍罗廷不在广州，4月29日鲍回到广州后不久，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党务整理案”，这是蒋介石继“中山舰事件”之后对我党发动的又一次进攻。尽管斯大林指示必须采取和国民党右派坚决斗争并且把他们开除出国民党的方针，但鲍罗廷却不作公开斗争，而是采取容忍的政策，甚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召开前向蒋介石表白我党始终维护国共合作，决不作公开反对的举动。嗣后，许多同志建议，把俄国接济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军火交给农民而不交给蒋介石，但鲍罗廷认为，这样做只会再度引起蒋介石的猜疑，并且答应蒋介石支持他筹划的北伐来换取国共继续合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有的同志主张把北伐的主力号称“铁军”的第四军调到南京去，以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活动，但鲍罗廷等人提出反对意见，理由有两个：第一，认为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这是对帝国主义干涉后果估计过高的右倾恐帝思想。第二，认为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如果我们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介石一定要扣留汪精卫，不让他来武汉。这是对汪精卫继续存幻想。结果调第四军去南京的计划就被搁置起来。如果当时调第四军去南京的话，长江下游左右派力量的对比便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

1927年5月党的“五大”，在土地问题上决定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这时鲍罗廷一反过去态度，认为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主张纠正农民运动过激行动。他甚至完全违背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原则精神，说什么“农民运动只要能做到减租减息，乡村自治等便是我们的胜利，便是土地革命”，“党……应发表宣言，号召群众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公布之一切取缔农民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针对当时形势，国际在5月发出紧急指示，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运动；加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左派力量；动员党员和工农群众，武装二万党员，编练五万工农群众；组织革命军事法庭，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唯一方法，但鲍罗廷回电莫斯科，说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

6月下旬，即蒋介石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联合反共之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廷竟完全违背国际指示，提议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向蒋介石自动缴械。

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已经通过解除鲍罗廷顾问的职务。7月下旬，鲍罗廷由庐山回到武汉，经由西北调回莫斯科。

总之，大革命后期的鲍罗廷，毛泽东同志认为是“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

大责任”的人物，“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他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

1927年4月间，罗易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到达武汉。罗易是印度人，1919年在墨西哥创建共产党，在那里他认识了共产国际派到北美的第一个代表鲍罗廷。1920年他以墨共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成员。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担任过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并且是共产国际设在塔什干的中央亚细亚局的三个负责人之一。

1926年11月—12月，国际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罗易参加了这次全会，并由他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提纲。全会除批驳了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应该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外，还着重指出中国共产党过去对农民重视不够；它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竭尽全力为实行土地改革而进行斗争。扩大执委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那些认为农民运动将危害统一战线的人代表了右派的想法，而在国际东方部工作的米夫和其他一些人代表了“左”派的观点，他们要求立即成立农民苏维埃。

斯大林在11月30日对扩大执委会所作的长篇演说中，批评了米夫“农民苏维埃”的口号，他指出：“不能避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可是，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他建议成立由农民选举出来的农民委员会，来制定农民的基本要求，这种农民委员会应当成为展开农村革命的核心。他特别批评了那些认为农民卷入革命就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的观点是大错特错，指出：“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和愈强大”。在全会召开前，斯大林曾于1926年10月发出一份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当加强土地运动”。1927年8月，斯大林承认那个电报是错误的，而罗易自称当时是他说服了斯大林改变了他的观点。

第七次扩大全会以后，罗易被派率领一个新的代表团到中国，根据国际新的路线来组织行动，这次全会事先已把罗易选进共产国际主席团，并选他为中国委员会委员。

但罗易到武汉后，和鲍罗廷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中心是加深革命还是扩大革命的问题。鲍罗廷认为共产党应支持国民党左派提出要发动的第二次北伐战争，而把土地革命推迟到夺取北平以后再行。罗易则反对北伐，在他看来土地革命是斗争的强大动力，他认为：“中国革命要么通过土地革命取得胜利，要么就根本不能胜利。”所以他建议：第一，推行土地革命；第二，建立农民政权；第三，建立一支不受拥有土地的军官们摆布的革命军队来巩固革命力量。罗易的这些原则是对的，但他只有原则却没有办法。

1927年5月间，召开了党的“五大”。关于土地问题，大会接受了罗易的观点，决定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事实上“五大”以后不但没有付诸行动，相反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不久，武汉发生夏斗寅叛变，长沙发生“马日事变”，罗易等不但没有把中心问题放在镇压反革命上，以暴动对付暴动，而是认为中心问题是和国民党左派搞好关系；特别是郑州被北伐军攻克后，他还想拉住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扩大左派的武装。恰在这时，国际“五月指示”来到中国，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

的指示打给罗易和鲍罗廷的（主要内容详前鲍罗廷部分）。对于这样一个国际的密电，中了“汪毒”的罗易，不和任何人商议，不经过组织，竟拿去给汪精卫看，并且依照汪精卫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罗易这个叛逆行动，汪精卫有很生动的描述，他说：“6月1日，苏俄代表罗易忽然约兄弟去谈话，说‘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鲍罗廷给你看没有呢？’我说‘没有’，他说‘我可以给你看’。他于是把那决议案给我，一是俄文的，一是中文的。中文的是他们自己翻译出来，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兄弟说，‘可以给我吗’？他当时有点迟疑，最后才说，‘今天晚上送给你，因为要修改几个字’。晚上果然送来”。

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当然谢天谢地，谢谢罗易，“从6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案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决议，努力奉行。”

在罗易这个严重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罗易，鲍罗廷也急电国际，不久罗易就被调回莫斯科。

罗易回欧洲后，1929年底因他和德国布兰德勒集团的关系被开除出共产国际。1930年底回到印度，嗣后并加入印度国大党，晚年大肆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对抗共产主义运动。

总之，大革命时期的罗易，毛泽东同志有过这样的描述：“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客观地说来，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他们当时的右倾观点都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客观原因。

（四）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关系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错误的，特别是从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路线实质上就是国际路线。

但这个时期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这一段，共产国际一些决定和观点，在有些问题上是正确的，1930年纠正立三路线也是正确的，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季米特洛夫主持工作这一段也是好的。讲四点：

1、从“八七”会议到中共“六大”

1927年7月23日，继鲍罗廷之后，共产国际新派的代表罗明纳兹到达武汉。在他未到之前，共产国际就曾给中共中央一个“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错误，要求中国共产党召开紧急会议加以揭发，并改组中央。罗明纳兹来到后，在他直接领导下，决定7月28日召集党的紧急会议以审查党的路线和政策，但由于时间紧张，交通困难，

北方和上海、广东等地的代表根本来不及通知，也不能到会，因此直到8月7日才举行。

参加“八七”会议的国际代表，除罗明纳兹（29岁）外，还有另外两个俄国人，一是牛曼（26岁），一是洛蜀莫娃。

罗明纳兹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首先，他说，从4月到7月党的领导机关都是照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去决定它的策略，它不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既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也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国民党的让步，甚至失掉了党的独立性。第二，他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工农运动的策略也是可耻的，步步退让，一切退让，一直让到党不能公开存在。第三，在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罗明纳兹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夺取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把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都赶出去。这个任务在国民党下层的同志们都实现了，但中央的策略却不能实现这一任务，而是把我们独立的政策和批评国民党的自由都取消了。

罗明纳兹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这些批判，以及在他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斯大林的指示，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

但罗明纳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是四个阶级的联合，武汉时是三个阶级的联合，南昌暴动时只有工农这两个阶级，中间不经过任何停留，不经过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八七”会议后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就接受了这种观点，形成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另外，在组织上，罗明纳兹等过分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且剥夺了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的权利。在反对陈独秀的斗争方面太着重了个人责任。十一月扩大会议，处罚了一批人，罗明纳兹为了处罚领导暴动失败的同志，提出了所谓“政治纪律”的问题。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是失败了，解除了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处罚的还有其他人，如谭平山被开除出党。领导南昌暴动的一批同志如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 etc 同志也受了处分。罗明纳兹的这些错误作法，在组织上开创了惩办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

1928年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次大会是在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和斯大林的影响有直接关系：首先是1928年2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看过的，它成为“六大”的基本根据，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决议指出：“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革命无论从经济上看（土地革命和消灭封建关系），或是从反帝民族斗争来看（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或是从政权的阶级性质来看（工人和农民专政），都还没有完成。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样地，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看法（这是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同时把革命看作是‘不断革命’的这样一种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1905年所犯的 error 相似。这种错误的危害性尤其表现在：对问题的这种提法便把中国革命的最大一个民族特点，也就是半殖民

地革命这个特点一笔勾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它既批判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观点，也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

又如，关于中国革命形势问题，决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低潮，不是高潮，而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说当时中国“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了”，“目前还没有出现全国范围的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然而有许多征兆表明，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高潮。”这种认为中国革命是低潮，不是高潮，但新的革命高潮肯定会到来的观点是正确的，既批判了不承认是低潮的“左”的观点，也批判了看不到新高潮会到来的悲观失望的右的思想。

再如，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问题，决议指出：“在中国各个省份内，由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斗争条件不同，因而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到目前为止，这个运动在城乡之间也是不平衡的。”这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也是正确的。

除此之外，斯大林在中共“六大”前夕和“六大”几个负责人谈话，更具体解决了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当时临时中央一些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到莫斯科后，对革命性质、形势等问题争论不清，找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谈话，没有解决问题，又找斯大林，斯大林和他们谈了十四个小时，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革命性质，二是高潮与低潮。关于什么是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由什么来决定的，这在当时都是问题。许多人认为革命性质是由革命动力而不是由革命任务来决定的，而斯大林明确指出，动力不能决定任务，不能把动力和任务混同起来，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二月革命为例，大家才懂了。关于形势问题，斯大林指出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李立三认为还是高潮，因为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象教小学生一样，用红铅笔在纸上划一下说：“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这些都是正确的。

但“六大”也有缺点和错误，这就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于争取中间阶级，这和共产国际直接有关。另外，布哈林在“六大”作了题为《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的报告，他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它又说中国民主革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实现的，这又是不对的，它又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上是矛盾的，是混乱的。

另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与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比如对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上，布哈林就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都吃掉，老百姓会不满意。并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甚至要调朱、毛离开红军，以免损失等等。但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六大’路线正确的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列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的恢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起草的，布哈林、米夫都修改过。当时布哈林是国际书记，

米夫是国际东方部长，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参加会议，但米夫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甚至以国际的名义来发号施令，他在会上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和不相信的影响，他在“六大”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上说：“中国党负责人理论很弱，现在有些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他们当时都是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在大会担任翻译工作），当然“六大”并没有选举他们。但1929年4月以后，王明等人陆续回国：在米夫支持下通过1931年四中全会上台，开始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这在后面再讲。

2、共产国际“六大”和立三路线

1928年7月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是标志共产国际、联共急剧向左转的一次会议。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布哈林。斯大林虽没有出席大会，但他是大会的灵魂。

1928年间，苏联国内形势是斯大林和托、季联盟的尖锐冲突还没有结束，联共党内反右倾的斗争又开始了。这一斗争开始时集中在对待富农问题上，布哈林、李可夫等被斥责为右派分子。尽管如此，布哈林还是代表联共一致的意见向大会宣称：世界革命已经进入第三时期（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认为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来愈激烈，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面前，主要是反右倾。

到1929年4月，斯大林召开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对布哈林、李可夫、托洛斯基集团进行批判，并撤销了他们在共产国际、《真理报》和全苏工会中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联共党内的右倾》的长篇演说，进一步指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动摇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高潮的因素的增长，论证了加紧反对各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必要性，特别着重指出了右倾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危险。斯大林的这些论点和共产国际“六大”所谓第三时期新形势的分析，反映到共产国际对各国革命的指导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比如当时联共正在加紧对富农的进攻，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也应推行反富农的政策，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强调了反对富农，认为中共“六大”决议中“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彻底的条文”，说：“这种公式就已经造成错误策略的基础”，“当前要进行坚决无畏的斗争去反对任何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还说要“象反对地主一样反对富农，也不管是半地主的富农，还是自己经营农业的那种富农。”“甚至这类富农参加抗税运动或反军阀运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向富农让步……”。

1930年6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潮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8月决议中说：“革命职工运动处在高潮上”，“准备总罢工问题，也迫切起来了。”

李立三同志在共产国际上述指示下，在国际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下，不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就照猫画虎地大干起来。他先是将蔡和森同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和森同志的右倾为理由送他到莫斯科，他的这个行动得到共产国际的默认，这就更加助长了立三的盲动气焰（实际上蔡和森同志对立三路线主张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这是正确的）。接着国际又要他加紧反对富农。当陈独秀公开表示拥

护托派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之后，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莫斯科立即批准了这个开除的决议，并表扬李立三这种维护国际的作法，于是李立三就更加毫无顾忌起来。

另外，国内革命形势也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1930年初，苏区和红军都有很大发展，7月间又发生了蒋、冯、阎大战，彭德怀同志所率领的红三军又攻下了长沙，这些事就更加使李立三认为革命成功已经为期不远了。1930年8月间，立三路线制定一个全盘的革命计划，命令各地红军，再次进攻长沙，并乘势夺取南昌等大城市，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

立三路线的这个计划遭到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两个代表爱维尔特和赫克尔特（他们都是德国人）的反对（李立三一直认为他们是右倾调和派）。李立三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只能是本着国际主义的精神配合中国革命的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就要坚决反对。这样立三路线就发展到了顶峰。

由于立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1930年8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决定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纠正立三的错误。9月下旬，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对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决定了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这次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指出立三是路线错误，对立三的错误表现了调和和妥协。

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讨，随后调去莫斯科。

10月间，共产国际来信，指出立三是路线错误，是反对共产国际的，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收到来信，经过讨论之后，于11月25日通过了《补充决议》，发出了“为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告同志书”，12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决议和告同志书都指出了李立三的路线错误和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12月22日，中央又发出第96号通告，号召全党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

总起来看，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下，党的“八七”会议，“六大”到六届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都程度不同的起过积极作用，这是历史事实，但它们又都有共同的缺点和错误：

第一，对于需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这个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没有正确认识，都犯了“城市中心论”的错误。

第二，对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里的中间阶级的作用，缺乏正确的估计和科学分析，不能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往往强调他们的一致性，把他们混同起来。

第三，对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帝国主义之间，新旧军阀之间，地主阶级，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缺乏正确的认识，只讲他们的一致性，在策略上强调打倒一切，不善于利用敌人矛盾。

第四，在对形势的估计上，往往强调对敌不利的一面，夸大对革命发展有利的一面。

第五，对党内浓厚存在的“左”倾思想、政策都没有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清算和纠正，明明是“左”了，还老是在那里反右，一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始终把它当成“党内主要危险”。

由于这些缺点、错误，以及共产国际提出所谓“第三时期”的理论作为确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从而虽然共产国际纠正了立三路线，但不久一个比立三更“左”，更有“理论”，气焰更盛的新的“左”倾路线——王明路线又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

3、王明路线实质上就是国际路线

王明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1925年10月）。中山大学校长先是托派分子拉狄克，后是米夫。王明在中大学习期间，善于钻营，很得米夫器重。“六大”时，斯大林出席指导，布哈林代表国际作报告，米夫参加了大会的实际工作，王明当翻译。

如前所述，“六大”前夕，临时中央一些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到莫斯科后，对革命性质、革命形势等问题争论不清，斯大林曾同中国同志谈了十四个小时，当时王明当翻译，他认为党中央领导人连这些问题都不懂，在一边窃笑，自以为了不起。后来，王明等在中大进一步搞宗派活动，除了他们“二十八个半”以外，还有一些人，米夫选了几个他认为最好的（如秦邦宪、张闻天、何子述等）进“红色教授学院”，准备培养成为高级领导人。米夫的这种作法，是苏联共产党里自奉为“老子党”的人，干涉别国内政，夺取这个国家党的领导权的极其恶劣的大国主义作法的表现。

王明集团在米夫支持下首先在莫斯科反对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团有瞿秋白、王若飞、陆定一、蔡和森、邓中夏、张国焘等），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等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

接着，国际派王明集团回国夺取党的领导权。1929年4月，王明这些人陆续回国，回国后继续搞宗派活动。1930年7月，在中央工作人员讨论6月11日通过的“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时，王明等人发表一些不同意见，向中发、李立三指责他们是反中央、反党路线以及宗派活动，决定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但是这些处分并没有起作用，而且，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判了立三路线，这无疑对他们是一个支持。共产国际在1930年8月间派瞿秋白、周恩来等同志回国以清除立三路线。但由于三中全会没能彻底批判立三路线，这就更加快了王明等反对力量的形成。王明、博古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要求党内公布立三路线错误实质以教育全党，并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处分。11月间，共产国际又派米夫为代表到达上海。米夫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王明等宗派小集团弄进中央以改组中央，由此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布尔什维克化”运动，换句话说，它的使命就是要把中国党置于联共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样，米夫来了以后，他们就闹得更凶了，

而他们的“勇敢行为”却受到了米夫无保留的赞扬：“反对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开始了。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王明）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的身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陈绍禹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和陈原道一起两面作战，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正确路线得到了承认。”

米夫所赞扬的“党的最优秀的力量”就是指的王明等宗派小集团。

当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妥协政策的斗争在党内达到高潮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长达七千字的信（“十月来信”），信中重申立三路线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不相符合的。193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这封信。这封信基本上否定了三中全会作出的说立三路线只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的决定，从而加强了王明等在党内的政治地位。11月2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仅接受了国际的指示，而且还通过决议，撤销了对陈绍禹、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等的处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十月来信”到达时，周恩来等中央同志还都不知道，而米夫却先拿给王明看了，于是王明等人把这个秘密通过小道传出去，造成李立三反对国际和六届三中全会包庇李立三的舆论。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旗号，加紧了宗派活动和进行夺权的阴谋活动。

从1930年11月开始，王明用了半个月的时问，写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他们小宗派中传阅、修改、补充，提出了一条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概括来说就是：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农、贫农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是带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民主革命。对王明这本小册子，少奇同志作了这样的论断：“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材料不少。然而它使我们能从这些材料中窥见四中全会及其前后党内斗争的黑幕，使我们对于党内斗争这段历史有完全新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这本材料将党内这段历史重新写过，并作出结论说：王明这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任何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王明小册子出来后，他们到处活动，要求中央开会，改选领导。米夫根据国际决定，秘密准备召开四中全会，并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不用周恩来等同志起草的决议）。

1931年1月7日，召开了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并非中央委员，米夫却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的资格指定他们参加，不但有发言权、表决权，而且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米夫在会上报告，强调王明等人是“坚决站在国际路线上反对立三路线的”，“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并说“改造党的指导机关，主要是完成国际和党的纪律”，强调“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中来，并且重新宣布政治局的成分，以保证党的正确领导。”并把这些规定写进四中全会决议。

在米夫等支持操纵下，四中全会选出了以向忠发为总书记的临时中央，王明集团的

几个首要人物是政治局委员，向忠发不过是个傀儡。从此开始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两天就被蒋介石枪决，王明被选为中央总书记。31年9月，王明去苏联后，不久就由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书记。

综上，可以看出，王明等人上台，主要是靠宗派活动，是共产国际选苗扞秧的结果。而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党，使它成为一个绝对忠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党。四中全会后，米夫赞扬四中全会取得的成绩说：“由于1930年9月举行的三中全会的妥协立场，全会未能把党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只是在1931年1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第4次扩大会议上，党的政治路线才得到了纠正。四中全会选举了新的领导班子，揭露了立三路线反列宁主义的特征，击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把失败主义的退却纲领强加于党的企图。以上这些使四中全会在党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中全会不但受到米夫的赞扬，甚至还受到共产国际的赞扬，说它“使中共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的转变。”并批准了改选政治局。这就是说，第一，批准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二，同时批准了王明的宗派主义组织路线。

为什么说王明路线就是国际路线呢？

王明等人写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纲领。小册子前面，王明首先声明“是根据当时发表的国际几种决议材料写的”。博古在“七大”的检讨中说：“许多问题书上没有就抄国际决议，王明说因此可以不负责任。”可以看出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实际上，王明路线的几个主要问题都是来自共产国际。

第一，在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问题上，国际一直把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党任务的决议案中在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劳动政策等一些方面规定了一系列过左政策。

第二，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因为国际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特别是不了解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俄国革命是从城市开始的，共产国际始终是以城市中心的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要求红军占领中心城市，提出“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军，以便在将来去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1930年下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要求在非苏区“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的铁围来包围当时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还提出“到处动摇国民党的政权，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

王明对国际的这些训令、指示，照搬、照抄、照套，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于31年9月作出了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

他们对红军的看法是：“现在苏维埃区大部分的红军是由国民党军队转过来的军队所编成，有些军队甚至连军长都是原来的，一点没有动。这些军队的成分，多半只是农民出身，可是大都脱离生产已久，不能算做真正红军。”

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意见是“没有一点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加强红军、建立中央政府的观念，这与国际的建立根据地的意见完全不相同。”

为此，就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为使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领导的加强，中央已决定派遣党的得力干部去担任苏维埃政权中红军中的主要工作。”

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在组织上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派中央的一些同志到苏区去所谓“加强领导”。使王明路线贯彻到各苏区去；另一方面过分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以及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

第三，在对形势的分析方面，1930年6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8月决议中说：“革命职工运动处在高潮上。”“准备总罢工问题，也迫切起来了。”1931年3月又说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在当时就“日益动摇反革命国民党的血腥制度”等等。

这就是王明路线提出进攻路线的理论根据。王明在他那本小册子中作了更荒唐的估计，他说：“第三时期是什么？是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更加动摇更加腐朽而走向完全崩溃的时期”。王明的这些观点就是照搬、照抄、照套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

1931年9月，王明到苏联后当了中共驻国际代表，1933年7月，康生去苏联当王明的助手。他们上传下达，国内代理人照搬照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加发展和深入的几个问题，也是从共产国际那里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十九路军违命开到上海，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到南京，捣毁中央党部，外交部，上海群众捣毁市党部，组织法庭审判市长、公安局长，满州马占山正在抗战，全国各地捣毁国民党党部，王正廷辞职，蒋介石下野出洋。如果我们路线正确，利用这一大好形势，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但由于王明等横扫中间派，葬送了大好革命形势。

1932年4月间，为了反对右倾，王明等又通过了一个《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个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指出苏区白区都是机会主义，把全国各省的党都打遍了。

1932年6月，又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批判北方落后论，到1932年北方党也垮了。

在白区，批判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合法主义”。

在苏区，主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经过赣南、宁都会议，夺了毛泽东同志的党权、军权，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综上，我们说王明路线实质上就是国际路线，凡是共产国际的，王明几乎一概照搬、照抄、照套，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关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王明路线的后果，可以这样来概括：共产

国际东方部长、一个俄国人与中国的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个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李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这两个人就是瞿秋白和周恩来，给戴上了“对左倾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帽子。另一方面却硬把思想完全错误的、但是共产国际忠实信徒的王明抬上来。哪一次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都是由外国人起草的。从此，王明路线搞了四年，此路线是以反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起家的，但这是假的，王明路线的纲领有本书，他的观点比李立三更“左”，如果不是更“左”十倍，也可以说更“左”五倍，可是他穿的是反“左”的衣服，他把自己称为布尔什维克路线。结果怎样呢？革命力量损失了90%，害得我们用两个脚走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长征是英勇的，是拚命的，但却是被机会主义者引到这条道路上来的。把南方根据地统统损失了，完全帮助了敌人蒋介石。

4. 共产国际“七大”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这次大会是共产国际所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参加下召开的。

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除王明、康生外，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吴玉章等。林育英（张浩）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选举了王明、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为共产国际执委，康生、秦邦宪为后补委员。国际执委选进了较多的中国委员。

这次大会是在德、意、日法西斯战争攻势正在全世界范围和各国内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批评了过去关门主义错误，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共产国际“七大”作出的重大决策的转变。

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决议。在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分为两种不同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季米特洛夫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季米特洛夫指出，“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立反帝人民战线”，他特别指出“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口号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团结的中心。”

大会根据皮克的报告通过的“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中，提出让各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独立地去解决本国最复杂的政治问题和策略问题。这是大会很重要的一项新的决定。

大会还高度评价了中共的英勇斗争精神，赞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指“八一宣言”）。

在曼努斯基为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说：“中共是英勇斗争的模范”，并赞扬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红军长征的胜利，赞扬了中共策略的正确，红军指挥的正确。

大会还进行了自我批评。指出“共产国际许多支部在工作中有严重缺点：统一战线策略实行得迟缓……不懂得在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有建立反帝人民战线之必要”，因此，

大会责成共产国际各支部在最短期间内铲除关门主义余毒。

总的来看，共产国际“七大”是一次很重要的大会，它规定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在国际“七大”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下，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

“八一宣言”是参加国际“七大”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国际新的决策精神集体讨论之后，由王明执笔写成，然后由他译成俄文，送交“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看过，经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同意后发出的。

“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的《救国报》（后改为《救国时报》）上，这个报纸后来大量寄往国内，和中国广大群众见了面；这时，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共产国际和陕北的中共中央已恢复了联系，曾经参加国际“七大”的林育英（张浩）于1935年12月从莫斯科辗转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国际“七大”的要旨。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开始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是对的，但它的思想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缺乏阶级分析。特别是在对待蒋介石参加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王明主张无条件的立即实行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斗争过程，党的斗争策略几经变化，大体上是经过三个阶段，即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通俗地说，也就是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让他一步一步地跟我们走。这需要高度的斗争艺术，但这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共产国际和王明干不了的。

从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36年5月5日东征结束这一段，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在反蒋抗日的口号下进行的。“八一宣言”发表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还在长征途中，蒋介石正调集几百万军队前堵后追地打我们，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仍旧对我们进行疯狂“围剿”，面对这种严酷的斗争现实，怎么能把蒋介石国民党放在统一战线之内？

和共产国际、王明的意见相反，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决议，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组织、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党派，只要是反对日本和蒋介石的，我们都可以联合，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他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这叫做“反蒋抗日”。

从1936年5月东征回师到12月西安事变，党的策略口号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36年5月5日我军东征回师后，发了个通电。通电第一次向国民党郑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蒋介石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地区停止内战，双

方互派代表谈判，商讨抗日办法。这就反映了党的策略口号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

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仍是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出发（阶级关系的分析，从来都是党决定战略、策略的出发点）。

（一）英美同日本的矛盾尖锐化、表面化。英美在“华北事变”后对日本表示了公开谴责；

（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矛盾也尖锐化、表面化了。日本对华北的加紧侵略，对华东、华南的经济掠夺，同四大家族的矛盾激化了。

（三）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

（四）通过前一段斗争情况看，“反蒋抗日”口号对我并不利，“逼蒋抗日”更有利于争取国民党中主张抗日的势力。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头子，掌握着全国政权，反蒋会使国民党内部很多人为难。改为逼蒋更有利于团结更多的只愿抗日、不愿反蒋的国民党人士。比如张学良只同意抗日不同意反蒋，这对我党有启示。所以，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逼蒋抗日”的指示，详细解释了我党逼蒋抗日的方针和执行的具体办法。

这个指示是我党中央在这个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转变的开始，根据这个指示，我党在36年做了以下几件事：

1.对国民党采取打、拉结合的方针。对国民党的进攻我们采取自卫反攻，要打不能退让，但另一方面又要同国民党接触谈判。36年5·5通电就是拉蒋的开始。从此以后，我党通过各种渠道，同蒋介石接触谈判。经过一打一拉，一步步逼蒋走上联合的道路。

2.党的政策上的改变。首先，发表了两个指示，一是改变对富农策略的指示，一是改变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富农、小地主土地不没收）。其次，36年9月17日党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这个改变是为了团结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两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质上是一致的。

3.推动了西安事变，是这个时期最大的事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陕北保安的时候，群情激愤，要求把蒋介石解到保安交全国人民公审。大革命失败后十年来蒋介石所欠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债如山，这一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共中央对事变的解决，有一认识过程，至12月19日发出《对西安事变通电》，主张“召集和平会议”，“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同日，在《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指出：“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共产国际在事变发生后认为，中国急需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要用他们的影响去释放蒋介石，亦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是对的。但共

共产国际对事变所以发生的看法和我们不同，它认为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的，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中国事变》一文中写道：“张学良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同时在《消息报》上写道：张的反日要求“很可能”是一种伪装。“不管这是不是事实，在这一时间张的起义结果损害了统一战线运动”等等。当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这次事变的态度时，苏联外交部回答说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予闻，也不赞成。

另外，由于共产国际过于着重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实力，过高估计蒋介石个人在抗战中的作用，因此想以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来换取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我党则认为对蒋介石的释放，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借此机会一步一步逼迫他接受我党抗日的主张，并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西安解决这次事变。由于中共代表团按照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工作，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然后释放了他，这样初步实现了我党“逼蒋抗日”的目的。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西安事变后，由逼蒋抗日阶段进入联蒋抗日阶段。时间是从西安事变开始，一直到37年9月22日宣布国共两党合作宣言，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形成为止。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做了几件大事：

1. 37年2月10日我党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5—266页）。这是调整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政策，也是我党联蒋抗日的重大步骤。四项保证中我党提出红军改名，苏区改为特区，并归南京中央政府指导，但我党让步是有原则的，即：第一，让步必须是双方的让步，不能是单方面的。国民党的让步，是放弃内战、独裁、对外不抵抗。我们的让步是红军、特区政府的改名，改没收土地为减租减息。第二，让步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有两条不能让步，一是红军、特区政府的领导权不能让；二是对国民党有批评的自由不能让，批评的自由实质就是揭露国民党。让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但王明在37年5月（这时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在共产国际写了一篇文章《救中国的关键》说：红军不只是改名，而且本质也改了，改成统一战线的军队，苏维埃不仅是改名，而且本质上成了国民政府的一部分！

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也讲了话，调子仍是反共，但基本上接受了五项要求，表示要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三中全会还确定与我党开始谈判。

2. 国共两党的谈判，共举行过四次。第一次是36年7月，周恩来同志亲自到上海，国民党方面是陈立夫、陈果夫，谈判毫无成果。第二次是37年2月初，地点在西安，我党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博古，国民党是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谈判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的改编和边区政府（武装和政权始终是关键）。顾祝同蛮横无理，谈判中断。第三、四次谈判是37年5、6、7三个月，周恩来同志往返于南京、奉化、庐山之间，所以后来周恩来同志讲这次谈判是“一上莫干，两至匡庐”。9月22日宣布国共两党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公开向全世界宣布，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

立。

较详细的摆了上面这些情况，一方面是想说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是和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建立反法西斯统战政策的指导分不开；但另一方面主要想说明，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王明等照搬、照抄、照套不同，能注意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国际指示精神采取分析态度，因此，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和策略，从而就能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的关系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基本路线是要求各国党服从反对帝国主义包围苏联这一根本利益。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希望是要我们党作出根本让步，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将八路军、新四军编入蒋介石的军队，同日军打大仗，打阵地战，拖住日军，以“武装保卫苏联”。他们根本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情况，不顾敌我力量的对比，也根本不懂我党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的意义。为了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3年5月最终导致了共产国际的解散。讲三点：

1. 第二次王明路线和国际的关系；

1937年7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在军事方面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明确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立场，要求对国民党保持高度的阶级警惕。

1937年11月12日召开的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发展洛川会议的精神，指出：①国共两党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②提出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制定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③为我党在统战中的策略任务作了具体规定。

这些都是正确的，都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右倾情绪而作的。

但1937年11月下旬，王明和康生等由苏联乘飞机经由新疆回延安。王明当时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而且他自己说是带着国际路线回来的，还说斯大林跟他谈过话，这样，王明俨然“钦差大臣”，不可一世。

他一回来对上述中央有关统一战线中的方针、政策很不满意，他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做了题为《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归纳起来，有如下内容：①提出二个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教训别人说，“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因此，我们不应该谈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是放弃党的领导。因此，他反对阶级分析，说“现在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对CC和复兴社过去叫法西斯蒂，现在应该公开纠正过来。”②他提出统一政

权，反对解决民主民生问题，他怕群众起来吓跑了蒋介石。③在军事上他提出了五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补给、统一作战计划。这恰恰是蒋介石的要求。

接着，1938年3月，王明又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长篇的总结发言，重点是在军事上，他提出了①“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②强调正规军的作用，提出了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他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③他要求组织几十个正规师团，中心是依靠蒋介石二百万军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根本看不起我们自己的力量。

王明的这些主张集中起来就是阶级投降主义，它又必然导致民族投降主义。总之，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

但王明的这些主张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来自共产国际。可从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两方面看：

一、在政治策略方面。共产国际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就是帝国主义反苏战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希望是中国能拖住日本的后腿，“武装保卫苏联”，这就是它政策的出发点。1979年苏联元帅崔可夫发表了他题为《在中国的使命》的回忆录。崔可夫曾任苏联驻华武官兼国民党军事顾问，1940年来华赴任前，斯大林曾亲自接见他，向他交代说：“您的任务，崔可夫同志，以及我们所有在中国的人的任务，是牢牢地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在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如果德国侵略者进犯我国的话……。”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共产国际的对外政策是服从于苏联的民族利益的，这也是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华政策的实质。

围绕这一基本政策，共产国际主要依靠对象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蒋介石的国民党。1937年8月20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军事物资和专家的形式对国民党政府提供援助，当时在乌鲁木齐、哈密和兰州相继建立了基地，飞机把物资运到陕西、四川，再从那里继续运往国民党的部队。后来穿过新疆的旧商道修复后，运输又可以使用载重汽车了。另外，还对在中国的苏联顾问提出了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学会利用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武器，而且还要使蒋介石相信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见“崔可夫回忆录”）

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没有从苏联得到任何军事援助。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有一段叙述是可信的。他说：“苏联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主要对南京有利，而分送到延安来的主要是急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以及政治读物、报刊、马列著作，列宁、斯大林讲话等，……有所谓‘武器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顾问越多，失败越大’。”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也不放在眼里。他对崔可夫说：“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作为反侵略斗争中的领导者还是弱的。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还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还难说……。”

(见同上)

当然，共产国际援助蒋介石，主要是希望蒋介石把军队专用于抗日，而不是用很大一部分兵力去进攻共产党的根据地。但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是他的主要敌人，“心腹之患”，因此，国共两党的斗争就不可避免，而这是违背苏联的基本政策的。于是共产国际就通过王明打着国际路线的招牌来迫使中共向国民党蒋介石妥协、投降，并把人民武装力量统一编制到国民党的军队中去。当然，王明对共产国际从来都是唯命是从的，王明是毫无保留地推行共产国际的政策。

二、在军事战略战术方面。

王明提出的“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方针”是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意图的。共产国际曾要求扩大三十万机械化军队，认为只有打阵地战才能拖住日军。这是不顾日本人在武器和正规的军事组织方面占压倒优势的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懂我党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

王明的这条“国际路线”，开始曾唬住一些人，十年内战时期曾经追随王明的某些人又起来支持他；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王明带回来的这一“国际路线”，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仍采取了具体分析的态度，既拒绝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同时又肯定国际的领导和季米特洛夫的帮助。1938年秋，党中央派任弼时同志到莫斯科接替王稼祥同志任共产国际中国党的代表，他带去了中国党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当然，这个报告在和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仍反映了王明的观点，如强调共同工作与共同负责等等。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作了完全同意中国党政治路线的决定，并通过了支持中国抗战的公开声明。

由于王明路线，在他领导下的长江局得到全面贯彻，使党丧失了长江沿线大发展的有利时机；加以王明打着国际招牌，飞扬跋扈，凌驾于党之上，许多同志对王明的一套逐渐觉悟过来。1938年9月26—11月7日，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克服了阶级投降主义。关于六中全会和王明斗争的情况，王稼祥同志有一段回忆，他说：“王明当时在武汉工作……毛泽东同志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武汉或西安去开六中全会。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他自己负责。”这样，王明才来到延安。王稼祥同志还说，在他离开莫斯科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他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

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初，周恩来同志因治臂伤到达莫斯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当时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毛泽东同志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见《毛选》第二卷）的形式发表了一个书面声明，论述了苏、德协定的政治意义（当时许多国家攻击苏联）。周恩来同志把这个声明带到国际发给

各兄弟党，他们很称赞，共产国际说中国党起了作用。另外，周恩来、任弼时同志还会见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和各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商讨关于二次大战爆发后的世界局势问题；关于东方“慕尼黑”阴谋的问题；关于国际共运内部的问题等等。周恩来同志再次向国际执委作了报告，宣传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并说到国内近况，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都在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情况十分严重，但毛泽东同志正领导全党和全体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决心粉碎敌人的阴谋等等，引起了各国兄弟党的重视。

这时，国际对各国党虽说干涉少了，但仍是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进行干涉，例如要周恩来同志汇报各中央委员的情况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各国党的政策服从苏联的外交政策。

②苏德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

根据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1941年4月13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共同宣言说：“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俄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在这一条约签订的当天，松冈洋右对德国驻俄国大使强调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美英的地位因此增强了。”联共《真理报》也在4月15日发表社论称：“这一条约不但有助于和平的增强，同时也为日俄两国伟大人民的真实善邻友好关系开放一条道路——这种关系是日俄两国为发展相互的历史途径所必需的。”

从《苏日中立条约》的内容看，苏联实际上正式承认了“满州国”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这种只考虑本国的利益，而无视别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独立，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另外“条约”在客观上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了方便，因为“条约”使日军解除了占领中国北部所受的压力。同时，“条约”也便利了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和英美开战，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条约”也确实鼓励了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就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二个月多一点，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这时共产国际把反德战争寄希望于各国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来说，当其估计日本有可能不顾“苏日中立条约”也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要求我党动用全部军事力量来抵抗在装备上比我们强得多的日本军队。

而当时我党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准备和进行太平洋战争，不得不巩固它在中国的占领地，以便把中国变为它的太平洋战争和将来反苏战争的后方基地，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1941年前后起，在中国战场上更加强调以共产党为主要作战对象的方针，把它在中国侵略军的64%集中到解放区战场上来，经常以大量的兵力对解放区进行反复的扫荡，每次往往连续三、四个月之久，并在扫荡中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建立广大的无人区，企图以此摧毁我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蒋介石还以数十万大军配合日军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加以水、旱、虫灾

接连发生，广大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吃，没有衣穿，部队生活更为艰苦，除因连续作战不得休息外，还常常挨冻受饿，伤病员缺乏医药，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但共产国际不顾我们的这些情况，1941年7月联共通知中共，日本正从本土把一批批完整的部队单位运到了中国大陆，集中在苏联边境，建议八路军设法切断通往北平、张家口、包头的铁路交通，突破日本部队向这些地点的集结。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照办。1942年5月，共产国际为了迫使我党向国民党作出妥协、让步（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国民党也能集中他们的军队来抵抗日军了），就又派出常驻代表来到延安，一方面担任与中国党的联络，同时也是监督中国党的活动。这个代表几乎每天批评我们不抗日，为什么？就是要我们配合国民党军队同日军打大仗，打阵地战，拖住日军，以“武装保卫苏联”。如果中国党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一要求，就会使革命军队受到很大的削弱。因此，我党从实际情况出发，也没有照办。1968年，联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六月号）发表一篇文章，在追溯当时的情况时，有这样一段叙述：“毛和他的宗派成员公开破坏我们党的建议，就是必须以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行动来瓦解日本军队，并且当希特勒的军队在德苏边界取得短暂胜利时及时阻止它对苏联的进攻，……无数事实证明，在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利益要求最大限度地加速反法西斯斗争的时候，毛对抗日战争持消极态度。”

从《共产党人》的歪曲的、实际上是诽谤的说法中，说明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在战略上的原则分歧。

尽管中国党对共产国际不切合中国实际的一些错误指示进行了抵制，但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以号召保卫和援助苏联。7月7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表明在反法西斯战争方面，我们和苏联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并相应提出了“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美英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等十大任务。

③共产国际的解散

第一，由于希特勒所挑起的世界大战，使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统一的国际组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迅速变化的情况。正确的领导要从仔细研究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

第二，由于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集团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不相适宜。

第三，由于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党来说，它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从1935年国际七大以来，共产国际就基本上没有干涉过中国党内部的问题，而中国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鉴于上述情况，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出以下提案，送达共产国际

各支部批准：“解散世界工人运动之国际领导中心机关——共产国际。解除共产国际各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章程和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之各决议所负的义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号召凡是站在共产国际方面的人民，集中自己的力量，协助与积极参加各国人民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国解放战争，以便迅速毁灭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及其联盟与附属国。”

中共中央于1943年5月26日作出《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并宣布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当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在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革命事业的功劳之后，特别强调地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的事就好办了，就象生产关系变了，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一样。这时，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批判王明路线。

由于王明路线实质上就是国际路线，所以整风实际上是整共产国际的风，是批判共产国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错误。但是关于共产国际，当时我们一字未提。为什么？一是既然我们听了他们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右倾错误呢？二是共产国际自己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闹翻的。

（六）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共产国际存在的时候，各国共产党实际上从属于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解散后，联共对中国党仍旧挥舞指挥棒，表现为大国沙文主义。讲三点：

1. “雅尔达协定”

1943年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经过艰苦曲折的历程，扭转战局，反守为攻。1944年苏军将德国法西斯驱逐出国境，1945年4月16日，开始进攻柏林，5月2日希特勒自杀，柏林德寇被迫放下武器，5月8日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战结束。与此同时，美军也在加紧在太平洋上进行逐岛争夺战，45年4月攻占冲绳岛。

就在苏军直指柏林，美军迫近日本本土时，1945年2月，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达举行会议，会上除讨论彻底打败德国的计划等问题外，还通过了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达协定。

这个协定是在完全没有中国任何方面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后一年，即1946年2月11日才由华盛顿、伦敦、莫斯科三地同时公布的。这个协定签定时，太平洋上的美军虽已转入大规模反攻，但和日本进行逐岛争夺，伤亡很大，罗斯福为减少美军伤亡，急切想要提前结束对日战争，就要求苏联立即参加对日作战。斯大

林答应在欧战结束后二至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但提出对日宣战的三个条件，其中两项和中国的领土主权密切相关：一是承认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二是恢复俄国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在东北的权益。要求大连国际化，重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以及中苏两国重新共同经管中东路（后改称中长路）。这是以苏联战后的全球战略布局考虑的，完全出于民族利己主义。从苏联战后对外政策来看，其基点之一，仍旧是谋求出海口岸，重新以旅大作为其远东的军事重心，并且通过控制纵横东北全境的中东路，把海参威和旅大连成一气，这样就完全恢复了1904年以前沙俄盘踞满州以控制东太平洋的有利战略地位。

雅尔达协定后，苏联和国民党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为期三十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除实现它在雅尔达协定中所提出的条件外，苏联向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保证：“在对日作战中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质之援助”，但明确提出“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并尊重中国在东北之充分主权，并承认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总之，雅尔达协定，苏联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都没有支持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

2. 抗战胜利后，苏联继续挥舞指挥棒，不准我们革命。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准备夺取政权，但这时联共用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党，要我们一定同蒋介石合作，不能打仗。说如果打仗，中国的民族要毁灭一半，并且还要我们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同志还不够，还要毛泽东同志也到重庆去参加。重庆谈判搞了一个多月，双方就下命令打仗。国民党的命令，我们是通过无线电在延安得到的，我们消灭了他们十万人。当时主要是刘、邓地区的战争，即太行山地区。这样，蒋介石被迫不得不和我党签了一个会谈纪要，那是1945年10月10日的事。

由于我们不赞成、也没有执行苏联那个不准我们革命的指示，结果，尽管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有美国帮助，我们只花了四年时间，就把他们赶跑了，所以路线、政策正确，“强大的”蒋介石是可以消灭的；“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可以赶跑的。

1948年渡江战役前，民主党派中一些所谓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的幻想。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它既是针对国内这些人的，同时也是针对苏联的，他们也反对我们打过江去，怕惹火美帝国主义，引起世界大战。“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气魄。

3. 建国初期，苏联对我党继续施加压力。

在谈到新中国建立前后，苏联继续对我党挥舞指挥棒的情况时，毛泽东同志指出：“解放战争初期，先是不准革命，说如果打内仗，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年，1950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所谓压力很大，是怎么回事？1950年，毛泽东同志去莫斯科时，苏联专门开了一次会议来批评他，总的概念是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

他们先是不肯订中苏条约，毛泽东同志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还是在条约上签了字。毛泽东同志讲，和他们一定要斗，不斗他就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是过了几周，他想了想，先反对我们，后来又觉得可以同意了。

总起来说，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关系问题，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苏共在

支持中国革命的同时，要求：①中国党应是苏联型号的；②中国党的内外政策应服从苏联政策的需要；③中国的政治经济应受苏联的控制。这是马列主义加大国沙文主义。

尽管如此，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功过，仍然认为应当三七开才是公正的。

（七）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同共产国际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从前面介绍的历史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世界革命，特别是东方各国的革命是起了伟大作用的。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中，产生了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并且使各国共产党实际上从属于苏联共产党。这种用一个国际中心指挥各国革命运动的错误作法，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给各国的革命运动造成损失和失败。比如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大失败（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从主观条件来说，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自己不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和中国革命的规律，盲目相信和机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且利用这些意见和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打击比较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和中国革命规律的同志，吓唬没有实际经验和缺少理论知识的工农干部。

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产生在欧洲，从它的内容、形式、词汇到语法都是欧洲的。我们要把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创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东方半封建落后的国家里，特别象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中，没有最大的理论勇气，没有独创是不可能解决这个任务的。虽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解决了俄国革命的问题，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但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马列主义中国化，是经过许多艰巨复杂的斗争的。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恰恰是毛泽东同志以巨大的政治毅力和理论勇气，同上述种种错误倾向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

这个斗争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方面是同共产国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作斗争，同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宗教化和斯大林把苏联共产党的意见强加给我们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应当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帮助我们建党是有功绩的，但在我们党成立之后如何运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就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后实际上是共产国际的指挥中心，我们党的“二大”以后，长时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指示，都要我们党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我们党发号施令，有些指示和决定是正确的，有些则是不正确的。我们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办。共产国际则要按照他们的指示办。比如我们在根据地建设工农民主政府，老百姓一听就懂，然而就是不行，得改用苏联的说法，叫“苏维埃”。

井冈山的老百姓不懂得，就问谁姓苏名维埃？又如我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共产国际则要我们搞城市总暴动，指挥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共产国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我们要把马列主义中国化。因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是同我们党内的陈独秀、王明等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特别是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王明推行的教条就是共产国际、斯大林那一套教条。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就是同共产国际、斯大林把马列主义教条化的斗争，同我们党反抗和否定把苏共党的意见强加给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一回事。没有这个斗争的胜利，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就产生不出来，就不可能有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致函哥贝尔特、奥本姆海》）列宁也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者“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由于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长期的实际斗争中，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去同本本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独立自主的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从而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它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是指引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科学理论，这个理论，把马列主义大大向前推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展现了光明和新的希望。

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党在白区的工作

盖 军

(根据录音整理)

由于时间仓促、资料有限以及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白区的工作，谈不上有什么研究，这里只就我看到的一些零星材料介绍一下，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

刘少奇同志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以来，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种错误，所以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虽然有极艰苦与英勇的工作，也就不能巩固、聚积与加强我们的力量，反而削弱了我们的力量。”

这段话说明两个意思：一、在白区的党组织领导广大党员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做了极艰苦与英勇的斗争；二、虽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但是，由于一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不仅未能巩固、聚积和加强革命力量，反而削弱了力量。这段概括，虽不十分准确，例如，不一定说成是十年中一贯犯了“左”的错误，也有比较正确的时候；白区造成的损失，也不仅仅是削弱了力量，而是被破坏的很严重，没有剩下多少人。尽管概括的不十分准确，但我认为是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的基本情况。

下边讲两个问题

一、“二战”时期白区工作的基本情况

二、白区斗争策略方针上的几个问题

最后讲两点体会

一、“二战”时期白区工作的基本情况

十年中分五段谈谈：

第一段：大革命失败到党的“六大”

第二段：从“六大”到一九三〇年六月

第三段：立三路线时期

第四段：王明路线时期

第五段：遵义会议后到“七七”抗战

第一段 大革命失败到党的“六大”

这一段的基本情况是，“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是

正确的。“八七”会议后，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转入地下，开始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开始建立党的秘密工作。但是，只有六岁的年轻、幼稚的党，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还不懂得如何组织正确的进攻和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一种强烈的复仇情绪和革命急性病，使党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这种盲动主义，使刚刚恢复的白区工作又遭到损失。

“八七”会议在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同时，还提出“现时主要之组织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决定中央政治局“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这些都是正确的。

“八七”会议后，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建立秘密工作。困难表现在多方面：敌人的疯狂屠杀，许多不坚定的“革命者”跑的跑，溜的溜；有的声明退出共产党（据李维汉同志回忆，当时每天报纸上都登着一排排的名子，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有的甚至当了可耻的叛徒；困难还表现在我们没有经费，没有经济来源，等等。

但是，那些决心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为敌人的屠杀所吓倒，没有因困难而灰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和北方局。派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派张国焘为南方局书记。

在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党中央还连续发了几个通告，要求各地开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关于学生运动，提出“组织秘密学联，团结左派学生”；关于妇女运动，提出恢复各地各级妇女部工作，“吸收女工、农妇参加”，“训练他们秘密工作知识，做好女工、农妇工作”；关于工人运动，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特别注意工人运动”，“工会要由工人做领袖”，“把秘密工会组织起来”，“鼓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组织失业工人进行斗争”。这些指示和号召基本上是正确的。

当时中央也曾经纠正了有些地方党部的错误。例如，安徽省委曾提出“力争工会之公开自由”，中央在九月十九日给安徽省委的信中指出：“目前安徽的政治局面和工人力量实无可能，因此，不要力争公开工会，而要严密并扩大秘密工会的组织，以秘密工会为中心，引导工人斗争。”同时指出，“要加紧领导工人实行经济斗争，只有经济斗争才能使工人增进阶级觉悟和斗争情绪，明了我们党是为他们利益而斗争的。”

这些决定和批示，虽然许多是正确的，但由于各地党的组织有的刚刚恢复，有的还未恢复，工作大部分未开展。

幼年的党，对同盟者的叛变和突然袭击毫无准备，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认识，因此，对在强大敌人统治的地区，特别是在城市里如何保存、聚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毫无经验，表现了很大的盲目性。“八七”会议以来，“左”倾情绪继续生长，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

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中，夸张地估计了当时工人斗争

的形势，对工运的任务，提出了过“左”的要求，例如：“领导工人经济政治斗争，扩大工人武装组织和训练，一直发展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要求现时应立即开始全国工人的经济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甚至提出了“工人完全监督生产、工厂归工人管”等等，显然，这是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不承认当时革命是处于低潮的“左”倾错误。在乡村斗争中，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杀土豪劣绅大地主”等过“左”的口号。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给两湖省委信中，命令在湖南和湖北的“乡村城市都应一致的动作”，“汇合而成为总的夺取政权的暴动”。信中对两湖暴动作了具体部署：捣毁反动派的总工会以及改组委员会、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工头；领导失业工人捣毁救济局、劳工部、警察局以至抢米抢银行；在汉口和长沙领导工人打外国人等等，显然，这些做法都是过“左”的。

由于中央的错误领导，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盲动主义。例如，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群众的口号，以致引起烧城市、烧地主房子的错误。他们以为强迫群众进行烧杀，就可以激起群众革命的热情，“烧房子逼农民革命”，就是“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他们认为知识分子胆子太小，要他杀几个人以后胆子就大了，甚至在吸收党员时，个别地方提出男的要暴徒，女的要泼妇，说明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

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长沙举行了暴动。事先毫无准备，临时组织了二百人的敢死队，在王一飞、伍桐等亲自领导下，先破坏了电灯公司，然后就向国民党的军事厅、卫戍司令部进攻，敌人立即调来一个师，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江苏省委为贯彻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提出要在上海“以民众的暴动，夺取军阀武装，建立工农兵代表政权”；又提出“打倒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公开建立赤色工会”等过“左”口号。强行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工人不愿意罢工就强迫命令。例如，沪西内外棉纺工人罢工、沪东纱厂罢工、电车公司大罢工等都带有强迫命令性质。事先没有深入进行宣传和组织，下令罢工以后，发现有人仍去上班，就采取“红色恐怖”手段，枪击行驶的电车，制止工人上工。这些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不但未能促进工人运动的高潮，反而孤立了自己。

由于这些盲动主义的错误，使刚刚恢复的白区工作遭受损失，党员人数减少，党的组织解体，不少干部牺牲，例如陈延年、赵士炎等同志就是这时牺牲的。武昌市由二百多党员减少到四十人，团组织、工会全部破坏。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央曾对有的地方出现的盲动主义错误进行过批评，例如，批评浙江奉化暴动是盲动，批评山东“无动不暴”，批评山西“拿暴动开玩笑”等等，但是未从路线上根本纠正，错误还是继续发展。

一九二八年三月六日，中央通告第三十六号（《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中，又提出“目前统治阶级日益崩溃，革命潮流日益高涨，阶级斗争到了国内战争的程度”、“革命斗争进到与反革命决战的趋势”。显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又作了夸张的估计。正如瞿秋白同志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仍然认为

革命形势一般存在，而且继续高涨，这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原本个别的盲动现象，我们和当时的中央从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对的；对于有些党部不努力去领导和争取群众，反而孤注一掷或者仅仅去暗杀豪绅之类的行动，我们总是加以纠正的，可是，因为当时整个路线错误，所以不管主观上怎样了解盲动主义现象的不好，费力于枝枝节节的纠正，客观上都在领导着盲动主义的发展。”这个认识是对的。当然，瞿秋白同志还未进一步认识到他之所以犯“左”倾路线错误，就是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盲目地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他认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从大城市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因此，中国革命也必须是以城市为中心，所以他说：“农村中四处蜂起暴动的环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动便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省内工农暴动胜利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不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出发，加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产生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基本上是正确的，批评了中共中央出现“左”的错误。指出，中国革命现时阶段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革命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批评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的错误，“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煞”。指出，“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万的工农群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特别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它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并且，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决议》明确指出了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广大工农群众。如何争取群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条件，要利用公开合法形式进行斗争。这是正确的。《决议》还指出：“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因此，《决议》指出，坚决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发动暴动，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反对强迫罢工。这些都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二月决议到中国后，中央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通告》，表示接受国际批评，承认犯了盲动主义错误。可以说，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对于纠正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起了积极作用。当然，这个决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指导中国革命，提出中国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主张以城市为中心，批评在各地武装起义后刚刚发展起来的某些地区的游击战争。说，“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显然，这种批评是错误的。

一九二八年四月前后，出席“六大”的代表陆续前往莫斯科，留在国内主持工作的是李维汉、任弼时、邓小平等同志。

在全国实际工作中结束盲动主义错误之后，中央对前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在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与秘密工作》中，指出：“最近几月，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的原因，固然是反动进攻，但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环境，实为破坏的重大关键”，指出“运用公开机会去团结广大群众的斗争是白色恐怖下党最重要的任务”，第一次提出来“党的秘密工作必须与公开工作联系起来，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团结工农群众。”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中央又提出来，在“工人中应特别注重于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发清积欠、救济失业工友、集会结社自由”等方面的斗争。关于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中央通告中指出：“中央现在的策略，黄色工会如果是有群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入到里边去活动，以公开地位接近群众，领导他们作日常斗争，从斗争中揭破黄色工会的假面具获得其群众。不能简单地站在群众以外笼统地提出打倒或反对黄色工会的口号。”关于错误的经验教训，中央指出：“是盲动的无政府倾向，当时天天要暴动，一切取决于暴动，命令式的准备暴动。”规定，“以后一切政策要根据主客观事实与力量为断，防止盲动。”这说明中央当时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精神，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关于白区工作特别是工运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策略方针。

第二段 从“六大”到一九三〇年六月

这段基本情况是，“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还有缺点），所以这段白区工作是有成绩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召开的“六大”，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这些都是正确的。

“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明确规定职工运动“今后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这些都是正确的。尽管“六大”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正如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

“六大”以后，中央为贯彻“六大”精神所发布的通告、指示，许多都是正确的。例如：

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央关于工运的指示中指出：工运路线有两个：第一，尽可能利用旧工会，到群众中去宣传号召，领导他们斗争；另一条是公开发动反帝争自由运动，

建立灰色组织以公开团结广大工人群众。在斗争策略上，要注意日常小的斗争，努力取得小胜利以增进工人斗争情绪和勇气，使工运逐渐开展起来，不要机械地勉强地举行罢工等大斗争。这就是说，在斗争的组织形式上，要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去争取群众；在斗争的策略上，要从小斗争、小胜利去提高工人斗争的情绪和勇气，再逐步发展为大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央关于工运策略的指示中规定：第一，发动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是争取群众的最好办法；第二，正确的罢工策略的运用是保障斗争的胜利与扩大斗争发展的主要战术；第三，发动群众斗争的方法，要抓住群众最主要的迫切要求；第四，肃清命令主义残余；第五，正确的斗争口号是发动群众的主要条件，宣传口号与行动口号应该有区别，不能混合起来。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是争取群众的最好方法，罢工要注意斗争策略。

由于中央这些策略方针比较正确，“六大”以后，白区的党在各条战线上的工作都是有成绩的。

在工人运动方面，逐渐向前发展，表现了复兴的形势。罢工次数增加，一九二九年二月的统计：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月，上海发生罢工35次，五月至九月，上海发生罢工54次，十月至十二月，上海发生罢工51次。北方的工人斗争也开始向前发展。汉口的反日罢工有八千余人参加，香港、广东工人斗争也呈现活跃现象。据有的同志回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李富春同志任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时，领导法商电车公司三千多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取得了胜利。

一九二九年六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肯定了“六大”以来党在各方面工作的成绩，认为“六大”以后的中央“能正确应用六次大会策略，承认党已有进一步的巩固”，“全会满意中央过去对各级党部策略上的指示及职工运动的督促”。六届二中全会以后，工人运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统计，上海的纱厂、丝厂等由厂内的小罢工发展到带有政治性的罢工，市政工人、铁路工人等普遍发生斗争；北方的青岛、唐山、天津、北京、奉天等地工人运动也在发展。

学生运动方面，一九二九年八月，成立了全国学生总会。在学运战线上，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南京晓庄师范党支部。去年看到江苏省委党校陈响之同志写的一个材料，叫《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的坚强党支部》。一九二八年冬，在中共南京市委领导下，成立了晓庄师范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积极开展了革命活动，成立剧社、歌咏队、办黑板报等，通过这些组织形式进行宣传，提高群众觉悟，同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等进行斗争，揭露其反动面目，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了组织。到一九二九年底，这个党支部的活动扩大到整个南京地区，发动成立了南京自由大同盟。

在妇女运动方面，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为加强妇女工作，中央专门发了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展领导女工、农妇的日常斗争。斗争的口号是“反对加重工作”、“反对打骂女工”、“反对进出搜身”、“要求男女工资平等、男女年关红利平等”、“产前产后休息工资照发”、“月经假内请假自由”等，这些口号是从当时具体实际出发，因

此，这一段妇女运动也有发展。

党的组织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不少地方建立了省委、特委、县委直到支部。党员数量比大革命失败后有很大发展。六届二中全会指出，党已经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涣散中挽救出来，并已建立了组织上的相当基础”，在上海、香港、天津的某些支部，“在群众中渐能起领导作用”，由于在许多地方的党组织中进行了反对不良倾向的斗争，党员的思想觉悟也有很大提高。党中央机关在“六大”以后也逐步健全了组织机构。

在文艺战线方面

大革命失败以后，文艺战线方面的一些同志，从几路汇集上海，例如，从日本回来的有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铁声等；也有从各地撤退来到上海的，如阳翰笙、蒋光慈、钱杏村（阿英）等。属于创造社的有李一氓、阳翰笙等。属于太阳社的有蒋光慈、钱杏村、洪灵菲、孟超等。他们都属于闸北区第三道街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支部，还有杜国庠（林伯修）、柯柏年、许涤新等搞社会科学的。在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下（当时省委宣传部长是李富春同志），一面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面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开始，在左翼文艺队伍内部还存在一些分歧和论争，就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的一场论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一九二九年春天，李富春同志找阳翰笙同志谈话，指出他们同鲁迅的论争是不对的，要求立即停止这场论争，与鲁迅先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因为当时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新月》杂志，正在攻击革命文学。与此同时，在江苏省委领导下，把文学系统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统一领导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

一九三〇年三月，由鲁迅、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等发起成立了“左联”——左翼作家联盟，进步的文艺作家初步团结起来。“左联”尽管有些缺点（纲领上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文学，把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当作当前行动纲领，有些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它却是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堡垒。一方面，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大众化的实践方面，是贯彻了中央的指示（据阳翰笙同志回忆：当时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意见，希望“左联”的文艺工作者能到工人区中去，例如沪西区、杨树浦区、闸北区，帮助党进行宣传工作，加强文艺工作者和工人的联系），斗争是有成绩的，促进了文艺和革命的结合；另一方面，在同反动文艺的斗争中，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基础，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

这里还要讲讲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成立的中央特科，是为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安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政治保卫机关。中央特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开辟了从中央到各个地方的秘密交通线。特科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党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同时兼及武汉、平津、香港等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等所在地的重要城市。特科也是在不断摸索经验中建立起来的。先建立一科。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后，要有房子、设备等等，一科就负责租赁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的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租家具，做生意，打铺保，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

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料理家属生活，等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党中央的每一项活动，在特科工作的同志都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例如一九三〇年五月，在上海召开的“苏代会”，为了保障会议的安全，一科和三科互相配合，用开医院的形式，掩护这个会议，租了一座四层的楼房。一层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充当门房、账房，负责接待临时进来求诊的病人，二、三层当“病房”，就是参加会的代表的住房，四层是举行大会的会议厅。三科派出卫队在楼房周围进行警戒巡逻。陈赓同志多次到“医院”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使会议得以顺利进行。

为搜集情报，掌握敌情，要建立情报组织，一九二八年四月，又设立了二科，陈赓同志是二科科长，一直负责领导情报工作。特科情报工作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策略，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对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八年四月，罗亦农同志被捕牺牲，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镇压特务、惩治叛徒工作的重要，于是又设立了三科。三科也叫红队，专门负责“打狗”，保护中央负责同志，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红队为镇压叛徒奸细保卫党做出了贡献。

一九二八年“六大”以后，红军和苏区有很大的发展，原来的交通线往来时间长，不能适应斗争需要，需要建立无线电联系，又设立了四科，科长是李强同志。主要是建立和管理无线电工作。一九二八年十月，周恩来同志参加“六大”回到上海不久，亲自抓这项工作，决定选派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开始筹建电台等等。四科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李强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建成了党的第一个无线电台。同志们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就反映了那些坚守在无线电事业岗位上的战士的英雄事迹。

周恩来同志用很大精力抓机关工作方式的转变，实现机关社会化和家庭化。什么叫机关社会化？就是把党的机关以商店、企业的面目出现。例如《伍豪之剑》中所说的古玩玉器商店，外表是商店，实际是党的机关。当然，写小说是可以张冠李戴的。机关家庭化也是掩护秘密工作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直接指挥特科工作人员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保卫党的组织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营救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彭湃（当时担任中央农委书记）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委员）邢士贞（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等同志，于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于叛徒白鑫（中央军委秘书）叛变后告密而被捕。周恩来同志得知消息后，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亲自领导营救工作，并决定侦察白鑫的行动，坚决给以制裁。中央调动了特科的全部力量，决定在敌人把彭湃等同志解往警备司令部的时候，实行武装劫救。八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得知敌人要将彭湃等同志从拘留所解往龙华的情报后，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齐出动，埋伏于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截车。但是，因为送武器的人来迟了，加上擦掉枪内的润滑油比较费事，错过了时间，营救未成功，四位同志终于被敌人杀害了。四位同志的遇难，激起同志们对叛徒的无比憎恨，没过两个月，这个血债累累的可耻叛徒，在他准备逃往意大利去正要上车的时候，就被红队的同志将他处决。还有同叛徒顾顺章的斗争，大家都很熟悉了，这里不讲了。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

败到一九三一年冬，党中央机关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江苏省委、全总党团等也没有大的破坏，这同周恩来同志亲自抓特科工作，抓保卫工作是分不开的。

第三段 立三路线时期

讲两个问题：

- 1、立三路线的形成
- 2、立三路线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错误

1、通常讲立三路线是三个月，这是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决议算起的。实际上从一九三〇年初“左”的错误就比较明显了。

一九三〇年一月，中央在《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中，就认为中国革命“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决议》认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这种“右倾危险”在白区工作中的表现是什么呢？《决议》认为，党在黄色工会中策略有错误。错误表现在：“过去主张在黄色工会内不组织赤色工会支部，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提出党的新策略是“以赤色工会纲领与黄色工会纲领对抗，在黄色工会内组织赤色工会支部，独立领导群众斗争”。并且认为，“这一策略转变，无疑的是开辟了职工运动的新途径。”这个所谓新策略，强调要组织赤色工会，要独立领导群众斗争，实际上否定了以前提出的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去争取群众的正确策略。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赤色工会无法建立，建立了也不能有很大发展，同时，赤色工会怎么能独立领导群众斗争呢？显然，这是“左”的冒险主义的策略。

一九三〇年二月，中央发了七十号通告。这个通告，“左”的观点已经比较明显，认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认为“全国群众斗争走向平衡发展道路”，提出“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实现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等过左的口号。三月，中央发出通告，要求“五一”节在全国重要城市举行总示威运动，在示威运动中提出上述“左”的口号。

一九三〇年五月，蒋、阎、冯中原大战，革命形势是有很大发展。立三同志对这种形势（“一百个县的苏维埃扩大到三百个县，小小游击队变成十万正式红军，工人运动渐渐由经济斗争进到政治斗争，兵士运动变成了军阀的兵士直接投到红军里面来”）作了夸张的估计，认为只要“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中国革命高潮”。认为“工人运动不但已经反对国民党，而且可以组织暴动夺取政权了。”认为“上海、南京其他大城市之中工人运动已经激烈到可以直接武装暴动了”；认为“总同盟的政治罢工应当和武装暴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准备总同盟政治罢工，同时准备武装暴动”；认为“既然总同盟罢工可以转到暴动，并且又有红军，那么就必须立刻准备武装暴动”；认为当时“在南京和其他城市的军队里面有我们共产党的影响，所以武装暴动是可能的”。

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党中央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下，在六月十一月通过了《新的

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立三等人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立三等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立三说，南京兵暴与争取武汉首先胜利相配合，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说什么“南京苏维埃政权多维持一点钟亦有伟大意义”，“南京兵暴紧接着争取武汉首先胜利，同时中央苏维埃政权必须建立在武汉，这样才能有拚死维持南京政权的决心。”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当时立三同志的头脑确实也热得发昏了。

向忠发给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信说，中国革命高潮到来，可以搞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了，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援助中国革命。共产国际来电不同意立即搞大城市武装暴动，中央政治局又写报告，说广大工人、农民都“要求暴动”，“而且都要求夺取中心城市”，认为“镇江部队在我们领导之下，汉口驻军大部也在我影响之下……这一客观形势，无疑的武装暴动条件正在成熟，因此，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信中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自然要反对，再次请求国际批准中共中央的决定。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莫斯科，同意共产国际的意见。于是，李立三、向忠发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认为这是周恩来在莫斯科汇报的结果，认为周恩来的“右倾思想不是偶然的”，等他回国要进行坚决斗争。可以看出立三等当时“左”得发狂了。

2、立三路线在工人运动中的主要错误

(1) 夸大当时工人运动的形势。他们估计当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工人斗争的积极性大大发展，不管有组织的或者无组织的工人斗争都一样的剧烈发展；斗争的政治化，一切斗争一发生就成为政治斗争，不是反对黄色工会就是反对国民党；工人反攻的形势日益走向急进，每一斗争都要走上武装冲突；黄色工会已完成其法西斯蒂的过程，群众斗争日益走向赤色工会之下来。因此，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党在工运中的任务是：“争取广大工人到赤色工会里，反对和消灭黄色工会，驱逐国民党黄色工会领袖，在各地各工厂里普遍建立赤色工会组织，建立工厂委员会组织，加紧发动领导和组织工人斗争，组织同盟罢工，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同盟罢工，以促进武装暴动的实现”，幻想“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开始向全国胜利的前进”（全总特派员会议，一九三〇年三月总结）。

(2) 在斗争策略上：A、强调建立赤色工会，用赤色工会的纲领去领导群众，发展扩大赤色工会组织，并在斗争中公开领导群众；B、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强调采取公开活动路线，要用公开的方式领导斗争，并且无限制地搞总罢工和飞行集会《中国工会历史文献》；C、在罢工运动的指导上，以政治罢工为主要斗争方式。强调“在政治罢工中，政治示威非常重要”，“示威时要有演讲队，在占据街市时，要举行演讲，就是讲几分钟也好。”每次集会，还必须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黄色工会。结果，没有打倒敌人，反而孤立了自己，暴露了自己，使自己吃了亏。

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的，立三路线时，“几乎大多数的罢工、示威和纪念节的工作中都执行着，在极大多数的文件、宣言、传单以至群众的要求条件上都表现着。这是立三路线的最重要部分。在革命基本问题上的立三路线的理论——半托洛茨基主义，是立三在十一号决议的前后才提出来。”

立三路线贯彻的结果，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凡是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

这里，讲一点立三路线在上海工人运动中的贯彻情况。

“六大”以后，上海工人运动开始复兴，罢工次数增加，其中属于我们党领导的占多数。党员人数和党的组织都有发展。据当时上海党组织统计，一九三〇年五月，工人中党的支部发展到155个，党员增加到1255人，工联会（赤色工会）有二十余个，约有会员27000余人（项英：五次劳大报告）。

但是，由于全总贯彻立三路线，坚决采取消灭黄色工会，独立领导工人斗争的策略，使党和工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例如，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日，为了显示上海工人力量，搞“第四次”暴动演习。在上海工会联合会领导下，在杨树浦临青路一带，举行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第一次大检阅，参加人数四百人以上。会上，举行授旗和宣誓仪式，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呼“准备四次暴动”、“打倒国民党、改组派、取消派”等“左”的口号。在游行过程中，因为工人较多，敌人未动手，但派便衣、包探跟着。等示威游行结束，队伍分散时，我们的同志就大批被捕。但“左”倾路线仍不接受教训，紧接着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大戏院前又搞了游行示威，又被捕很多同志。

特别是一九三〇年的红五月运动，李立三同志直接领导，后来又由项英领导，飞行集会，政治示威等连续进行。几乎每一个节日、纪念日都要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一直到“八一”大示威，发展到高峰。这些活动都是拿先锋队去拚命，敌人来镇压，我们手无寸铁就同军警发生冲突。每一次都有数以百计的同志遭到逮捕，许多基层组织从此就垮了。

封建专制主义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社会基础，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在我们党内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李立三路线时也是家长制，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当时在白区工作中，恽代英、何孟雄，包括罗章龙、张金宝以及在江苏、河北等地的同志，反对立三路线的冒险主义，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说这些同志“右倾”，轻则批评，如坚持意见，就给戴上“取消派”或“反对派”的帽子，甚至给以撤职处分，例如，对恽代英同志。恽代英同志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因为反对立三“左”的错误，立三就把他调到沪东区委工作。代英同志高度近视，四月十九日，在马路上遇到特务搜查，他因看不清楚，回避不及被捕了。他为了不让人们认出来，抓毁了自己的面容，用了化名，因此，在狱中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周恩来同志回国后，曾用各种办法营救，一九三一年四月，正有希望放出来时，又被叛徒顾顺章指认，第二天（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就被敌人杀害了。临刑时，恽代英同志拒不跪，挺着胸膛，高唱国际歌，身中数弹时还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后

来，立三同志也检讨了自己对待恽代英同志的错误。在清算立三路线错误时，有人说立三当时的家长制是一只手拿着笔，一只手拍桌子，骂同志右倾，下边就不得不吹牛皮、说假话、报告假数字，例如，谎报赤色工会会员的数字。

短短的几十天，上海党组织连续被破坏，几百名党员在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和冲厂罢工中被捕，三千六百多名赤色工会会员只剩下七百多人，许多同志牺牲了。武汉、南京等地也遭受着很大损失。

立三等人一意孤行，很多正确意见未被接受，结果使经过许多艰苦恢复起来的白区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有的地方党组织，例如湖北、福建、浙江等地省委、武汉市委等被破坏后再未恢复起来，直到抗战爆发后重建省委组织。

第四段 王明路线时期

这部分讲两点：

- 一、在白区工作中，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的一些表现
- 二、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情况

一、在白区工作中，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更“左”的表现

(1) 在工人运动方面

前边讲了，立三已经是“左”的发狂了，但王明不是批评立三的“左”，而是说立三是右。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中说李立三是“实际上放弃和忽视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的必要前提的工作”。不是批评立三搞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不对，而是说立三放弃和忽视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的必要前提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做好罢工和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样，当然不能克服立三路线那种组织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游行示威和飞行集会的错误，相反，强调搞飞行集会在“现在上海的条件下”、“更有必要”。主张“可以联合许多单个的飞行集会、成为群众大会或全区的游行示威，以至于与军警冲突，夺取政权。”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全国总工会为贯彻王明路线，在工作计划中提出，彻底执行国际决议，肃清在“左”倾辞句下掩盖着机会主义的消极的立三路线，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及其影响，切实领导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发展黄色工会内的赤色小组，正确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等任务。这个计划很明确，要坚决执行国际决议；认为立三路线不是“左”而是右；强调继续扩大赤色工会。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通过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要求在大城市纪念“五卅”运动中，“要利用各种群众集合的场所，去举行飞行集会，要发动群众的各种斗争，去号召“五卅”的罢工、罢业、罢操与示威，……在“五卅”当天，要尽可能的坚决的做到有准备，要反对说飞行集会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或采取投机取巧的方法，不在运动的当天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如上海某区），这都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党必须予以坚决的斗争。”不在当天举行就是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就要进

行坚决斗争，比立三更“左”，“左”的出奇。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通过的《中央对职工部及全总党团工作的决议》中，认为“共产国际和职工国际的路线，还没有切实在实际工作中去实现，工作上的转变不够，非常缓慢”，列举了全总党团和职工部七条错误。在今后的八条任务中提出，切实实现赤色工会的独立领导，目前要抓住反工厂法的斗争去发动群众，加紧反对黄色工会等，这些比立三路线更“左”了。立三路线要求建立赤色工会，王明路线要求切实实现赤色工会的独立领导，又提出绝对反对国民党工厂法，这些都是过“左”的。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掀起反日高潮，工人运动有很大发展。王明路线的中央不是利用大好形势发展统战活动，而是搞关门主义。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发出了《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决议案中仍然强调“努力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要求“赤色工会应利用一切可能跳出目前的秘密状态……争取赤色工会的公开”去领导工人运动，根本不提利用合法去广泛争取群众。唯赤色工会独左，唯赤色工会独革。

这里要讲讲刘少奇同志领导职工运动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任中央职工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

少奇同志在领导职工运动中，没有完全贯彻王明路线那一套，因而受到了打击和排挤。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十年中，刘少奇同志从事白区工作有六年多。对白区工作，特别是职工运动，统一战线方面，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善于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为白区工作提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策略方针。

据杨尚昆同志回忆，刘少奇同志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在职工国际工作期间，就主张利用合法，反对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主张参加到黄色工会里去争取群众。秘密工作主要由党的组织去做，工会工作主要是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去进行。他在职工国际工作时就写过这样的文章，人家不给登。当时，职工国际强调各国要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变黄色为赤色，少奇同志不赞成，他主张利用合法，反对搞“赤色反对派”。因为当时各国黄色工会的势力都很大，想在黄色工会里搞赤色反对派，实际上不可能。但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罗佐夫斯基不顾少奇同志及别国代表的意见，仍然把建立“赤色反对派”写进决议案。在执委会上讨论时，少奇同志又表示了反对。然后少奇同志根据自己的经验为会议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事惹恼了罗佐夫斯基，他使用了对托洛茨基的语言，诬蔑少奇同志提出来一个“反决议”、“反提纲”（当时苏联称托洛茨基为反对派）。职工国际也是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以“老子党”自居，盛气凌人，给刘少奇同志戴上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刘少奇同志回国后，担任中央职工部长兼全总党团书记，负责领导职工运动。少奇同志注意从实际出发，在几个问题上同王明路线是有分歧的。

①对形势的分析。少奇同志认为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公布以后，工人运动是受到了压抑和束缚，但“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潮中，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新形势，因此，少奇同志认为当时的工人斗争形势是“防御和反攻”的，而王明路线则认

为工人斗争的形势是“反攻中的进攻”。在中央讨论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时，就发生很大的争论。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们就批评少奇同志“对目前工人运动形势的估计是不足的，是右倾机会主义。”事实证明，刘少奇同志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②刘少奇同志主张把工人的日常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要积极领导工人争取切身利益的日常斗争，以便争取群众，聚积力量，这是正确的。而王明路线虽然口头上也讲“我们坚决地反对立三路线放弃了群众的切身问题，而空喊罢工，空喊反帝”，实际上仍是单纯强调政治罢工、脱离工人的日常斗争去进行空洞的政治宣传。他们诬蔑少奇同志“对武装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消极，这是绝对错误的。”是“放弃武装工人的任务，而只是领导工人每天在米袋子里兜圈子”。

③刘少奇同志是不赞成搞无限制的冲厂、罢工、全行业的大罢工和飞行集会那一套。他在《罢工策略》一文中，强调领导罢工要“了解客观形势，庄严地估计群众情绪，精密地计算敌我双方力量……”反对不顾当时主客观力量的盲动冒险。当时许多工厂在遭到立三路线破坏之后，党的支部、赤色工会刚刚恢复，有的只有几个人。但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又要求马上举行罢工、冲厂，遭到镇压后，又重新恢复，然后再罢工，成了恶性循环。所谓冲厂，就是一个车间有几个人突然宣布停工之后，就开始冲厂，然后发宣言，要求全行业响应，得到各行各业同情支持罢工。在当时的严重白色恐怖的条件 下，这怎么能做到呢！刘少奇同志开始是不赞成的。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就批评少奇同志“放弃了组织在业工人的罢工”，是“只限在领导失业工人的斗争”。他们说“我们的全总党团与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却正陷入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使赤色工会不能成为猛烈高涨中的罢工斗争的组织者与发起者。”后来，在“左”倾路线的压力下，刘少奇同志不得不去搞冲厂罢工，但他在组织服从的同时，在实际罢工斗争中，还是讲究领导艺术，避免大的损失。

④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刘少奇同志是主张利用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以积蓄力量的。一九三二年一月，他连续写了几篇文章，例如：《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国民党封闭永安工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等等，这些文章尖锐地批评王明路线的“左”倾关门主义者，是“把国际决议当作圣经，天天挂在口头上念”，指出，“要退出那些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脱离黄色工会下面的群众，让这部分群众去受黄色工会领导的欺骗和愚弄，结果也就是维持了黄色工会。”可以看出，刘少奇同志当时就坚决主张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圣经去照搬照抄。

一九三二年初，上海永安第二纱厂工人向厂方要求发给花红四个月。该厂工会是受国民党领导的黄色工会。这个工会组织了要求花红代表团，向厂主交涉（当然只是交涉），不仅无效，资本家还以关厂来恐吓工人，于是工人举行罢工，捣毁工厂机件及办公室，遭到军警开枪镇压，死伤工人甚多，工人又继续罢工。资本家依照国民党的工厂法、工会法，控告黄色工会委员，法院就逮捕了黄色工会的委员，封闭该厂工会。这时候我们的工联会（就是赤色工会）提出的口号中，不提“反对国民党封闭工会！”，不提“反对逮捕工人及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等口号。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被捕的工人是黄

色工会的委员们，封闭的工会是黄色工会而不是赤色工会，所以就用不着反对了。要反对，就等于“投降”了黄色工会。刘少奇同志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尖锐地批评“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为什么不对呢？刘少奇同志指出，（一）因为国民党逮捕黄色工会的委员们，是要进攻工人，严厉惩罚工人的暴动，又不能把几千暴动的工人都逮捕起来，这实际是给全体工人颜色看的；（二）我们不反对，就是承认国民党资本家有逮捕工人、封闭工会的权利，这自然是国民党资本家所欢迎的；（三）黄色工会的委员被捕，工人对他们幻想更深，以为他们真是为工人群众利益而牺牲。我们应该一方面号召工人“反对逮捕工人”、“反对封闭工会”、“要求释放被捕工人”、“要求工人组织工会的绝对自由”，同时，应该向群众指出现在的工会及其领袖是黄色工会，揭破他们的错误和欺骗，号召工人自己惩罚这些领袖，自己来组织工会。我们只有这样，才可以和幻想他们的下层群众，建立统一战线，向资本家国民党斗争。这当然不是投降黄色工会，而是争取它的群众。

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们更是家长制、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认为少奇同志于公开写文章批评领导，这是大逆不道的。于是开会批，在党报上公开点名批。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布了《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在全党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同志。当时党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康生等人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刘少奇同志。在中央的压力下，刘少奇同志写出了《我的错误》的检讨。承认错误还不行，王明路线的中央终于撤销了刘少奇同志职工部长、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派他到上海市工联会去工作，一九三二年冬调到中央苏区去工作。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压迫，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但王明路线的中央仍然强调有革命高潮，每到“五一”、“五卅”、“三八”、巴黎公社×周年、“九·一八”等纪念日或节日，中央都要发通告或指示，要求各地举行同盟罢工、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在这些斗争中提出了“反对工厂法、实现苏维埃劳动法”等过“左”口号，不仅未能争取群众，反而孤立了自己，使工人运动遭到严重损失。

（2）统一战线方面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中间阶层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广大人民群众也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抗日的政权代替南京卖国政府，革命形势很快到来。我们党虽然也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同盟等等，但是王明路线否认中间阶层的变化，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仍然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关门主义策略。他们不是采取同反蒋抗日爱国各派结成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策略，而是强调“只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才能彻底进行与领导最广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提出“把全国的革命斗争统一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为推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这就是拒绝了各方面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事实上帮助了蒋介石政权的维持。

王明路线对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的政策是错误的，提出“必须推翻国民党军

阀的这一领导，把领导权拿在群众手里”，号召“立即组织士兵委员会……监视与逮捕一切长官”。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红旗周报》发表一篇文章，叫《革命士兵与民众联合起来》。这篇文章说，“一二八上海抗战是革命士兵的抗日热情”，不仅否认十九路军领导者蔡廷楷等人的作用，相反，还强调“要知道一切国民党的军阀都是革命的敌人……我们要把这一观念很明显的告诉革命士兵，要他们不要相信他们的长官，反对他们的长官，以至把枪头对着他们的长官。”枪口不是对准日寇，而是对着对日寇抗战的十九路军长官，这能争取广大群众吗？当时中央对吉鸿昌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在吉鸿昌入党以前，看不到他在参加围剿红军遭到失败后思想上的变化，认为，“他不仅过去是军阀之一，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仍然是一个军阀”、“不能因他将队伍交给党指挥和有入党观念使他变成我们所能信任的人”。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评的，“左”倾关门主义者是要“革命的力量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他拚命。如果同蔡廷楷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时候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他们不懂得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在统一战线方面关门主义的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反而孤立了自己。

（3）在农民运动方面

王明路线不承认地区之间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要求在农村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创造苏维埃区域。一九三二年六月，中央召开了北方各省联席会议，通过《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大反“北方落后论”，不承认北方农村革命运动的发展比南方落后，要求在北方开展武装斗争，创造苏区。因此，北方会议后，河北省委就把“创造苏区与红军”作为中心任务，搞了高蠡暴动。山东也搞了暴动。在渭北苏区，为纪念十月革命节，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三原附近发动了三万多群众在马路上游行示威，遭到敌人镇压，从此这块根据地也垮了。

二、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情况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除加紧镇压工农运动外，同时也进行了文化围剿。

“左联”一成立，国民党反动派就认为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就是共产党人，发出密令，要取缔“左联”，通缉“左联”成员。国民党想尽各种办法，企图消灭左翼文艺运动。例如：

①限制和剥夺出版自由。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国民党公布了出版法，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宣传共产主义为“反动”，批评国民党就是“危害民国”。同年六月，又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稿本要送审”等等。

②禁止发行进步书刊，封闭书店。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禁止出售149种文艺书，76种刊物。

③拘捕刑讯，秘密杀害革命作家、艺术家。如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左联”五

战士：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捕，二月七日被敌人秘密杀害于龙华。

面对国民党对革命文化的围剿，革命文化战士在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战线上同各种反动思想流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支队伍不但未被消灭，人数还不断增加，活动地区也不断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左联”和其他各左翼文化团体先后创办了几十种刊物，创作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鲁迅写了许多战斗杂文、论著和文学作品。瞿秋白同志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出色的序言，他帮助鲁迅对“左联”的活动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社会科学战线上，郭沫若当时虽亡命日本，仍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事历史科学和中国古文字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同胡秋源、李季等人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进行斗争。在哲学战线上，艾思奇等同志同陈立夫等“唯生论”、张东荪的“新实证论”、叛徒叶青的“新物质论”等颠倒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在文艺战线上，“左联”同反动文艺展开了斗争。“九·一八”事变后，王平陵等打着“民族主义文学”的招牌，煽动反苏反共；一九三二年，自称“自由人”的胡秋源和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等，提出所谓“文艺自由论”，叫喊“勿侵略文艺”，文艺不要“堕落”成为“政治的留声机”，否认文艺有阶级性，主张文艺脱离政治。他们的矛头不是对着国民党，而是对着我们党和左翼作家。“左联”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瞿秋白同志在受王明路线迫害下，仍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进行战斗。他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指出：“新兴阶级要革命，同时也就要用文艺来帮助革命”，“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的‘留声机’”。秋白同志明确地指出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自由，必然要受一定的政治势力、政治倾向的支配和影响。在这场斗争中，左翼作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更自觉地把自已的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服务，大大提高了革命文艺的战斗力。

在这些斗争中，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胡乔木等左翼作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翻译了许多苏联作品，例如：《毁灭》、《十月》、《高尔基创作选集》、《母亲》、《铁流》等等；写出了大批革命文艺作品，除了许多出色的短篇小说以外，有茅盾的《子夜》，夏衍的《包身工》等；在话剧方面，田汉、夏衍、洪深、阳翰笙、于伶等活跃在戏剧和电影战线上，做出了不少成绩；聂耳、冼星海的歌曲激励了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热情。左翼作家还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艺作家作为左翼文化的同盟军和战友。左翼作家的大量作品中揭露了封建军阀的混战，农村经济的破产，帝国主义的侵略，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勾结剥削压迫工人农民的罪恶，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和要求。

一九三二年以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比以前更加严重了。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缔结了一个秘密协定，国民党的特务可以在租界上逮捕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以至党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被迫迁往苏区。但文化界的组织破坏较少，工作还有发展，为什么呢？这同瞿秋白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一九三一年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秋白同志被撤销了政治局职务以后，也就是受王明路线迫害以后，参加了“左联”的领导

工作。据夏衍同志回忆，秋白同志能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注意防止“左”的错误，因此工作做得踏实。有两个例子：第一，秋白同志指示夏衍、钱杏村、郑伯奇等，走出左翼的小圈子打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例如“明星”、“联华”、“艺华”等我们实际控制了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同时还在上海销路最大的报纸，如《申报》、《大晚报》、《时事新报》等开辟了电影批评的阵地，甚至连国民党办的《晨报》上“每日电影”副刊也是实际上由我们党员主编的；第二，争取法国商人办的百代唱片公司的负责人，把我们在电影中的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当时象《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渔光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制成唱片，广泛发行，很快在上海及其他各地形成了一个救亡歌咏运动。这两件事说明了在秋白同志领导下，注意利用公开合法机会，既掩护了我们的同志，保存了组织又开展了革命活动。

总之，这个时期，尽管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但革命的文艺斗争仍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个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

在王明路线统治的四年当中，在白区广大党员、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斗争，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党中央的路线错误，使党在白区的力量，不仅不能巩固和扩大，反而越来越小。一九三一年底以后，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强调公开活动，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团体不断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我党的破坏，比前一时期大大增加，不仅党的下层组织，党团领导机关破坏也较严重。另一方面，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力量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大加强，对我党的破坏采取了更加狡猾阴险的破坏手法。例如，利用叛徒搞“现身说法”进行诱降，迫使被捕人叛变，派遣奸细，打入我基层组织，而后逐渐深入到领导机关等等。而我中央保卫机关在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以后没有在敌人特务机关建立重要的反间谍工作，对敌阴谋计划不能及时掌握，因而造成党组织的更大破坏。

一九三三年初，党中央机关在上海站不住脚被迫迁往江西苏区。同年三月至五月，著名的工运领袖罗登贤同志（上海执行局书记）邓中夏同志（互济总会党团书记）先后被捕牺牲，江苏省委机关大部被破坏，工作停顿。

一九三四年以后，敌人对我党破坏更加疯狂，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定期破坏，主要针对党中央局及主要负责人。但当时中央局的负责人不研究被破坏的经验教训，找出原因，提出对付办法，同时对敌人的奸细活动毫无警惕，以致最后被敌人彻底搞垮。到一九三五年底，上海中央局组织全部垮台。党在白区的组织只剩下上海文委、河北省委、香港海员组织以及四川的个别同志了。

第五段 遵义会议后到“七七”抗战

这一段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和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白区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

瓦窑堡会议后，为加强白区工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中央派刘少奇同志担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的任务就是：指导华北党的工作，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党的新政策。

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后，总结了过去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整顿和恢复华北党的组织。在领导开展白区工作的同时，连续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关于白区党与群众工作》（白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刘少奇同志提出了党在白区工作一整套正确的策略方针。

刘少奇同志领导华北白区工作卓有成效的几个方面的工作：

1、在华北利用公开和半公开刊物，写文章、写信、答辩等多种形式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残余。

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左”倾路线对白区的统治比苏区的统治时间长。遵义会议后，白区仍然是“左”倾路线统治着。这种“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的‘左’倾路线是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障碍，不克服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不能贯彻。”

要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就必须对广大党员进行宣传教育。北方局办的《火线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出版了四五十期，发表了刘少奇同志《肃清立三路线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等文章，这篇文章取得最大多数同志的赞成、拥护，从原则上粉碎了“左”倾关门主义路线。

与此同时，在领导群众斗争中，刘少奇同志纠正了许多冒险主义的过“左”行动。例如，北平学生举行的郭青“抬棺游行”，这是少数先进分子的冒险行动，不听学校当局（向官厅交涉抚恤郭青家属及开追悼会）劝告，而要非法的秘密的，突然推倒学校墙壁，抬着郭青的棺材上街游行，结果被警察打得落花流水。少奇同志批评了这种陷自己于孤立地位的冒险行动，责令党员进行善后工作。

一九三六年三月，北平学生在罢课与游行中，又提出了“长期罢课”的口号，强迫不愿罢课的学生罢课，反对人家读书，骂人家为落后分子，刘少奇同志批评了这种过“左”行动。

当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刘少奇等同志分析了宋哲元等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表现动摇，不甘当汉奸卖国贼，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说服群众把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与此同时，北方局还派人做宋哲元的工作。从此以后，群众抗日运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可能性。有一

次，游行群众正遇宋哲元汽车，学生送一张传单给宋看，宋看传单上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含笑而去。

在批判与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中，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积极性，有力地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2、经过各种方式广泛发动群众

组织成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以及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并由华北救国团体发起，派北平学生到上海，和上海的暨大、大厦、交大等学生共同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了许多小册子，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戏剧队、歌咏队、下乡工作队等，对广大群众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与此同时，组织群众抵制日货，反对走私，进行反对日寇侵略的示威游行，组织学生请愿、罢课以及组织工人进行经济、政治罢工等等，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

在这些工作中，刘少奇同志巧妙地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使党的秘密组织和秘密工作与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组织和工作，有清楚的划分又有适当的联系，使党的组织隐藏在广大群众中，并且有了一定发展。

3、为争取华北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战，刘少奇等同志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主要通过三种方式：①进行上层统战工作。对上中层军官通过各种关系进行联络；②向国民党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取得军队同情；③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对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转向抗日，是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这一段华北地区党的白区工作，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获得了很大的进步与成功。各地方党组织基本上恢复了，平津两市党的组织与工作大大加强了，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工委及华中华南若干组织，党在军队中的组织也有发展。这些成绩是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到“七七”事变前，华北已发展到五千多党员。同时，经中央批准，从国民党监狱中挽救出来几十名高中级干部，大大加强了华北党的领导力量。

再讲一点上海的情况

上海党组织在一九三五年失去了统一领导，同中央也失掉了联系，分头独立活动，例如，未遭彻底破坏的文委，由胡乔木、周扬等同志领导八个联盟（社联、左联、教联、剧联、音联、影联、文联、美联）活动。工联，只保存了纱厂、绸厂、码头、海关等零星组织，由马纯古等同志领导。

这些同志虽得不到中央直接领导，但他们通过几个渠道获得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一些指导精神。例如：（1）北方局出版的《火线报》传到上海，他们看到了刘少奇同志的文章。同时，北方局还派干部来上海帮助工作。（2）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大量奇采上海，间接地传达了中央政策精神。如“八一”宣言，就是通过《救国报》先传到上海。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通讯》也在上海发行。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也有所反映，这些都推动了上海工作的转变，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3）通过个人通讯传递

消息。例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就是周扬同志从史沫特来那里看到的。他们感到再搞“左联”太窄了。夏衍同志写信问当时在苏联的肖三同志，肖三同志复信说，应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委”系统的同志积极领导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活动。1936年春，上海以“文委”为中心组成了“临时工作委员会”，不仅领导了上海，还和江苏、浙江、南京、无锡、华北等地建立了工作联系。

1936年春，中央派冯雪峰同志到上海联系开展工作。

1937年5月，中央派刘晓同志到上海正式组成了江苏省委，审查和恢复了党的组织。从此，上海党的工作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

二、白区斗争策略方针上的几个问题

1935年以前，白区的党员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英勇斗争，但是为什么党的力量损失那么严重，这就要检查党在白区的策略方针是否正确了。

就全党来说，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应该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到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城市工作配合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是毛泽东等同志从实践到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并没有认识这一问题，坚持以城市为中心，这是革命遭受损失的教训之一。这点，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指出，三次“左”倾路线统治的中央，“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这样，不是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是以当时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但是，白区工作损失如此严重，是不是只总结这一条教训就够了？这是不够的。我认为主要是白区工作本身斗争策略上的错误造成的。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如果斗争策略正确，也不会损失如此严重。

党在白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什么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这是1945年，中央在经过全党整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党在白区的工作方针。

这个方针指明：

1. 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强大的敌人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党在城市的工作必须采取防御为主；
2. 在城市中要尽量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去工作，以便保存和巩固党的组织，争取群众，积蓄力量；

3. 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

《决议》明确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城市和乡村的联系是城市配合乡村,而不是以城市为中心。

根据《决议》,我们研究一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区斗争策略上的几点经验教训。

(一) 关于保存和巩固党的组织问题

列宁指出,革命政党在革命高潮时期,它们已经学习过怎样实行进攻;在反动时期,他们应当学习怎样正确地实行退却,怎样转入秘密状态,怎样保存和巩固秘密党,怎样利用公开机会,怎样利用各种合法组织,特别是利用合法群众组织来巩固自己与群众的联系。

我们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受压迫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相比是有过之无不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当时还可以参加国家杜马,而中国共产党毫无合法权利,无议会可以利用。在那种极端黑暗的反动时期,党如何实行正确的退却,保存和巩固秘密的党,这是争取群众、开展党的工作的首要问题。但对这个问题,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央是认识不足的。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六大之研究》中,讲到白区如何保存党的组织问题时说,当时“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的密切,领导机关的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像列宁所说的这时党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关于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的最多就是好党员,如果谁要坐下研究一些问题,那就当作坏党员看。”这段话说明党在当时还不懂得如何实行正确的退却,如何保存与巩固秘密的党。这样,“八七”会议上虽然提出,现时组织上主要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而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八七”会议后,也开始建立了党的秘密工作,但是,中央没有着重提出来使党转变为秘密党,没有提出保存与巩固党的组织是党在白区的基本任务。因此,盲动主义一来,就使原来保存下来的组织和新发展的组织都受到破坏。这在几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都有这个教训。

(二) 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

“六大”提出党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这是正确的。但如何争取群众,如何积蓄力量,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下边讲三个问题

1. 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问题

在反动统治时期,我们党没有丝毫合法地位。党要存在、要争取群众、要积蓄力量,就必须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虽然党没有合法地位,但是每个党员个人在不暴露党员面目的条件下,还是有可能参加各种各样的合法的活动,深入到各个领域与广大群众保持联系,进行争取群众的工作。

刘少奇同志指出,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这对于一个秘密的党是极端重要的事情。因为(一)每一个这样的团体机关和刊物,都可以成为党在群众中的重要支点和堡

皇；（二）党只有经过这样的方式，才可能与比较广泛的群众保持联系，并教育他们；（三）也只有采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更多的保存与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并且能够在群众中不断的去建立党的后备的组织。”

列宁说：“现在与其说是在党的其他部门内合法可能性问题，不如说是怎样去利用现有的合法可能性、对于党更为有益。（《列宁全集》十四卷95页）

前边已经讲了，党的“八七”会议、“六大”、六届二中全会决议都提出过利用合法斗争形式问题。党在白区工作中，凡是注意了利用合法形式进行斗争，许多工作都取得了成绩。

但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不懂得白色恐怖下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重要性，不懂得这种合法可能机会愈少，就愈值得秘密党重视的去利用。形势稍好一些，他们就被胜利冲昏头脑，什么利用合法，好像他已经是合法的了，强调公开活动，强调赤色工会独立领导等等，形成了盲动主义、冒险主义。

刘少奇同志在“二战”后期的几篇文章中，总结了过去白区工作中在利用合法斗争形式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利用合法斗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特别是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提纲》一文中，刘少奇同志根据九年来职工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职工运动中如何利用合法去争取群众的一些重要的策略思想。这就是：

（1）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工厂法、工会法，是用来反对工人阶级与束缚工人群众斗争的，应该反对。但是，也可以利用。因为国民党为了欺骗工人阶级，就不得不在这个法律上规定了一些对改善工人阶级现状有利的条文（如在某种条件下允许工人组织工会，规定了比现在较少的十小时工作时间，星期日、纪念日休息，对工人疾病、年老死亡的抚恤救济等）。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对工人现状有利的条文，组织工人斗争，要求实现那些条文上所规定的利益，同时可以揭破国民党的欺骗，这样有利于争取群众。但是，王明路线时期对工厂法、工会法采取绝对反对的态度，提出“反对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实现苏维埃劳动法”的过“左”口号，不仅不能争取群众，反而孤立了自己。

（2）不仅是工厂法、工会法我们应该利用，就是其他形式的群众运动，例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纪念节等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例如，唐山工人利用新生活运动，要求开窗户，设澡堂、发新衣等得到了胜利。利用这些运动，一方面可以使工人得到某些改进现状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得到公开活动的机会来领导工人斗争，便于争取群众。

（3）对国民党黄色工会。有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领导工人参加其一切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斗争；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也要加入进去，利用它的公开招牌和地位去团结与组织工人。

（4）没有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灰色的名义（如同乡会、青红帮、戒烟酒会等）去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在我们采取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取消秘密的赤色工会，在各级党部内，建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

(5) 在没有组织的工人中，如果条件允许，应该依照国民党工会法的规定，公开成立新工会。我们不应该放弃这种公开组织工会的机会，即使要受国民党各种严格的束缚，只要有可能，我们都去利用这种机会。

2. 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问题

刘少奇同志说：“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两种方式，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表现形态。”“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方式之合法与非法，是党与革命阶级的活动方式之公开与秘密的标准和尺度。即合法的活动一般是能够公开的，而非法的活动一般是不能公开的，即是需要秘密的。”

为了保存与巩固党的组织、广泛地争取群众与积蓄力量，就必须把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的群众工作完全分开，采取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并使二者在严格的规定之下联系起来。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批判俄国的召回派时指出：“假使布尔什维克党在最激烈的斗争中，不能保持联结秘密与公开的斗争形式之职责，不能负责参加最反动的国会及受反动法律所限制的各种组织（如保险储金会等），那么，他们在1903—1914年间，就决不能保存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中坚，自然就说不到巩固和发展了。”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如果不学会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就不能在反动时期保存和发展党。

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常常是混淆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例如，要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与刊物，提出和党一样的非法的纲领与口号，用党一样的非法的态度、言语、作风与工作方式去进行工作，使这些公开合法的团体变成第二党。为什么呢？他们错误地把“不应将就公开而降低党的纲领和口号”的提法，搬运到公开合法的群众团体与刊物上去。认为不在公开合法的团体和刊物上提出党的纲领口号，就是降低了党的作用。

他们经常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混淆重复与等同起来，使秘密机关的负责人去兼任公开机关的职务，他们上午在公开机关办公，下午就到秘密机关办公。使许多可以公开组织的群众团体和工作都秘密起来，并且重复党的工作方式，无限制地扩大了秘密机关。又在党的刊物上登载党在群众中的各种秘密活动，这就大大便利了敌人的侦探和奸细，给敌人以无数的破坏党的机会。在完全取消公开工作与把群众团体也秘密起来之后，党的秘密工作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这样，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与群众组织都同时被破坏。

刘少奇同志在《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等文章中，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秘密工作的规律，指出，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配合起来，“对一个地下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错误，不独不能使党在秘密条件下有效的准备革命，而且要使党的保存与巩固成为不可能。”

3. 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问题

要争取群众以至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就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下，广大工农群众首先是就业吃饭问题。因此，要争取群众，就不能忽视经济斗争，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领导工人斗争时，要以工人的日常经济要求作为动员工人的口号，同时也要对群众进行反

帝反国民党的宣传教育与动员，并使这两种斗争结合起来。例如，尽量动员工人进行劳动立法运动，要求修改工厂法、工会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工会权利、失业救济等等；在农村中，也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提出土地革命口号的同时，也要为改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而斗争，这样才能争取和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

但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常常是忽视经济斗争。虽然他们也提出来过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而实际上往往是强调政治斗争、政治罢工。“常常是为纪念节而罢工游行，虽然在这些罢工游行中，严重的损失了我们的力量也不顾惜。”例如，在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为“拥护苏联”而罢工游行。拥护苏联并不错，但很多群众并不懂得拥护苏联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有什么关系，这就影响了群众斗争的积极性。但是，“左”倾路线的领导“常常以‘发动斗争’为满足，而不管斗争的胜败、结果及其影响如何？”由于这一切错误领导的结果，使白区斗争常常失败，甚至是悲惨的失败，怎么能够积蓄力量呢？

（三）关于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问题

正确的策略原则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在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同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

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懂得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把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推到敌人方面去，实行关门主义的策略。在工人运动中不愿意与各派工人领袖实行统一战线。

他们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不懂得分别主要与次要敌人，而是提出打倒一切敌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在朝在野的反革命派。结果，一切打不倒反而孤立了自己。

我认为，由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领导白区斗争策略上的错误，使党在白区遭到了如此重大的损失。

最后讲两点体会

一、一条正确路线、一个正确工作方针的形成，认识都不是一次完成的，也不是一个人完成的，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有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党在白区正确策略方针的形成也是如此。

党在白区正确的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六大”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中，曾明确规定：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若想政治斗争得到胜利，那就只有用经常的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斗争的办法动员了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之后。”决议案提出了“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这就明确了在职工运动

中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要利用合法的斗争形式去争取群众。

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进一步贯彻了“六大”决议的精神，但同时又提出要扩大赤色工会运动，这是过左的口号，虽然也提到“赤色工会的组织在秘密活动之下是很难有大的发展的”。但又说：“必须利用社会一切公开或半公开的可能性与机会，使赤色工会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之下，扩大它的组织与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党没有经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左”的急躁情绪。

六届二中全会以后，“左”的情绪继续发展，形成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边已经讲了。

刘少奇同志在1931年领导职工运动中，总结了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发展了“六大”决议的正确方面，主张尽量利用公开合法形式，参加黄色工会中去争取群众，在没有组织的工人中公开组织工会；主张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主张罢工要讲究斗争策略，反对不顾主客观条件去搞冲厂罢工等等，但这些正确的策略思想并没有为当时中央所接受。

遵义会议树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后，少奇同志被派往北方局领导白区工作。这时，少奇同志总结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写了不少文章，论述了白区工作的策略原则，就是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概括的：“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1927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1924年到1927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隐蔽力量，深入群众，‘聚集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斗争逐步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这是1936年以后刘少奇同志的几篇文章概括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刘少奇同志在1935年以前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正确的策略思想已经基本形成。至于，在全国来说白区和苏区关系，全党工作的重心放在哪里？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个问题，当时少奇同志也还不是很明确。因为他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还说：“就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而中央在白区的工作就没有重要的成绩可说。”后一句是对的，但前一句也反映了对白区和苏区的关系的认识还不是很明确。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1930年左右就比较明确地解决了。

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全面论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城市工作的关系。指出：“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

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的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党在城市的工作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敌人长期占领的暗黑的城市和暗黑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和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0年，在《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1945年，经过延安整风，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白区工作的策略方针。

二、白区工作也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

各次“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错误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也是分不开的。仅以职工运动为例也可以说明。

在共产国际指导下通过的“六大”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以后为什么又出现错误了呢？这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分不开的。

1929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秘书处《关于中共在职工会里工作问题的决议》中，对中国职工运动形势作了过左的估计，说“中国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增长起来……罢工往往带着鲜明的政治性质”。要求党对工运工作的领导，“必须立刻实行一个转变”。提出：“应该用一切方法去发展赤色工会，使赤色工会变成真正的群众组织”；要求“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党内各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倾向，这种取消主义倾向是右倾危险和十足机会主义表现……赤色工会是革命运动的基础，只要有良好客观条件，就应当到处扩大起来。”这是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错误决定。《决议》指出，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应当参加，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就不应当参加，这也是不对的。还提出，“因为工人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应当提出使赤色工会公开起来的问题。”这都是过“左”的要求。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中，认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时期”。提出中共在工运中的任务是：“在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候，必须紧张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政治罢工的方针”。

1930年1月，中央通过了《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检讨“赤色工会数量的微弱”，“党过去在黄色工会中策略的错误”。在目前主要任务中，提出“有计划有准备的去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罢工。党需全力发展政治罢工，立定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计划”，“在工人运动中，同时要以建立赤色工会与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成为经常而又切要的任务。”强调了政治罢工。从此，中央就一直讲工运中存在“黄色倾向”的错误，提出工运中新策略是“以赤色工会纲领与黄色工会纲领对抗，在黄色工

会内组织赤色工会支部，独立领导群众斗争”。从此以后，在工运中利用合法，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的就不提或少提了。

1930年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中提出“准备总政治罢工”“采用各种方法来发展和巩固赤色工会，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王明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完全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的。

由于立三路线的贯彻，使党的组织和赤色工会遭到很大破坏，共产国际不是帮助中国党总结“左”倾冒险主义的教训，而在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又提出“党应该重新建立和巩固赤色工会”，“加紧赤色工会的工作，特别是赤色工会对于罢工运动的领导”等等过“左”的口号。1931年11月，王明路线的中央通过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中，提出“保证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完全执行”。这个决议强调“用种种方法使罢工政治化，使经济罢工转变为政治罢工”、“努力扩大赤色工会的组织”、“在黄色工会中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等等。王明路线比立三路线表现更“左”。

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情况，主观臆断，以“老子党”自居，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瞎指挥，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也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跟着指挥棒转。结果，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更惨，教训是深刻的。

这个发言非常肤浅和粗糙，欢迎在这方面有研究的同志多提意见。

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几个问题

常 东 人

(根据录音整理)

我的发言，准备说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就是：

- 一、关于百团大战的问题
- 二、关于抢救运动的问题
- 三、关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问题
- 四、关于土改和整党的问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问题很多，为什么要说这四个问题呢？这四个问题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系统，也没有一个中心，所以只能叫做“几个问题”。我之所以想说说这几个问题，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一方面是有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给搞乱了，或者是当前在认识上还不统一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在过去的党史研究和教学中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问题。基于这个考虑，我选择了这四个问题，并不是说这四个问题最重要，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我接触的资料有限，思想理论水平很低，四个问题可能都说不清楚，肯定有错误、不恰当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下面就上述四个问题，说点情况和看法。

一、关于百团大战的问题

百团大战是1940年华北几十万军民与日伪浴血奋战，震动中外的一件大事。从投入这一战役人数之多，地域之广，战绩之大，影响之深，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是过去在一个相当时间内，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个领导人出了问题，凡是和他有关的历史事件都成了禁区，谁也不敢再去接触它，似乎历史事件可以因人而消失一样。林彪垮了，平型关战役就从历史上抹掉了；彭德怀被批了，百团大战就从历史上消失了。或者就只能用批判的办法、否定的办法来提到它。结果党的历史面貌全非，带来极严重的后果，影响极为恶劣。怪不得有的人就说，抗日战争看不到共产党是怎么打日本的，共产党打了平型关战役和百团大战，还都打错了。

百团大战是党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对它的评价，认识不一致，争论比较大。乔木同志关于党史编写、党史宣传的四点方针性意见中的第三条，就是讲对党

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要作出正确的客观的叙述，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尽管是困难的事情，也是党史工作者无法回避、不应该回避的事情。

对这个问题，我想从两个方面说点情况和看法。

第一、从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看百团大战。

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党中央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了战略方针为三条：第一，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第二，把扩大红军与准备对日作战结合起来；第三，把红军的部署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现有革命根据地两个任务方面。红军的行动与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方向放在黄河以东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党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放手发动农民群众的全民族的抗日路线，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原则的指示，说今日红军的拿手好戏，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这个方针就是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完全同意彭德怀在18日电中说的：“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的观点。

9月25日，毛泽东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全华北党（包括山东）要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织游击队。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就是游击战争。

10月16日，刘少奇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它论述了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的组织与发展反日游击战争。论述了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和胜利的可能；论述了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

1938年4月21日，党中央根据抗战以来经验，不仅在山地，而且可以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泛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因此发出了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在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为主要的方式。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根据华北、特别是河北和山东游击战争的经验，指出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是能够克服敌情严重的各种困难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

1938年5月14日，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强调要深入到敌人后方去，在大江以南创建游击根据地，态度上要主动、积极、大胆的向外发展，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大体是三种地区：一是山地，二是平原，三是河湖港汊地区。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7月初又在给首届参政会的贺电中提出扭转时局的三个坚持，即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

1939年12月9日，党中央曾发出在山东全境及华中发展数十万军队，组织数百万自卫军的指示。

1940年1月28日，党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山东、华中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其中指出：山东和华中要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1940年一年内，山东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15万人、枪，中原局至少发展到10万人、枪，按此大概目标具体分期实现。为此，必须发展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15万军队至少须有150万至200万自卫军，华中有10万军队至少须有100万至150万自卫军。为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综合上述，可以明显看出，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包括：（一）在发展方向上是在日本占领区，在敌后，而不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不是在日寇和国民党交错的地区。（二）在敌后发展的地区上，首先是山地，其次是平原，第三是河湖港汊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出现三种情况，一变成根据地；二变成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游击区；三仍被敌伪统治着的占领地，即敌占区。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就是极力扩大第一、二种地区，极力缩小第三种地区。（三）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关键是人民群众的发动程度、组织程度和武装程度。（四）战争形式是人民游击战争。所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是指真正有人民群众基础，有根据地为依托，而不是依附于国民党的什么游击战争。

百团大战是否违背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呢？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去责难百团大战。比如说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就是游击战，而百团大战打的是运动战，因此百团大战就打错了。又比如说，1940年是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应当是战略防御，而百团大战“超过了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如此等等。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对于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片面的、机械的理解造成的。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党中央不是这样看法，而是恰恰相反。举例来说，1940年9月10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这个“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是这样说的：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则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并在山东和华中继续扩大我军之数量，而给予二百万友军及国民党大后方与敌占区千百万人民以良好之影响，给予敌人向重庆等地进攻计划以延缓的作用。

因此，说百团大战违背了中央军事战略方针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百团大战打的是以运动战为主，以破袭交通线为重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党的战略方针、战略指导原则应当改变。即今后逐渐走上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把交

通破袭战提到战略地位。如果作出这样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1941年7月，中央军委的一个文件指出，新四军的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认为，目前在敌后作战是处在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下，武器不及敌人，我们对敌战略方针，仍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运动战的机会，打击敌人。同时如果为着战略配合任务，经常进击敌人交通干线，造成敌寇大举扫荡，增设据点封锁等，也是值不得的等意见，是完全对的。

第二、百团大战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

1940年7月7日，党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强调当时中国的时局是两个“空前”，一是“空前投降危险”，一是“空前抗战困难”。任务就是“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与此同时，毛泽东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说：“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又说：“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

百团大战的发动既不违背党中央对时局的论断，也不违背党中央对任务的规定。在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签发的预备命令，这个命令的内容，主要指出：

①形势日益严重：一是由于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滇缅路封锁禁运)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又有敌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线的消息，因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二是敌寇依靠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大占领区，增多据点，封锁和隔断我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

②决定我军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打击的主要目标是破袭交通线，重点是彻底破坏正太路，并拔除铁路沿线两侧若干据点。

③发动这次战役的时机：乘夏季青纱帐旺盛和雨季时节，乘敌人对晋察冀、晋西北和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路敌人守备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

④发动这一战役后的目的：一是破坏敌人进攻西北的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二是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打破敌人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有利的发展。8月31日扩大战果的命令又提出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彻底毁灭同蒲路之忻县至朔县段，争取使晋西北、晋察冀和晋东南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

百团大战最初并不叫百团大战，八路军总部最初也没有设想要打一个百团大战。彭德怀称它为“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这一战役名之为“挖心战”。

在1940年7月初，当八路军总部决定打这一战役时，也还是设想组织一次大破袭的战役行动。打算7月上旬开始准备，8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开始行动，进行大破袭战。7月22日的预备命令，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129师八个团，120师四个团)。8月22日，由于统战关系，以朱、彭名义向蒋介石、卫立煌、阎锡山发了一个电报，讲这一次战役行动。这时统计了一下我们参战部队有105个团(彭总讲是104个团)，所以当时左权副总参谋长称这个战役为百团大战，发表战报时也这样称呼。最后各军区战史统计的结果是115个团。这些统计不一定很准确，可能有重复统计的地方。在使用兵力的人数上，有讲40多万，也不确切。大体上没有那么多人，可能是20多万到

30万人。因为那个时候咱们部队，一个团很大的有3500人，这是很少的。一般主力团是3000人，地方团是2000人，1000多人，1000人以下的团也有。因此只有参战的每个团都是3500人，115个团才可能是40多万人。实际情况不可能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原定二十二个团兵力的战役会打成百团大战呢？当时情况是这样：

在发动这一次战役之前，敌人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从1940年3月前后至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当时根据地只有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在我手里，其余都丢掉了。而发动打这一战役是打交通破袭战。当时任务是这样分配的：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即北岳区）是从石家庄起至芦沟桥，娘子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但是也估计到破袭战开始后，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所以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先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封锁沟墙。因此在战斗打响并取得一些胜利之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仓惶撤退时，都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奋起追歼敌伪。这说明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

发动这个战役有的说是1940年7月下旬决定的，看来也不一定很确切。根据彭老总的材料看，至少是7月上旬或7月初决定的。因为“八路军总部决定7月下旬开始准备”，因此关于7月22日的预备命令，是在已经开始准备的过程中发出的，并不是发了预备命令才开始准备的。由于各区部队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为了防止敌人发觉，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在彭德怀《往事回忆》的关于百团大战部分，编者所加的时间界线是“1940年7月至12月”，文中是这样说的：“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后各交通线进攻”。“7月22日，各区便很迅速地准备完毕，因而在未得到军委批准前（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百团大战从40年7月下旬开始到12月5日结束，在战线长达五千余里的广阔地区，经历了破袭交通线、扩大战果拔除敌人据点和反扫荡三个阶段，歼灭敌人46000余人，破坏敌人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一度收复县城四五十个，最后巩固下来的县城有二十六个以上。它对于提高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于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粉碎了它企图迅速解决中国战事的梦想。它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的反共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它加强了部队的战斗锻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它的巨大胜利和重大意义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是在于如何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对待它的缺点和错误，吸取有益的教训。

彭德怀是百团大战的主要决策人和指挥者，他多次说过，百团大战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次战例来研究，当然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的。对于这个事件的一些批评，他也肯定“其中许多意见是对的”，是接受了的。他自己也作过多次检讨，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的。但是他对庐山会议后的一些批评有意见。1961年他向中央写的申诉书，过去叫八万言翻案书，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说到庐山会议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

扩大会，有人竟把那次战役坚持说成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江青等操纵下成立了什么“批彭联络站”，戚本禹煽动抓“活海瑞”，把彭德怀弄到北京航空学院去批斗，打得肋骨挫折，所谓“重点突破”的问题就是百团大战问题。一个经过精心物色和培训的“老干部”控诉什么百团大战对当时革命大好形势的破坏，招致了日寇何等疯狂的扫荡，造成了何等悲惨的情景。要他“认罪”，彭德怀愤怒地说：“我有罪，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兵！”就昏倒过去了。

在彭德怀过着失去自由的“囚犯”生活的时候，他写了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的材料（基本内容，在《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辑，以彭德怀遗稿《往事回忆》发表了），他严正驳斥对百团大战的恶意攻击。这个材料中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恶意攻击百团大战。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百团大战是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打的，而不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打的，那么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是谁造成对八路军、新四军那样多的惨案呢？甚至还有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对人民解放区前所未有的进攻，也是由于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使蒋介石过早警惕。这些人是健忘呢，还是有意违反历史事实呢？1927年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马日事变’，这又是谁在预先暴露了力量呢？谁在‘四·一二’事变前打过百团大战呢？蒋介石打过十年内战，在十年内战爆发以前，又是谁打过百团大战呢？肯定回答，没有人打过百团大战。那么，蒋介石集团为什么要打十年内战呢？这是它这个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的。”有人说百团大战，招致了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疯狂扫荡。彭德怀在被批斗的会上就提出：“我请问，‘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北是谁招致来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又是谁惹恼了侵略者？我再请问，日本鬼子对我国同胞惨无人道的烧杀，难道只是在百团大战以后才开始的吗？”彭德怀多次检讨，承认错误，接受批评，承担责任是一回事，他说：“我自己犯了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点上我是清白的”。但他对于搞鬼的人，一口否定百团大战的功绩和成就的人，他是愤慨的。他说百团大战对于振奋我们民族抗战必胜的信心，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是有功的！”“功在我们党，在万千八路军战士，烈士的鲜血决没有白流！”

在百团大战中，彭德怀是有错误的。在他写的材料中说，百团大战是经党中央批准的，当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时，党中央、毛主席有贺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9月10日，党中央关于时局趋势的指示和军事行动的两个指示，说到尤其是华北百团战役，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冀。并要求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对于华北几十万军民与敌奋战，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说它是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怎么可能呢？而且打日本，消灭日伪军，又不是搞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诡计，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又有什么必要呢？所以这种说法纯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问题只是在于7月22日的预备命令，下发各区，上报军委，为了防止敌人发觉，故未等到军委批准，就提早发起了战斗，这是不对的。在这一点上，彭德怀是承认的。

但这个问题同背着党中央、毛主席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彭德怀承认百团大战前由于对日军进攻的意向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因此在选择战役的时机方面不完全恰当，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是负有责任的。他说：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就截断了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更没有估计到日本法西斯打通粤汉路，是为了便利进行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看破了敌人这样的战略企图，那就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待日军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然而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虽然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是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的时间，而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了蒋介石的作用。由于进行了这次破袭战役，迫使日军从华东、华中调回了两个师团的兵力，加强了对我华北根据地之进攻。特别是太行山区，在敌人的三光政策下（这个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在1939年夏就提出的），人民遭受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这就是说对日军的动向判断上有错误，这次战役发动的早了一些，晚一些发动效果可能更好。至于说减轻了当时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在客观上是起了援助了蒋介石的作用。这也是事实。但由此推断百团大战在政治上是投降主义，却是完全荒谬的。整个八年抗战，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两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两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这难道不是减轻了日军对蒋介石的压力，客观上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吗？当然是的。但谁也不会把这和政治上的投降主义联系起来。打击了日寇的侵略，倒成了政治上的投降主义，那么不打日寇，“游而不击”，反倒成了政治上的马列主义，中国人没有这样的逻辑。

第三、彭德怀承认在破袭战役后期，“我也有些主观”。

他说：此役在太行山区破袭时间搞的太长了一些，连续搞了一个月，没有争取时间休整，敌伪军即行扫荡。在敌军扫荡时，日军一般的一个加强营附以伪军为一路。我总想寻机歼灭敌军一路，使下次扫荡不敢以营为一路，就可以使扫荡时间间隔距离扩大，有利于我军民机动。我这一想法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因部队太疲劳，使战斗力减弱了，使129师伤亡多了一些。在百团大战中，共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其中日军二万一千多人，我军伤亡一万八千多人。这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是没有的。我们打的平型关战役歼敌不过三千多人，国民党打的台儿庄战役，歼敌也不过七千多人。这一战役敌我伤亡的比例是2.6比1；如果这个比例和八路军历年伤亡比例比较的话，我军伤亡的比例是不算高，而是偏低的。敌我历年伤亡比例是：抗战第一年是3比1，第二年是1比1；第三年是1.8比1；第四年是1.2比1；第五年是1.3比1；第六年是4比1；第七年是5比1。七年总平均是2比1。因此，作为总结经验，可以说百团大战在后期还有犯主观毛病，指挥上有失当的地方，是可以的。搞得好的我们的损失会更小一些，胜利更大一些。但说它军事上是冒险主义是不妥当的，不符合实际。这个战役在后期，确实有打红

了眼睛，硬打硬拚的问题，不适当的把攻占敌人据点作为主要目的，强调阵地攻击战，打了一些消耗战，想把几个根据地联成一片，要求是多了些也高了些。因此所付出去的代价也多了些。这些教训是应当吸取的。

百团大战以破袭敌人的交通线为核心，这是打中了敌人的要害，交通线也就是敌人统治的生命线。交通破袭战打的是成功的，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但是对交通破袭战也是应当分析的，也是有经验可以吸取的。比如在百团大战结束后，中央军委在1941年1月关于交通战的指示中就指出：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华北敌后敌人费尽力量，修堡挖壕，设护路村，派巡查车以护路，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越多，敌人守备也越强，结果我之交通联络亦愈不便，但某些道路（如沧石路）则因我之坚强破袭而停修，又过去发动广大群众破路曾得极大成绩，惟因敌之技术优良，甚易修复，敌又强迫路旁居民修路，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兹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计，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而我无力控制者（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

二、关于抢救运动的问题

审查干部是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必不可少的工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也进行了审查干部的运动，而所谓抢救运动，实际是审干运动的一个阶段。

延安的整风运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1年5月（《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至1942年2月（《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演说），是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第二阶段是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是普遍整风阶段；第三阶段是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而审干运动就是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即普遍整风阶段逐步提出来的。下面说几个问题：

（一）审干运动是怎样提出来的

1942年2月普遍整风阶段一开始，当时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同志上书毛泽东，说什么共产党根据地是食分三等，衣分三色，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讽刺挖苦，挑拨离间。3月13、23日，王实味（中央研究院）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两篇文章，用党“蜕化”的说法，煽动青年反对老干部，用政治家“灵魂肮脏”的说法，鼓动艺术家改造政治家。6月，中央研究院开了反王实味思想斗争大会，9月，又对王实味的五人反党集团进行了斗争。在此期间，毛泽东7月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上提出在整风中要注意反特斗争问题，但策略上是等思想斗争深入以后再提出来。到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中宣布，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半条心），并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务斗争。

因此，在整风文件学习中，特别强调反对自由主义，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社会关系调查，规定每人写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并从思想反省、历史反省，展开坦白运动。

即号召干部向党报告自己一切隐瞒的秘密和所做过的违反党的利益的事情，以及别人的隐秘与反党的行动等。

从1942年2月开始至12月，提出了审干反特的问题，为清查坏人作了工作准备。从12月开始就正式转入审干，即清查内奸、反特务斗争。

（二）审干运动的发展情况

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2年12月——1943年4月10日）其特点就是由秘密的少数机关、少数人搞的。审干开始后，康生在西北公学搞试点。这个学校学生中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一部分是地下党员。康生用逼供信、车轮战等办法，搞出了许多所谓特务和特务组织。这个学校的兰州地下党员，被逼无奈，编造假口供，交代过关。他说国民党对我白区的地下党实行“红旗政策”，即用特务、内奸搞假共产党。甘肃地下党就是“红旗党”。而且说他本人就是被发展的一个特务。康生不问真伪，如获至宝，一口认定这是审查工作的一大突破，一面将此材料抄报中央，一面以此为资本，到处宣扬说“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共产党实行内奸政策的一个新策略，从而得出了大后方党组织靠不住，需“重新估计”的结论。并随即开展了追查活动，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下党的一些同志捕押到中央社会部审问逼供。

1943年4月初，胡宗南代表来延安，为了防止内部特务和他来往，就在4月1日晚上捕了当时认为有证据的案情严重的可疑分子两百多人。

第二阶段（1943年4月10日——1943年7月9日），其特点是由少数机关变为各机关学校普遍开展，由秘密转为公开的阶段。

在4月10、11、12日延安召开有两万人以上参加的干部会议上，由康生和其他领导人传达党爱护青年，争取失足者改过自新的宽大政策，并由已经悔过自新的所谓特务出来讲话，号召有问题的人迅速向党坦白。这样就使运动由单一的形式转入到多种的形式，如劝说运动、控诉运动、个别谈话、大会、小组会等等。结果，在这段时间里有400多人“坦白”了各种问题。

第三阶段（1943年7月9日——8月15日）其特点就是开展抢救运动。7月9日，陕甘宁边区开群众大会，揭露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会后进行示威游行。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作《抢救失足者》的讲话，强调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他提出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都要赶快觉悟，再不要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他说特务坦白了就得救了，并要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内战危险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去抢救他们。他在讲话中还把被逼出来的“红旗党”问题，当做典型材料加以引用，还把被逼交待“红旗党”问题的人带到大会上作典型示范。从此，许多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都被进行了追查和逼供。一个人被逼的顶不住，承认了，又去株连别人，这样越搞越多。康生在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抢救失足者会议，原来要开十天，到会议的第三天任弼时闻讯赶到会场，逐个的询问那些被批斗的青年干部有些什么问题，他发现连同特务一块坐过火

车的人也被整进去了，非常愤慨。他又亲自去看望那些被关起来受审查的同志，一个个询问他们的情况，并安慰他们不要急，问题总是会搞清楚的。然后，他赶到枣园将情况如实地向毛泽东同志作了详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很重视他的意见，立即召集会议，批评了康生，并取消了原定开十天的大会。虽然康生要开十天的大会没有开上了十天，但所造成的恶果是很严重的。

那时十天中搞出的特务超过前几个月的总和。最后把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许多省的地下党都诬蔑为国民党特务内奸政策制造的“红旗党”，把许多地下党员都打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内奸。康生在1944年3月29日《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讲演中，还说这次反奸工作创造了新的路线。劝说的方式有大会劝、小会劝、硬劝、软劝、苦劝、集体劝、个人劝等；斗争的方式有硬的、软的、虚的、实的、对质的、挑战的等。总之是想方设法，千方百计使你承认是国民党的特务内奸为止。所以大量的冤假错案都是这段时间造成的。

第四阶段（1943年8月15日——12月）这段时间的特点是，由机关内部审查干部发展为工农商学兵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现审干工作中的问题，于8月15日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一方面详细规定阐述了审干的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而反对逼供信、乱捉、乱打、乱杀主观主义的错误方针与方法。另一方面提出“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从此开始，运动就由机关内部审查干部发展成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动，由延安一地的反特斗争发展成全边区的斗争。1943年10月8日，经康生批转《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肯定绥德的方针、方法完全正确，推广绥德的经验，并要各中央局印成小册子，发给干部阅读。绥德的反特群众大会开了十天，参加大会人数2600人左右，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9月22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绥德群众大会情况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这段时间宣传：特务几乎钻进了延安及全边区的一切部门与一切地区，防奸工作主要的已经不是靠保卫机关来做，是靠各机关自己负责，是靠群众自己起来负责。

第五段（1943年12月底——1945年春），其特点是由坦白运动转到纠正偏差，进行甄别工作。1944年1月24日，中央关于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中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运动中已坦白的人，大致可分为六类，第一类是职业特务，是极少数，其中又有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第二类是变节分子，也是少数；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他党派，参加我党后没有向党报告，这类人占一定数目；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第五类是党内错误；第六类是被特务诬害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的人。其中第三、四、五类的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中央大体上的估计。根据这种估计和分析，中央指出要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遇有不是特务而误认为是特务者，必须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并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同时强调了在审干反特中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这个方针是1943

年6月2日，刘少奇关于延安反特经验和华中准备反特斗争问题致陈毅、饶漱石的电中第一次提来的。8月15日，中央审干决定又指出“不可因怕（特务）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形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多杀，才能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毛泽东、康生1943年12月27日起草，1944年1月发出的指示电中又说：“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5%。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经证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这个“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是保障我们少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法宝。

延安各地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进行甄别，甄别工作的结果证明，前一段的防奸运动中，90%以上的坦白分子不是特务，而仅是党内错误或仅有党派、自首等问题，而且有一部分是完全弄错的。于是，被冤枉或弄错的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名誉，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弄清楚，个人保留意见，就挂起来了。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讲到审干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成绩是经验，错误也是经验。错误本身，有坏处也有好处。他说党校犯了许多错误，我负责，我是党校的校长；延安犯了许多错误，我负责，发号施令的是我。毛主席主动地对错误承担了责任，向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赔礼道歉。

在这段甄别阶段，中央发了一些指示到各地，要求各地对审干反奸工作采取谨慎态度，注意防止和纠正各种“左”倾错误，从而防止了清查内奸扩大化的蔓延。因此，总的来看，抢救运动时间不长，造成的损失大体上得到了及时纠正。

（三）对抢救运动的几点认识

（1）党中央对延安审干运动（包括抢救运动）的评价

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对十年前延安审干运动是这样评价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央订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审干运动把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的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绩是很大的，是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这个运动第一阶段发动群众，第三阶段甄别工作，都是做得对的，只是中间一段即第二段的抢救运动是有偏向的，这个偏向就是急躁地想用简单的方法把反革命分子清出来，其结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错误。这个错误在甄别工作时得到了纠正。当时所以犯这错误，除了有些干部主观上有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外，也有客观原因，即是：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全国政权，因此没有可能掌握充足的材料；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胡宗南敌军企图进攻延安，因而没有充裕的时间进行细致的工作；当时对于用发动群众的方法来肃清反革命分子这一工作，我们还缺乏经验。虽然如此，但是这个运动还是成功地创造了用发动群众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法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以后全国规模的很多运动，直到今天的肃反运动都是很有用的。”现在看来，1955年的这个评价，明确的

指出了抢救运动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但是没有提出康生的问题，客观原因谈了，主观原因是否还谈得不够，对抢救运动的“经验”是否估计过高了值得研究。

在当时审干运动后期，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指示中，对发生的“左”的错误和抢救运动是持批判态度的。如1943年中央审干决定的九条方针和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既是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又主要是针对抢救运动出现的逼供信偏向提出来的。1944年5月13日，在中央关于在反特斗争中纠正过左及逼供信的指示中，列举了许多“左”的错误表现。如错误的认为我们129师的司令部及直属单位都有反革命支部，八路军总部直属单位有一个总的反革命组织，电台人员都是特务，军事部门各厂均为特务掌握，有的地方和军队将所有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有的学校将整个班的学生甚至是十二、三岁的小学生，都戴特务帽子。有的人供称：1943年7月间，特务在晋、冀豫边府所在地开过43人的高级特务会议，并涉及许多高级干部。真是特务如麻，草木皆兵。在大会上乱逼特务组织关系，在坦白大会上使用斗争镇压方法，使犯错误的人，不敢坦白，使少数特务乘机挑拨；有的以简单的逮捕方法代替调查研究，穷追硬逼毒打搞逼供信，如有的在一个整风班内使用24种肉刑及变相肉刑，有的农村将大多数居民都坦白成特务。结果是多捉了人，逼死了人，冤枉了人，损伤了人。所以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1944年中央发出一系列纠“左”、甄别、防止审干反奸扩大化的指示以及甄别工作本身，就说明抢救运动混淆了两类矛盾，90%以上的坦白分子不是特务而受了委屈和冤枉。同时，针对当时出现的错误和问题，中央指示要求坦白大会要更慎重更有准备的召开，不可开得过多，以后又提出停止开坦白大会，不能到处采用抢救运动的简单方式，不要采取尖锐斗争反特务的方式；要求以后对一切坦白分子，如果没有确实证据，一律不要加以追问，就是有检举材料，本人坚持不坦白特务问题，也不可强迫，而应细心研究；规定了逮捕人犯必须经过上级机关批准的手续，要求经常检查和警惕有无肉刑或变相肉刑、车轮战、打骂、捆吊、侮辱等等违法行为发生。

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一个报告里，也谈到抢救运动的问题。他说，抢救运动时期发生了过火、左的毛病，过火要不得，群众的逼供信不好，九条方针中的两条：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在那时没有实行。他说，抢救或者硬救，只有群众运动，缺乏分别对待，毛病就出在这个地方。

（2）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康生是1937年11月和王明等人一起乘飞机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接着12月召开政治局会议，康生就留在中央书记处工作。1939年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康生为正主任。1941年7月，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对外称研究室），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康生是情报部部长和党务研究室敌占区研究组组长。1942年4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央机要局，康生兼任局长。在抢救运动中，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是主管治安保卫工作的，当时的一些情况，包括审查干部的名单，是由社会部汇报给中央的，他又是审干的主要负责人，是他做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是他亲自批的绥德开坦白大会的经验，并向全党推广的。所以康生在审干运动

中，借所谓抢救失足者，大搞逼供信，把许多同志打成“特务”、“叛徒”、“敌探”，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生一贯以“左”的面貌出现，当1936年、1937年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公审布哈林、托洛茨基分子定为“人民公敌匪帮”、“暴徒”时，他回到延安一下飞机就大骂托洛茨基，吹捧王明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后来形势一变他也摇身一变，又把自己标榜为一贯坚决反对王明的“英雄”。在抢救运动中，他也是以“左”的面目出现，而且他从来不作自我批评，对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推脱责任，以一贯正确自居，反而大骂别人有“特务如麻”的思想。1944年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的《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讲演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抢救运动的偏差错误“基本上是进步中产生的”，“即斯大林所说的‘实行正确的政策时有了过火行动’”。实际是在掩饰错误。

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抢救运动的错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上错误的重复，而且这种错误在其以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十年，这种错误的悲剧还在重演。当然历史是前进的，这种错误产生的历史环境、条件及其具体内容并不是都一样的，也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但是毕竟我们是在同类性质的问题上犯了同类性质的错误，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引以为训。

抗日战争时期审干抢救运动的错误，是在党的正确路线占统治的时期发生的，它和土地革命后期王明错误路线当权的肃反扩大化是不同的。王明路线时期肃反错误不仅是主观主义、错误的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大搞逼供信、大搞神秘化、采取乱捕乱杀及法西斯式的审查方法，而且和实行宗派主义，用对敌斗争手段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如湘鄂西的四次大肃反，共捕杀了党和红军干部战士几千人；张国焘在鄂豫皖的肃反更凶，杀得群众为逃避肃反躲入山中，提出“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的口号。而王明路线统治的中央是支持这么干的。对于这一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及其血的教训，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他说：我们肃反也是走过弯路的啊，多少脑袋才斗出了八个字，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

(3) 从抢救运动中应吸取哪些教训呢？

1. 要正确的估计形势。抢救运动反特斗争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错误的估计敌我力量，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

处在敌后长期抗日残酷战争环境的抗日根据地，日探奸细是一定要极力进攻的，但同时应当相信我们整个的党、军队、政权，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绝对不会成为敌人的组织和敌人的奸细，暗藏在我党我军组织内的特务只是极少数。中央在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提出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说“特务之多，原不足怪”，这对形势估计是过于严重了，它不能不影响全党对敌我力量的正确估计。康生在中直机关大会上作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只强调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这一方面，提出特务的群众性的论点，说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中都有特务，是敌人的第五纵队，要人人怀疑周围的人人是特务，根据这种主观主义的估计形势，必然是怀疑一切，草木皆兵，惊慌失措，造成反特扩大化的错误。

2.要分清两类矛盾。抢救运动的重要错误是混淆两类矛盾，把思想问题和特务问题混为一谈，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当作反革命对待。

抢救运动开展起来，党员干部思想没有准备，对政策界限不清楚，党中央九条方针也没有在党员和群众中进行深入宣传。而康生却宣传什么“职业特务虽是‘一部分’，占某些机关某一地方全体人员之极少数，但其进行活动，则关系许多人，利用许多人，蒙蔽许多人，的确不是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而是有组织的带群众性的活动”。这样，在“特务如麻”、“不坦白特务不过瘾”的“左”倾思想支配下，必然不顾事实的夸大特务活动和特务组织，因而引起反特斗争的狂热，随便给人戴上特务帽子。这样就必然混淆两类矛盾，只找特务不辨好人，在党内造成严重混乱，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和不安。

3.要调查研究，坚持专门机关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路线。当时在审干反特斗争中不重视调查研究，不重证据，只凭口供，不具体分析，分清是非，而到处采用抢救运动的简单方式，盲目推广所谓群众反奸运动、坦白运动的经验，在各个机关中追求揪出阶级敌人的比例数字，甚至公开号召以比赛的精神来清查特务分子，必然造成逼供信的错误，产生大量的冤假错案。

康生批的《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大会上自动坦白和被揭发的，占参加大会2600人的15%。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报道说，一个十六岁的学生提着一大包石头走上台，说这包石头就是他在特务组织指示下谋杀用的武器。康生以中央社会部的名义印发这个材料，推广这一经验，《解放日报》以头版头条报道这种所谓成功的经验。由于这些经验的推广，更助长了逼供信的“左”倾的错误发展。有的地方搞抢救运动，竟先安排好几个假坦白的，会议一开始，便抢着跑上台，承认自己是“特务”，这样就得救了，会场下面就乱作一团，互相揭发，互相扭斗，我说你是特务，你说我是奸细，搞得不可开交。不承认是特务，就搞刑讯，使用肉刑。结果头脑发热发昏，舍弃调查研究，既冤枉伤害了同志，又孤立了自己，人人怀疑，人人自危。因此，在反奸斗争中坚持专门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的，它和在反奸斗争中盲目搞所谓群众运动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绝不能以后者充当前者。

4.要有正确的政策。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审干运动也应如此。而康生认为群众坦白、揭发运动和甄别工作是反特斗争必经的过程，先右后左再纠偏是一般规律。这样就把抢救运动中的过火偏向说成是必然发生的，坦白运动和甄别工作也成为必经的过程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开始就是只发动群众，不交待政策，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又不能及时纠正，认为纠正“左”倾就是给群众泼冷水，影响群众的发动，把发动群众和执行政策，执行九条方针对立起来。只有到甄别阶段，才去执行政策，才能去反对“左”倾错误。事实证明，不在行动之前，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行动必然是盲目的，不懂得正确的政策，必然实行错误的政策。在中央一系列甄别工作的指示中，强调斗争一开始就必须使干部深刻了解和掌握中央的方针，正确的估计敌人的力量，相信自己的干部。反省

坦白任何问题，提倡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为了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还提出根据具体情况订立反奸纪律，在群众中公布。有的地方按这个精神去做，效果就好得多。

三、关于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方针问题

主要说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和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回避的，只讲党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而争取和平民主也只是一种斗争策略手段，只是为了揭露和孤立反动派，谈是为了打，也不承认有和平的可能性。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抓住“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大做文章，什么投降主义路线呀，什么反对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呀，是什么陈独秀、王明路线的继续，是美共叛徒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呼应呀，等等，都加到刘少奇一个人的头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因此，澄清是非，说明真相，是非常必要的。

下面说三个问题：

（一）“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的来龙去脉：

“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1945年8月23日，中央对各战略区的指示，8月24日，毛泽东给华中局的指示，都指出：①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②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③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8月25日，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和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卖国针锋相对，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8月26日，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说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8月27日，中央关于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的通知中指出：“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将调整，避免内战。”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进行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中说：“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10月17日，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说：“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1946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负责同志及有关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明天就要颁布停战令，从此即将开始和平民主的新阶段。1月10日，毛泽东颁发的停战令中说：“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此后，在1、2月份《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消息报道都有很多类似的提法。

停战令颁布以后，毛泽东主持召开过几次会议，他在会上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到来。他建议应当起草一个文件发下去，使全党对目前的形势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必要的准备。根据会议的精神，刘少奇起草了一

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是对政协决议基本上作了肯定，指出“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要求全党作两手准备，各地要开展大练兵，以练兵、减租和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同一天，2月1日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在延安的中央和西北局的高级干部作了时局问题报告。这个报告是传达和贯彻几次会议和中央“二·一”指示精神，一些重要提法如“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等等，在文字上也和“二·一”指示是完全相同的。同时，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人，也分别在不同场合讲了这个问题。比如46年2月2日，周恩来在答记者问时说：现在已经进入和平时期，我们愿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长期合作，从事和平建国工作，此后不是武装斗争，而是和平合法的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了。2月4日，朱德在延安庆祝和平民主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从此正走向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从上述“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可以明显看出这个提法，是党中央提出来的，它是党中央对时局的一种估计，是党对广大人民群众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是党力争实现的一种局面。它不是刘少奇个人提出来的，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

（二）怎样评价“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

“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不是投降主义路线？不是。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和平民主新阶段”这个提法呢？

（1）这个提法是我们党对当时形势发展的可能性的一种估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受到沉重的打击，德意日被打垮了，损失惨重，德国和日本一九四六年的工业生产只及一九三七年的百分之三十。英法力量大为削弱，只有美国没有受到损失。而世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壮大，一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二是亚非拉特别是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继续打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三是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工人罢工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赞成中国的团结与民主，“保证美国将不以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战过程”。十二月二十日，美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有关中国问题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内战必须停止”，“建立一个团结民主的中国”。

从国内来说，国民党反动派是要打内战的，这是它的既定方针。但是他要立即发动内战也有困难。一是共产党的力量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大，有一百二十万党员，一亿多人口的解放区，一百万的正规军和二百万民兵；二是他的军队都摆在大后方观战，一下子也运不到内战前线，也需要有个过程；三是人民普遍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日本投降后，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蒋介石三次打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八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正式宣布毛主席率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二十七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乘飞机到延安迎接，二十八日下午四时我代表团到达

重庆。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这是事实，但不等于蒋介石没有他对谈判的既定方针。就在我党代表到达重庆的当天中午蒋介石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对策。他的日记中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什么方针呢？日记中说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二十九日蒋的日记说，对谈判的方针是“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归结于军令政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见《蒋总统秘录》）所谓政治上的“宽容”，就是可以给予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但军事上则一定要用“统一”的大斧砍掉人民军队，决不“迁就”。这就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重庆谈判进行了四十三天，蒋介石和毛主席直接见面会谈有九次。谈判结果是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即“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它宣布了国民党“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以实现政治民主化。但在解放区和军队两个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决定先放下来，由政协会议解决。在毛主席回延安的前三天，十月九日、十日、十一日，蒋介石三次和毛主席见面，就是讲要共产党“改变政策”、“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又说关于“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显然它要我们党放下枪杆子，放弃解放区政权，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四六年一月十日蒋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经过二十一天的会议斗争，通过了五项决议：①和平建国纲领，规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原则。②改组政府决议，规定改组国民政府，吸收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③国民大会决议，规定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民主宪法。④宪法草案决议，通过宪法草案修改原则。⑤军事问题决议，规定根据民主原则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规定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原则。尽管这些决议与我党的主张还有一些距离，但它比《双十协定》还是大大前进了一步。它的基本精神是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各党各派共同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这从根本上说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这些固然还是纸上的东西，还不是现实的东西。但过去连这纸上的东西也没有。纸上的东西有被撕毁的可能，重新再打内战；但是也有经过斗争，使纸上的东西变成现实的东西的可能，搞一个时期的和平民主的局面。如果我们只承认战争这种可能性，只准备战争，一旦出现了和平的、群众的、合法的斗争局面，不是也要处于被动地位吗？我们中国同志有一种观念，就是总认为武装斗争，革命战争是真本领，是神圣的，而合法斗争是要嘴皮的，是被鄙视的。认为对形势的发展有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并且要准备进行合法的斗争，就有机会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味道。实际这种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既然反对内战，要求实现和平民主是人民的根本愿望，我们党代表人民力争和平民主的实现是理所当然的。和平民主局面的出现是我们力争的东西。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学会并善于进行合法斗争。

（2）对我们来讲，即使“和平民主新阶段”实现不了，而尽量争取暂时的短时间的和平，也是重要的。我们的力量是在抗日战争中越抗越大的。我们的力量是空前的，

从来没有象抗日战争后那样强大过，但和国民党蒋介石比较我们还是弱小的。日本投降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一切都来不及准备，短时间的和平也是好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四十天，1946年5月21日，党中央还发出指示，说必须使全国性内战爆发的时间尽可能推迟，方对我有利，如不能推迟半年，即使推迟三个月、两个月以至一个月的时间爆发，亦将使我之准备比较充分。当时，我们党的基本方针是拖延时间，积极准备。在1947年12月会议上毛主席也讲过，那时我们确有拖几个月的诚意。一是争取和平，和平能争取到更好，争取不到也争取了群众，这就是胜利。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撕毁政协决议，“和平民主新阶段”并未实现，我们有备无患，也没有什么坏处。由于我们党高举了和平民主的旗帜，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同时，也使人民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卖国的本质，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它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所以，“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实现，并不是我们政治上的失败，而是政治上的胜利。政治斗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3)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对国民党反动派存在任何幻想。因为无论谈判或者打仗，都是一个方针，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谈判期间，我们从未放松警惕，从未放弃力量上的准备，从来就是讲打的越好，谈判就越主动。在日本未正式投降前，8月1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就指出：

“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露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两天，10月12日中央指示：“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使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在46年停战令颁布的第三天，1月13日中央指示告诫全党，不要幻想蒋介石真的会变成民主派，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争会松懈下来。2月1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说：“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练兵减租与生产是目前解放区的三件中心工作”。以后，中央发布“五四”土地指示，又由减租转入土改运动。

总之，我们一方面真诚地争取和平民主，一方面认真地准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强大的武装力量，充分的物质力量，雄厚的群众力量。“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一种力争实现的局面，一种斗争的口号，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革命起实际作用的物质的东西，是主要方面。和平也好，战争也好，都需要有胜利的物质保证。自己没有力量上的准备，用什么去争取和平？即使出现了和平局面，也巩固不了。战争一旦起来，没有准备就要陷于被动，吃大亏。我们要在任何情况下处于主动地位，就要主张“有备无患”，反对“有患无备”。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虽然不能说是“和平幻想”，更不是什么“投降主义路线”。但从后来事实的发展看来，当时我党对时局的估计，是作得急了一点，快了一点，早了一点，因此还不甚准确，对形势的估计开始乐观了一点，判断也太肯定了一点。

1946年7月1日左右，毛泽东在枣园召集的一次有十几人参加的聚会上，有一段重要谈话。他说：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不会上当吃亏了。在1947年12月会议，毛泽东又说：美国调处时，我们曾不缴一支枪，但曾经相信三国（美英苏）三党（国民党、民盟、共产党），以为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46年上半年工作及“和平民主新阶段”提法的一个很好的总结。这种在认识上一下子看不准出点偏差，在事实上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美国的真面目有一个暴露过程，我们识破它的真面目也有一个过程。关于这个问题，刘少奇在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在66年12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作过检讨，进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他说，应该说，中央那时也还可以不用那样早就作出这种关于时局的全面的估计，还可以看一个时候再说。中央通过的这个指示（指46年2月1日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该纠正。

后来由于国民党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党中央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又及时地改变了原来的估计，放弃了这个估计。这也是很正常的、无可非议的。

（三）党的“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主要是讲争取和平、民主这一手，而另一手就是准备战争，这一手的集中表现，就是我们党中央确定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

下面，我们着重讲一下这个问题。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党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的职务，主持中央工作，并增选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11月中旬，毛泽东因疲劳过度住医院疗养，12月下旬出院，休息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党中央工作仍由刘少奇主持。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并采取了贯彻这个方针的具体正确措施。

1945年9月15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党中央作出决定，我党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并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当天就启程去东北。

9月17日，刘少奇向在重庆的毛泽东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并立即得到毛泽东的同意。9月19日，少奇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这是“全国战略方针”，“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并且在组织领导上，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李富春为书记），并扩大冀热辽军区（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调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将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党中央在刘少奇领导下采取了以下三项重大措施。

(1) 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我军主力撤到江北，调集十万大军和两万地方干部开进东北。

为了改变我军战线漫长、兵力分散状态和避免遭受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党中央在1945年9月初，指示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由广东始兴的百顺地区，“北上与五师（鄂豫边）靠拢。”9月17日至19日三天中，党中央又决定“为了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必须调兵北上”，调“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和东北出动”，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到冀东和山东，调“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接着又调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率领分局和军区领导机关及山东五个主力师、18个基干团五万多人进入东北，加上冀热辽及其他各军区开进东北的部队，共达十万余人。此外，还调集各解放区地方党政干部两万多人进入东北。

这些调动和部署，刘少奇都及时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得到他们的赞同。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将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作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作的让步提出来，并公布于世。既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军事上又不吃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2) 破袭敌人交通线，阻碍和延缓蒋军开入东北，掩护我军向北发展。

蒋介石为了夺取东北及热察两省，派四个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分别率四路大军，分别从归绥、运城、新乡、徐州出发，向天津、北京、张家口三地集中，以这个地区作为“屯兵和补给的前进基地”，然后分别经北宁线和热河开入东北。

在四路蒋军出动之前，刘少奇在9月2日就为党中央起草了给各解放区的指示，其中指出：“凡被我包围之铁路及重要公路电线等，必须彻底破坏”，“以便阻止敌伪顽军的行动，便利我军行动”。9月19日，党中央鉴于傅作义开始动作，即发出指示，要求“冀察晋（除冀东外）及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9月22日，党中央为了阻止另外三路蒋军的北犯，指示“山东及新四军主力对付津浦路北进的李品仙顽军。以冀鲁豫及太行之一部对付沿平汉路北进之孙连仲。以太行、大岳主力及赵尔陆部对付沿同蒲、正太路北进之胡宗南”。同时，中央为了加强向南防御的兵力，决定在10、11、12三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应争取补充扩大数十万人。

10月15日，党中央指示重申“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打击和阻止”，而“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10月18日，平绥战役、津浦战役发起，20日平汉战役又开始。这三个战役粉碎了蒋介石从陆上运兵到平、津、张建立基地抢占东北及热察的计划，掩护我军抢在敌人前面进入了东北。而担负向南防御的部队，都在破袭敌人交通线的战斗中，迅速地扩大了，并逐步使各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3) 制定和贯彻我党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签订，11日毛泽东飞回延安。11月16日蒋军占领山海关。11月20日，刘少奇依据情况变化，毅然决定我党在东北实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25日我军放弃锦州，26日黄克诚在东北向中央提议建立乡村根

根据地。28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农村为工作重心”，“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12月3日，他又为中央起草对东北局的指示，提出在东北要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强调指出“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12月24日，中央又进一步指示东北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背靠苏联、外蒙，而把双手伸到三大城市附近去尽量抓一把。如此，我们可随时缩手，而不使全局陷于被动。”在此以后，毛泽东恢复健康出院回到中央，立即在12月28日为中央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为争取东北的以后全部解放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总之，由于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正确和措施的有力，争得了东北，扩大了解放区，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从此摆脱了敌人在战略上对我长期四面包围的局面，既粉碎了蒋介石对我江南部队各个击破的阴谋，又粉碎了蒋介石对我解放区南北夹击的计划。

四、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的问题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础任务，土地问题的普遍的彻底的解决，是我们足以战胜一切敌人取得革命胜利最基本的条件。而整编党的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这两个问题是解放战争时期基本问题之一，也是被弄得最混乱的问题之一。这两个问题又是结合在一起不能机械分开的问题。所以我们放在一起来说明它。主要说两个问题：

（一）在整党、土改的方针路线上，刘少奇和党中央、毛泽东是一致的

（二）土改、整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下面先谈第一个问题：在整党、土改的方针路线上，刘少奇和党中央、毛泽东是一致的。

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前，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标志着党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转变。为了取得解决土地问题的经验，1947年1月31日，中央发出关于派考察团帮助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分局的指示。指示中说中央派康生、陈伯达率考察团到晋西北考察并帮助你们解决土地及其他问题，时间约一个月。并要地县一、二负责人及干部数人（地县委书记都必须去），亲自下乡考察及解决几个乡的土地问题及其他问题，时间约一个月左右。分局行署及政治部也如此办。然后于4月7日在分局开各地、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康生、陈伯达参加，彻底解决土地及其他问题，会期约七天。然后由分局派代表一、二人偕同康生、陈伯达来延安开五四土地会议。五四土地会议以后，中央考察团再到华北各地照上述程序帮助各地解决问

题。中央的这些打算，由于后来形势的变化，即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毛泽东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就没有完全实现。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出了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正确决策。3月18日最后撤离延安。3月26日，中央机关转移到清涧县枣林沟，中央作出决定，把中央机构分成三部分，即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主持，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8月30日，中央决定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的工作，原任总参谋长彭德怀因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不能兼顾军委工作）；另一部分由叶剑英、杨尚昆等到晋西北组织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为中央后方担任供给运输；第三部分由刘少奇、朱德等前往华北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当时将中央机构分成三部分是为着工作上的便利，同时也为了在战争期间防备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万一不利情况。

刘少奇、朱德47年3月底东渡黄河，经过晋绥解放区，4月27日到达晋察冀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县，随后到西柏坡。到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并，中央工委即行撤销。

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领导土地改革和整党的工作应当如何评价？过去大批刘少奇的什么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到底存在不存在？下面我们摆一摆当时的情况。

（一）关于整党问题

刘少奇经过晋绥到达华北的途中，经过调查研究，47年4月22日给晋绥解放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信，提出晋绥解放区土改和党的基层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方针。信中指出晋绥土改群众运动是非常零碎的、没有系统的，因此也是不彻底的。如一个地委五个县共1500多村，已发动群众者900多村，已分得土地者200多村。这200多村分散在五个县，星星点点，不成一片。因此没有一个县，甚至一个区已经是象样的解决了土地问题，刘少奇强调指出必须要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普遍的、彻底的发动群众，才能正确的把土改运动领导到底，普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关于党的基层组织的问题，信中指出主要是有一些干部不相信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去指导群众运动，这就是许多地方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因此刘少奇提出了组织工作团及建立贫农小组和农会来完成土改任务的建议。同时提出要切实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力，群众有在各种会议上揭发、批评干部的缺点、错误和选举或撤换他们的权力，对于侵犯群众民主权力、进行打击报复的行为，必须给以惩处，对于被群众反对与撤职的干部，一律采取争取教育与改造的方针。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封信是肯定和赞扬的。1947年7月25日，他写道这封信写得很好，很有必要，它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正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它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这封信经毛泽东修改、批示后，印发给各地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学习参考。

在土地会议召开前夕，1947年7月10日，刘少奇向党中央报告了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报告说对于会议，我们只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

题的若干文件。此外，无其他准备。至于会议进行的方法，打算先由各地代表汇报情况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7月27日，党中央给刘少奇的指示指出，同意土地会议进行的方法，并且提出在土改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的工作甚为重要，希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在土地会议各地代表汇报情况和提出问题即将结束，将转入讨论和解决问题时，刘少奇于8月4日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中心思想是说经过细心考察，发现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某些地方土地改革不能彻底的基本原因。解决这个问题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改，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并为此提出具体建议：

(1) 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及各级组织及干部的方针。如有党组织和干部不能执行此方针者，即由上级组织派遣工作团直接执行此方针，如有抵抗破坏此方针之执行者，即根据情况给予处分，直至解散其组织或开除党籍。

(2) 巩固区的党可以公开，群众反对并提出某人不应作党员者，经党审查后，如理由正当，应拒绝入党或退为候补党员。

(3) 地主富农出身党员，除特许者外，在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以免亲朋包围麻烦，凡有包庇地主破坏土改等非法行为者，须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党中央8月13日给刘少奇的指示中，表示完全同意，认为他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应将这些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二) 关于土地改革问题

1946年5月4日，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确定了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解放战争时期“平分土地”的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全国土地会议的讨论，原来是集中在党内问题及农民组织与民主问题。在会议快要结束时，新华社在47年9月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社论。这篇社论讲晋绥日报开展反“客里空”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的一个收获，是在国内战争与土地改革的新形势下进行的”，接着全篇都是讲形势和平分土地。其中说“目前的新形势，是从抗日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土地改革由减租减息到平分土地”，而且是“彻底的普遍的平分土地”。

刘少奇看到这篇社论后，受到启发，才建议土地会议讨论平分土地问题的。他9月4日在土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于是，他提请会议讨论，是不是实行这样一个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土地的政策。土地会议经过讨论，迅速通过了这个原则。

1947年9月5日，中央工委关于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向党中央请示，说会议已经决

定普遍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向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土地法大纲及决议草案，待通过整理后，即电告中央批准发出。这样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第二天，9月6日中央指示指出，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也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中央同意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

在土地会议之后，党中央12月会议上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整党和平分土地问题都是予以充分肯定的。他说：“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又说，“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在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

从上述的情况表明，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方针、路线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找不到刘少奇和党中央、毛泽东有什么分歧，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刘少奇的请示报告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下，从何而来的两条路线？事实说明，刘少奇并没有自己一套有系统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去和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相对抗，更没有提出一条什么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第二个问题，土改、整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一）错误倾向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大革命运动，由于阶级斗争的尖锐发展和处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以及许多工作人员缺乏土改的经验，在工作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这个时期土地改革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到1946年党中央五四指示为止。各解放区贯彻执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第二阶段从五四指示发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之前，即1946年5月到1947年10月，这是贯彻执行五四指示阶段。即采取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以及查黑地、献地等办法来实现“耕者有其田”这一目标。第三阶段从土地法大纲颁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贯彻执行土地法大纲阶段，即采取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的办法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在土地改革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从日本投降以后到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土改中发生的错误倾向，主要是右的倾向。它主要表现为在党的政策从减租减息向土地改革转变时，某些干部思想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起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或者强迫命令，包办代替，进行“恩赐”；或者给地主多留地、留好地；或者干部、民兵、

积极分子及军、工、烈属多分地，多得斗争果实。党中央发现这种右的倾向，从1947年春开始纠正，特别是在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集中力量反对了党内出现的这种右倾错误，而且比较彻底的纠正了这个方面的错误。当时中央工委、刘少奇、全国土地会议在批判纠正土改中的右倾错误方面，作出了努力，是有贡献的。

但是在批判纠正右的错误倾向时，没有注意防“左”，在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原来就存在的“左”倾情绪便更加发展起来，成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种错误，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侵犯中农利益。首先，定错了一些中农的成分，扩大了打击面。其次，表现为办事不要中农参加，政治上排斥中农。第三，公粮负担不公平，特别加重中农负担。第四，分配果实时有完全不分给中农的。第二个方面是破坏工商业，特别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第三个方面是乱打乱杀现象发生。这些错误，在土地会议以前和会议期间，华北、华中较严重，土地会议以后，则以晋绥较严重。到1947年11、12月间达到顶点，12月中央会议就开始纠正这种错误。整党工作是和土地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整党工作的问题主要是在一种揭发党内严重不纯的空气下的一种缺乏清醒分析的错误。这种对党的基层组织缺乏正确估计和分析的错误，又和土改中错误的“贫雇农路线”，认为贫农团比党要好些，不承认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把党降低到群众水平以下，不重视党的领导作用的思想是有联系的。在土改中对党组织一般采取不信任态度，搬石头，靠边站，任凭群众去处理，或因错定成分而被斗，或者处罚过重，使可以争取不死者致死，可以不开除撤职者开除撤职。对于党支部中某些党员个人与地富有某种关系和支部领导（即整个支部）受地主影响不甚加以区别；对党员个人与地富的普通亲朋故旧关系、平常来往和包庇地富或对地富采取妥协态度也不甚加以区别。

这些“左”倾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由于：当时处于全面内战爆发、敌我处于残酷斗争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其次，在农村两大对抗阶级处于生死搏斗的形势下，当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斗争尚未充分展开的时候，容易发生“右”倾，而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斗争已经全面展开的时候，容易发生“左”倾。而农村的群众是农民，农民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小生产者有着自发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如果掌握不好，不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就很容易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工商业。第三，某些领导者和许多干部都一般缺乏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改革的经验，许多干部存在着革命急性病及宁“左”勿右、尾巴主义的一种盲目自发的“左”倾倾向。

（二）对“左”倾错误的估计及对错误的纠正

土改和整党中“左”的错误，如何估计，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毛泽东在47年12月党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土地会议是黄河主流，是一伟大潮流，但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即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会成为逆流，要把这三个浪花反掉，要把三个过“左”倾向纠正。所以成绩和错误的关系还是主流和浪花的关系。产生这些浪花的原因前面我们分析过了。至于说这些浪花和刘少奇



的关系怎么样？这要由历史事实来说话。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是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会议决定了平分土地、整党、起草了《土地法大纲》，这些都是正确的。没有这个会议，大规模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但是土地会议看起来也有缺点，这就是：

(1) 土改的前提条件是划分阶级成分，而土地会议对此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没有明确具体的做法，这样下面在划分阶级上就容易出偏差。到12月党中央会议时，才将1933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作为内部参考文件重新发表，48年5月作为正式文件在报纸上公布。

(2) 会议对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着重批判右倾是对的，但没有注意防止“左”倾是不对的。强调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但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上缺乏清醒的分析，强调了所谓“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助长了尾巴主义，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正确的。

(3) 对解放区情况缺乏具体分析，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致使许多地区一律实行平分土地的方针，发生了机械平分或绝对平分或者明分暗不分的问题，也侵犯了中农利益。到1948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的电报和5月25日党中央关于1948年的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此期间，刘少奇也讲过一些错话，过头话，流露出“左”倾的情绪。比如他在47年4月30日在晋察冀的一个讲话中说：地主的工商业和一般的工商业要区别一下。地主剥削农民，在城市兼营工商业，他的土地财产和商店，要让农民搞他个干干净净，工厂农民不需要就归公，五四指示没有说清楚这一点，是有缺点的。还说，不侵犯中农利益，不是绝对的。地主反攻，杀我们的人，他杀我百人，我就杀他千人，消灭他们，不杀则不杀，杀就要杀干净，杀他一家，等等。这些错话助长了侵犯中农利益和群众乱打乱杀的问题。

在整党中搞“搬石头”，对党内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分严重，缺乏具体分析。特别有的对党支部不分好坏，对错误不分大小，完全采取抛弃的方针，当做石头搬掉，是不妥当的。

这些“左”的错误和问题，刘少奇是中央工委书记，负责主持中央工委的工作，是负有相当责任的。这当然不是说，土改整党中所出现的一切错误和问题，都是刘少奇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的领导责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领导机关没有规定界限分明的政策，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做的事公开地明确地分清界限，如划分阶级成分怎么划是对的，怎么划是错的？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和界限，运动必然出问题。你要消灭封建、半封建，但什么是地主、富农的标准不清楚，怎么可以呢？你要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都不清楚，却要大抓什么“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割资本主义尾巴，岂能不混成一场，造成灾难和浩劫呢？土改和整党中之所以未能明确分清该做不该做的界限，一是领导者对于

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的经验，或者对于历史的经验缺乏研究，对于他人的经验重视不够，或者由于领导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没有作系统的说明和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因此，就不能动员党和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这是领导者责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大规模地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运动的情况和全局，及时纠正下面的偏向和错误。

现在看来，土改和整党中错误的性质是属于某些政策和策略方面的错误，谈不上是什么路线错误，在土改整党的方针路线上，刘少奇和党中央、毛泽东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只是在执行正确路线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由于思想上有片面性，由于缺乏政策观点和策略观点，而忽视了政策和策略指导的重要，没有及时地完全地掌握住运动的领导权，而使运动发生了偏差，走了弯路。而且为时不长，几个月的时间就纠正过来了。至于林彪、“四人帮”宣扬的什么刘少奇为了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抛出一条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线，破坏土改、整党，破坏党的政策，妄图削弱解放军的后方，使解放战争遭到失败。这些纯系诬蔑不实之词。

刘少奇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是从不隐讳，做过多次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勇于纠正偏向改正错误的。

1947年12月党中央发现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后，中央工委1947年12月31日发出《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指出划阶级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资料与否，占有多少，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剥削关系，如再提出其他标准，都是错误的。澄清了划阶级标准的混乱和纠正划阶级的“左”倾现象。48年1月18日，刘少奇关于土改整党问题致毛泽东电中说：“现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偏向，主要已不是右倾，向地主富农妥协，而是‘左’倾……，我们现在应在承认土地会议着重批评右倾与强迫命令的正确的前提下，着重批评‘左’倾尾巴主义。”1月23日他在给薄一波的电报中也指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方式以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这种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以便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1月25日，中央工委给邓子恢的指示中指出：“地主、富农工商业一般应予保护，而不应一般没收，只应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但没收者亦不应分散或停闭。”3月15日，中央工委给热河分局的指示中指出：“土地改革中所发生的各种‘左’倾错误，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望坚决迅速随时予以纠正，而不要让其继续发展，使工作受到重大损失，中央最近发出的各种指示，则是纠正各种‘左’倾错误的根据。”这些材料都说明刘少奇对于当时出现的“左”倾错误，是以实际行动去纠正偏向改正错误的。对于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态度，检验的标准是实践，是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

刘少奇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一贯是实事求是，毫不隐讳的。土地会议开过不久，他就发现土地会议是有缺点的。1948年初他在一次讲话中就说，土地会议是有缺点的，有不够的地方，没有分开新区老区不同的解放区，有些办法也没有写清楚，这是科学性不够，不精细，我们必须在现在，在以后，根据新的经验再定出许多东西来补充。48年3月，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集了中央工委会议。3月19日，他致电毛泽东，汇报工委